

唐德剛  
作品集  
民國通史  
晚清導論篇



【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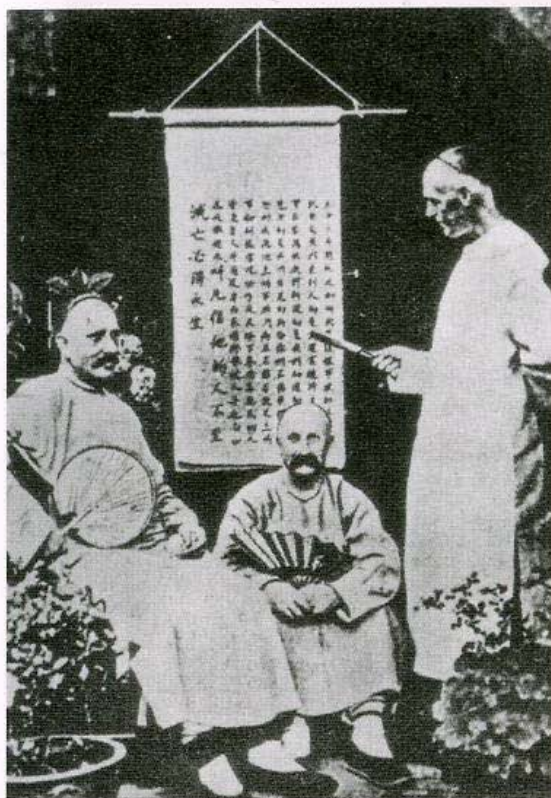
義和團  
與八國聯軍

晚清  
七十年

舊時代夕照猶存，

新時代曙光未露，

一段青黃不接、動盪飄搖的暗淡歲月。



●清末在中國內地進行傳教活動的外國傳教士





其一  
神助奉 義和團 只因鬼子闖中原 勸奉教 自信天  
不信神 忘祖仙 男無倫 女行姦 鬼孩俱是子母產  
如不信 仔細觀 鬼子眼珠俱發藍 天無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發怒 仙發怒 一同下山把道傳  
非是邪 非白蓮 念咒語 法真言 升黃表 敬香烟  
請下各洞諸神仙 仙出洞 神下山 附著人體把拳傳  
兵法藝 都學全 要平鬼子不費難 拆鐵道 拔錢杆  
緊急毀壞大輪船 大法國 心胆寒 英美德俄盡消然  
洋鬼子 盡除完 大清一統靖江山  
詩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 遍地草木化威兵 愚蒙之體  
仙人贊 定滅洋人一掃平  
右傳云山東聖府抄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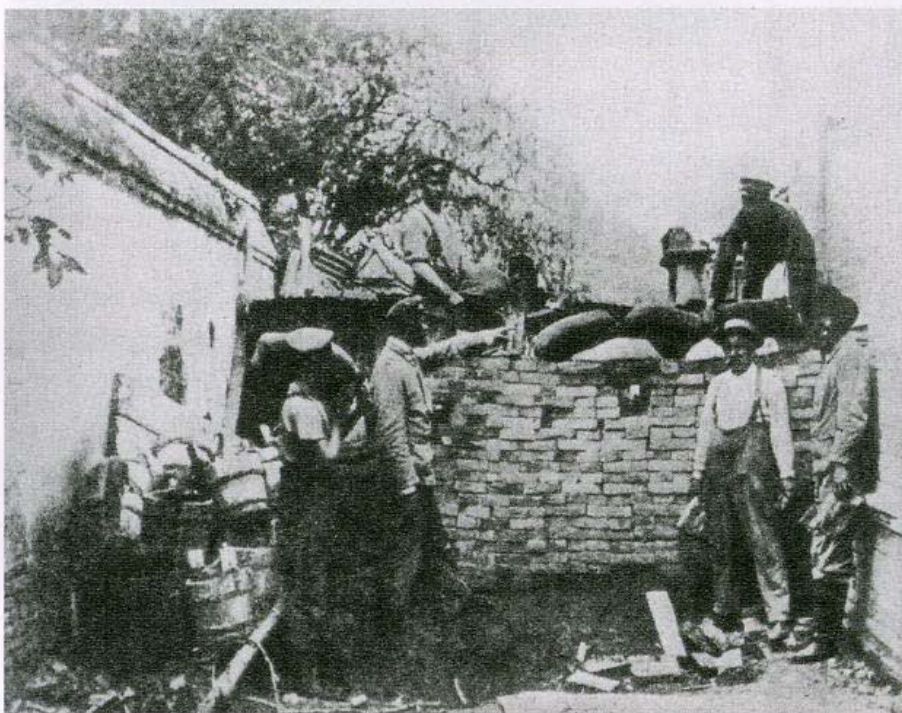
●義和團扶清滅洋的傳單抄本



●義和團拳民



●義和團以火藥炸破北京西什庫教堂內的仁慈堂



●各國使館在東交民巷加緊構築防禦工事





● 清廷為控制、利用義和團而頒發的《團規》



● 八國聯軍在大沽口登陸圖



●被八國聯軍焚劫後的天津民家



●被八國聯軍砲毀的北京街市





●被德軍逮捕的義和團民



●被清軍逮捕的義和團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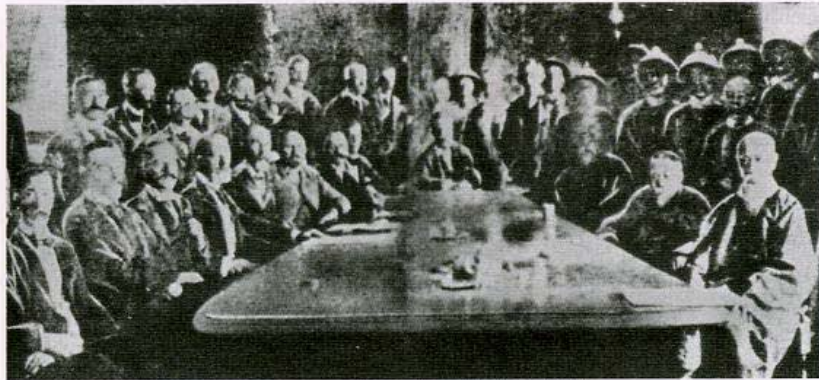


●八國聯軍砲隊侵入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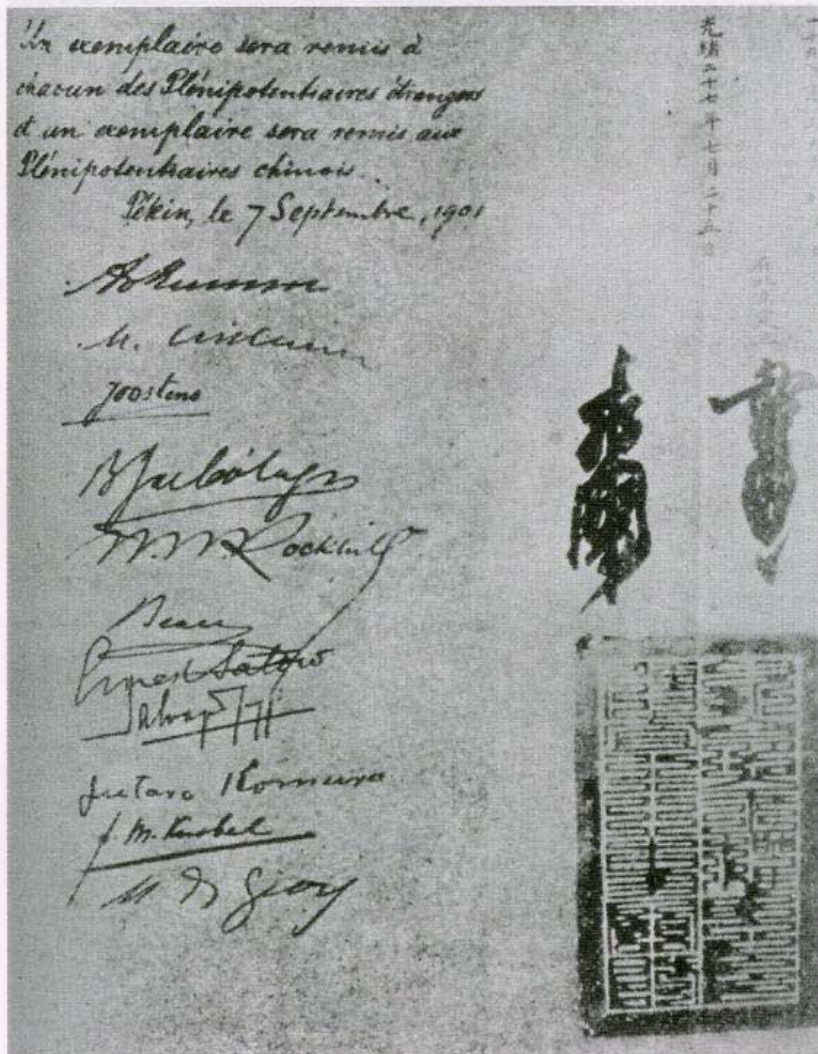


●彙集在午門前的八國聯軍





●奕劻、李鴻章(右座第一、二人)與各國駐華公使議和



●訂約雙方在〈辛丑條約〉上的簽字

## 自序：告别帝制五千年

这部拙作是作者在退休以后才执笔编写的。作为一个以历史为专业的教师，我个人自二十四岁开始在大学教授历史以来，至此已四十余年。在此将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什九是在美国纽约的两所大学里度过去了。在哥大研究院专授两门课，整整地教了七年。一门可说是包罗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的汉学概述，另一门则是包含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学。上课时往往是推着整书车「史料」进课室的。在纽约市立大学则前后教了近四十年。前二十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课，后二十年则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学院作专任。其中十二年则兼亚洲学系的系主任，并负责设计和教授多种课目。在纽约市政府和联邦政府所主办的中学教师训练班中，也曾担纲教授多种课目。总之，四十年中在纽约市大所设计和教授的课目几近二十种之多。作为一个「课目设计」(course proposal)的负责人，你纵不亲自上课，但对教学内容也必须有其彻底的掌握。加以纽约市大的学生和家长们都来自世界各地，种族、宗教和政治背景皆万般复杂。作为一个历史科目的教师，尤其是设计人，各方面可能发生的问题，都得面面顾到。日久在不知不觉中，竟会变成个无所不知，也没一项知得太多的大杂家。荒时废业，莫此为甚。

但是笔者在这身不由己的教学环境中，却勉力地作了一项坚持：在十多种无法摆脱的课目之中，我始终坚持中国近现代史一课必须亲授；四十年未尝或缺也。由于学生背景复杂，程度参差，因此对教学史料之筛选，也不得不随时注意，每一学年的教材都按时下出版情况加以修正。因此四十年来，愚而不学，未能著作等身，却讲义连屋。回忆昔年在哥大，因职司图书管理，对国史资料曾作有系统之累集与编纂。工作虽为人作嫁，然身当其任，熟能生巧，乖材辟典，每可一索即得。友生时有咨询，其数年不解之难题，往往可一语解纷。嗣在市大因该校无中文图书设备，余尝签请纽约市府与市大当轴，拟由市立图书馆与市大图书馆合设一中文图书馆，一以方便市大教学，兼为华裔社区服务。盖市府有此经费，有此立法，而社区与学界亦皆有此需要也。为此笔者曾与市府官员及市大当轴会议无数次，终以华裔社区支持太少，政府体认不足而流产，至堪叹息。承乏一主要学府，以



汉学为重心之亚洲学系而无汉学收藏为基础，则虽为巧妇亦难以为炊。所幸笔者服务哥大有年，两校近在咫尺，在研究资料上，尚可互通有无。至于日常有关汉学文史之教研，则笔者恒以一己之个人收藏为系中师生之辅助。有关资料，片纸未敢废也。积少成多，数十年来，茅庐竟成堆栈。

然处此高科技时代，汗牛充栋之史料收藏，究非一届寒儒所能胜任。敝帚自珍，终是沧海一粟。所幸久居纽约，集天下之至善与至恶于一城，若有所需，仍可一索即得也。年前自纽约市大退休之后，为人作嫁之身，初获自由，文化出版界友好不弃而有索稿者。亦可勉力应命。昔时课室讲稿及平时涂鸦旧作，自校中运回地库，仍堆如乱山，偶自整理，抽编应命，初不意有同好之读者贤达与朋辈师友，竟颇有极严肃之鼓励。承师友厚爱之余，笔者本亦不敢自弃。究竟寄身象牙塔内数十年，纵系至愚，能无一得？因每于霜晨月夕，于数十箱旧稿中，略检其尚可用者，编缀成篇，多半寄至刘绍唐先生于《传记文学》中酌量选用。随意涂鸦付邮，数年来，竟至百余万言。日积月累，浸成巨帙，亦殊出所料也。笔者于六〇年代之初尝与美国出版商麦克米兰公司订约撰写，总揽二十世纪中国之《民国全史》英文稿成千余页（部分章节曾由李又宁教授主编之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季刊披露之，见一九八八年诸期）。嗣复承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慷慨资助担纲主编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Republican China（《详注民国史资料汇编》），积稿亦数十箱，虽明知经费有限，非一人之力可竟全功，然愚公移山，古有明训，知其不可而为之，未尝气馁也。唯自哥大转业之后，所承担之新职，管理重于研究，一转百转，致前功尽弃，实非所愿也。时隔势禁，乞食异邦，无如之何，思之可悲。如今退休之后，虽已渐感老迈，然琴剑犹存，弃之可惜，摩挲旧简，终觉难安，老骥伏枥，仍思贾起余勇，终始其事而以本篇为前导。天假以年，不敢自弃也。

### 电脑时代新史学的试探

在本篇中，笔者必须向贤明读者特别交待的是，刘绍唐先生所编的《传记文学》，并不是「学报」型的杂志。笔者亦无心多写学报文章。所谓学报文章是文体不嫌枯涩，而言必有据，本师胡适之先生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是也。如山师

训，吾何敢违。只是觉得学术文章，不一定必须行文枯涩。言而有据，也不一定要句句加注，以自炫博学。美国文史学界因受自然科学治学方法之影响，社会科学之著述亦多诘屈聱牙，每难卒读。治史者固不必如是也。笔者在作博士生时代，对此美国时尚即深具反感，然人微言轻，在洋科场中，作老童生又何敢造反？谁知如真造反有理，实不愁造反无人也。在此行首举义旗者，不意竟为笔者在哥大所最崇拜的业师之一杰克斯巴松（Dean Jacques Barzun）也。巴氏曾任哥大教务长及文学院院长多年，后以校聘讲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退休。在笔者受业期间，巴氏即不时于授课中严厉批评时士所炫耀，以注脚（footnote）做学问之美国式繁琐史学为不当（巴氏为法裔），六〇年代时更著而为文于哥大校刊中痛论之。无奈积弊已深，纵硕学高名如巴松者亦不能移风易俗也。笔者嗣读此邦师生之汉学论文，其中每有浅薄荒谬之作有难言者，然所列注疏笺证洋洋大观焉。时为之掷卷叹息，叹洋科举中之流弊不下于中国之八股也，夫复何言？！不意近年来电脑之发展已至不可想象之程度，如今台北中央研究院已将二十五史与十三经等输入网路；大陆上甚至已将四库全书全部电脑化。笔者本人曾承台北南港中研院电子专家之辅导试检二十五史及十三经诸典籍，按钮索骥，所需史料简直多至无可招架之程度。近月由华裔谭崇仁博士等专家为美国 IBM 所设计之「深蓝」电脑与世界棋王科斯巴鲁夫对弈，科氏败下阵来，曾引起世界震惊。其实此事并无可惊之处。盖深蓝计算棋式之「秒速」为二亿步，所藏棋谱在万种以上，而且日新月异，永远不断地在改进之中，一人脑中智慧之累积，究有其极限。古人云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棋王败北，何足异哉，

再者照目前电脑科学发展之情势度之，则下一世纪电脑之秒速将有十亿字之检索能力，直可把目前藏书铁架长逾六十英里之美国国会图书馆，全部收藏集于一机之内，置诸衣袋之中而有余，真是成何体统？！读者贤达批览拙篇，或将疑我为撰写科幻小说。朋友，非也，非也！此一幻想之成为事实，只是十年、二十年之事耳。电脑革命如今已排山倒海，吾人身在此山中，不自觉之罢了。

现在言归正传。若谈电脑革命对史学之影响，实在令人不忍卒言。笔者昔年每劝胡适之先生不应再搞他的《水经注》。原意是胡师今世之大思想家也，恶可因噎废食，沉迷于考据训诂之小道哉？然久有考



据之「癖」的胡老师听不进去也。孰知进入今日的电脑时代，考据训诂真已成为工匠小技哉，适之先生二十年之功，今后如以电脑检索之，数星期之事耳。浪费了胡适二十年的光阴，我们的民族智慧如何浪费得起？……事实上，纵在今代电脑出现之前，美国史学界对此以注脚相尚，泛滥成灾的繁琐史学之抗拒已甚嚣尘上，论者以容忍一注可长至三百页之当今美国的八股史学实为荒谬。今后在电脑笼罩之下，那就更不足论矣。去年秋《纽约时报》对此一学术革命，曾有颇为详尽之报导。（见William H. Honan. "Footnotes Offering Fewer Insights: Scholars Desert an Old Tradition in a Search for Wider Appeal." The New York Times. EDUCATION. August 14, 1996. p.B9.）

有感若此，以故笔者试撰此篇时，既为顾虑一般读者对章句之不耐；同时为试探电脑时代新史学应有之取向，乃不作教科书式之撰写。一般史实之早成定案者，都以我国传统史学中之「纪事本末体」及「大事年日志」之方式于末卷中条列之。如此，则读者可一目了然，毋须作者啰嗦也。而史实中之可议、可惊、可叹之处则于正文中详叙之，并试行减少学报气味，庶几一般读者能读而终卷也。名家之见足传千古者，则博揽而广收之；或有不足者，则以愚者之一得而填补之。虽仅一得之愚，亦聊备一家之言，以待知音者之更多补充与佐证。至于一般注脚，除具有关键性者注明之外，一索可得者则省却之。盖专家检索，初非难事，遣兴读者亦知作者之不妄言也。聊以拙篇为新方向之实践，纵不能致，然心向往之。至恳读者随时匡正之也。

### 三大阶段，两次转型

抑有进者，笔者读史、教史、著史数十年，劳者自歌，亦每以千虑一得，自作主张，对四千年国史之诠释，一以贯之。斯即数十年来初未离口之拙论，所谓「三大阶段，与两次转型」也。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后有记录可征之国史，凡四千余年（公元前二二〇〇～公元二〇〇〇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会型态发展之程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之，则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型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与民治是也。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吾侪及身而见之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也。笔者鄙见认为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

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此不学所谓两大转型也。

今日尚主宰大陆史学界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根据马克思主义之教条，则分国史为五段，亦即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包括所谓「最后阶段」之共产主义社会）是也。今因大陆上两制之推行及苏联之解体，社会主义已成过街老鼠，鲜有衷心信服者矣。然不疑之处原亦有其可疑余地也。纵观近百余年来之名家史学，马派之社会发展阶段论之科学性，原未可厚非也。只是日耳曼学人太武断，每好以偏概全；而我国五四以后之启蒙文人，崇洋过当，在学术转型期中食洋不化。致将错就错。盖人类社会之发展虽有其通性，然各大民族之社会发展亦各有其特性，二者交互影响乃形成各民族史之不同型态与不同阶段也。在欧亚大陆上，我华夏民族社会发展之经验足与白种民族[包括闪米特族(Semitic Peoples)]相颉颃。马派史学所总结者，实为白种民族之现象，持之以解释我民族之发展，凿柄就大不相投矣。榫头卯眼大小不同而硬接之，就死人亿万了。思之可悲！

### 没奴隶社会也没资本主义

我国古代中有奴隶(slaves)，而无奴隶制(slavery)，笔者在不同的拙著内曾力证之，国际汉学界亦有公论。[见《新版大英百科全书》(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 30 volumes)一九七七年版。第十六册。页八五八]既无奴隶社会阶段，则我国史上之封建制，实自原始公社(Primitive Commune)直接演变而来。其实马派史学所谓之原始公社者，即初民之部落生活(tribal life)也。盖初民生活原与猴马牛羊等群居动物(尤其是猿猴一类)之社会行为，颇有相似之处。群居动物，居不离群。初民生活亦必以部落为单位，而部落生活必有其自然形成之酋长，有其长幼强弱之分歧，亦有其部落间之交往，及彼此间之竞争与斗争。甚至守土之习惯与夫疆界之划分。亦为与生俱生者。近年生物学家曾发现非洲之黑猩猩(chimpanzee)，各群之间亦每为争夺疆土而发生群斗，其情况竟如初民之间的部落战争。若辈虽无武器可用，然既抓且咬，爪牙并用，为族群之保疆卫土，亦每至死伤枕藉，有时甚至阖族同殉，其惨烈亦不下于我国共相残之内战也。猿猴尚且如此，而况于人乎？以故初民



社会之属土习惯，及长幼强弱阶层之自然形成，实即封建之雏形也。随之，众部落之间，强凌弱、众暴寡、大吃小、尊御卑……，千年演变与进化之结果，乃形成西周时代之高级封建王朝矣。曩昔余读美洲红人史，每惊其与我国三代史之酷似也。近读十七世纪前后在美国维吉尼亚洲建国之印地安「帝国」史，尤信封建制出于部落生活之非虚。盖此邦盛时所拥疆土约为台湾之一倍，其君主保哈坦(Powhatan)属下有大小诸侯三十家。每家各有其大小不同之疆土；每家亦各拥有勇士自二十人至三百人不等也。他们君主与诸侯之间的权利义务亦均约定俗成，颇有可观。保哈坦有女甚美，后来下嫁与英人，颇有贤名。闲读此书，几疑其为《左传》之英译也。（见Helen C. Rountree, *The Powhatan Indians of Virginia: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9. pp. 114—125.）

关于封建社会之特征，我们可以说有两点最为重要。其一则为土地属于天子或诸侯，大贵族可以把土地「封」与小贵族，但不得买卖，百姓黎民更不得私有。其二则是居统治阶层的贵族实行世袭制，黎民百姓除却裙带关系或结帮造反之外，绝不能进入统治阶层。这一东方式的封建制度发展至公元前八世纪的西周之末，可说已登峰造极。唯物极必反，迨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一年）之后，它就开始滑坡以至崩溃了。能把这一从滑坡、崩溃到改制的经过，说得最简单明了的古代记述，实莫过于《汉书·地理志》里的一段记载。且抄录如下：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合纵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见中华书局版《汉书·地理志》，第六册，页一五四二。）《汉书》中这节记载，历史家要在鸡蛋里找骨头，那也是找不尽的。可是作者叙述的封建崩溃的程序，那大体是言之成理的。可是郡县制之出现却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经过数百年慢慢转变出来的。大体说来封建崩溃之开始是，诸侯用各种方法兼并来的土地，不再「封」与他人，而是暂时「悬而不决」或「悬而不封」。这就是「县」

的起源了。在古文里，「县」、「悬」本是一字。读音亦相同。不像后世读成县去(声)，悬平(声)也。县而不封，县而不决，本是个临时的办法。后来永远「县(悬)而不封」，县就变成个政治制度了。

把郡县或州县的「县」解释成「悬」字，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在他的名著《说文解字注》中也说是「县者县(悬)也」；不过他接着说是「县(悬)于郡也」，那就说错了。(见该书万有文库版第三册三十四页)笔者青年期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就读时，随顾颉刚师治商周史便曾指出段氏之误释，认为是「县者悬也。悬而未决或悬而未封」，而非「县于郡者也」。撰成《我国郡县起源考》之期终作业，嗣并收为《毕业论文》之前篇，颇承业师过奖。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益觉青年期判断之非谬。盖封建王朝末期对封地「悬而不封」，古日本及若干印欧民族国家亦有之，只是其结果不若中国竟发展成独特的郡县文官制(civil service)之重要而已。

郡县制之兴起与发展实为我国社会政治(sociopolitical)第一次大转型之关键所在。一转百转，迨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立郡县」，由封建制转入郡县制，全国人民生活方式(lifeways)便无一不转。「废井田，开阡陌」亦是必然之事。所谓「废井田，开阡陌」者，即是开放国有或公有土地任人民私自耕种，以增加生产也。笔者撰拙篇于抗战中期，初不知历史会重演，其后竟有废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等之现代化的「废井田，开阡陌」也。以故笔者不揣浅薄，亦将五十余年前之青年期旧作收入本编，以就教于方家也。

回忆五〇年代中期，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之时，曾在该校之「中国历史研究部」作编译。斯时学部主持人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 1896—1988)教授之巨著《东方专制论》(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正在杀青阶段(此书于一九五七年由耶鲁大学出版，近年曾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译成汉文出版)，魏氏嘱余校订全稿并笺注拙见。不才曾叹其功力惊人，而其结论则因果倒置。盖魏氏修正马克思末竟之学说，所谓「亚洲式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并创立其一己之理论，认为「亚洲式社会」实为一种「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国家为提高农业生产而兴建规模宏大之水利工程，乃导致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逐渐建立起极权专制之国家机器来。其语甚辩，而鄙意

则适得其反。盖我国国家机器之完成，实在始皇帝「废封建，立郡县」，建立「职业官僚体制」(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之后也。我国政治制度之发展，实是郡县制的国家机器建立于先，而大规模之工程(如都江堰、长城及运河等等)则建设于后也。建立都江堰这样大规模水利工程的李冰，便是秦王国的「蜀郡太守」(今日大陆上叫做「四川省委书记」)。李冰若不是利用他省委书记的权力，他的都江堰工程(约同于今日李鹏主持的三峡水坝工程)，是无法施工的。以故笔者数十年来所笃信之我国「国家强于社会」之传统(始自郡县文官制之出现)，为我国政治制度之最大的特点之拙见，与魏氏之说，表面上似颇为接近，而本质上固有其本末先后之异也。

### 百代犹行秦法政

这一记从秦国开始的我国史上的第一次社会政治大转型(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发自商鞅(公元前三九〇～前三三八年)，极盛于始皇(统一中国于公元前二二一年)，而完成于汉武帝(公元前一四〇～前八七年在位)。汉初诸吕乱后，非刘不王，曾一度郡国并存，搞一国两制。迨吴楚等七国乱后(公元前一五四年)，封建之「国」名存实亡，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之政制转型始正式落幕，至今未变。其它相关的转变，如重农轻商的经济制度、独崇儒术的职业官僚制、士农工商的阶级划分、婚丧礼俗的日常生活等等，一转百转走向定型。尤其是中央集权的三级文官制，自秦汉以后，晋、隋、唐、宋、元、明、清，甚至民国时期之北京政府及国民政府，均不断加强之。迨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毛氏当国对此一中央集权的三级文官制之传统，可说更是情有独钟。在他与郭沫若往来的诗词中，便颇能闻其心声。今且抄他一首七律全文如下：

#### 《封建论》——呈郭老

|            |            |
|------------|------------|
| 劝君少骂秦始皇，   | 焚坑事业要商量。   |
| 神龙虽死秦犹在，   | 孔学名高实秕糠。   |
| 百代犹行秦法政，   | 《十批》不是好文章。 |
| 熟读唐人《封建论》， | 莫从子厚返文王。   |

此诗作于何年，论者不一。但在九一三事变之后，毛为四人帮批



林批孔助阵时，重提此诗，可知其念念不忘也。总之毛氏对马列主义之了解，自始至终未脱离标语阶段，而对传统帝制之认识，则深入骨髓。毛之不幸是他把两个极端的理论都误用了。在重温传统帝王政治学时，他体会不了我国传统里「有教无类」、「改土归流」等等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强不知以为知，自以为是乱引马列教条，创造新制度。上节曾说过周初有一千八百国，包含着无数的大小民族(时至今日全国仍有五十七族之多)。所以我国历史的经验是，族群不是由少变多，而是滚雪球式的从多变少，形成一种多文化的大民族(racial regrouping under cultural pluralism)。这在现代美国的经验里，便叫做民族大熔炉(racial melting pot)。加以在今日交通发达，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极高的时代，一国之内之少数民族怎能永远聚居于一地呢？……就以我华裔移民美国来说吧，近年来我华裔人数很快便会超过外蒙和西藏的总人口。今日在美国的所谓中国城(Chinatown，旧名唐人街)，在纽约便有三座之多。我们的政治的出路实在只有落地生根和就地参政之一途。今日我们已出了一个州长，谁能说我们下一世纪不能出个总统呢？我华裔如舍此康庄大道而不由，要来搞个「中国城独立」或「中国城自治」，岂非二十一世纪一大笑话哉？大美帝国海阔天空，要我们挤在 Chinatown 内搞「独立」，不特我华裔有为子孙所不愿为；青年期曾在 Chinatown 做打工仔的老朽如愚亦不干也。其理甚明嘛！华裔之外，如人逾千万之非裔、人逾六百万之犹裔，人逾两百万之波裔，他们不搞独立，正有同病之怜也。所以美国能从十三州发展至五十州者，实我中华千年以来所搞的「改土归流」之美洲翻版也。朋友，现在台湾和菲律宾还有很多人，想参加美国的改土归流，做美国的五十一州呢！改土归流有何不好？

民国初年的孙中山毕竟是个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临时大总统时，就反对所谓五族共和这套谬论。他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民族大熔炉的哲学，而扩建一个包罗所有民族和多种文化的中华民族(见《三民主义》文言文原稿，收在台湾版《国父全集》，页一八〇～一八一)。其实在大清帝国时代，朝廷改满洲和新疆为省；民国时代改内蒙为省，当政者所采取的也正是这个大熔炉的哲学。不幸到人民政府时代，毛公因受苏联制度之影响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误为进步，废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内蒙、广西又全部化为少数民族的自

治区，而又只许少数民族在中央集权下，享受点象征性的自治，这样就间接鼓励了少数民族中的分裂主义者和国际间的反华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动了。这种伪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后来也就贻患无穷。今日新疆的乱源即在此。

**【附注】**在早版《毛选》中，毛泽东曾主张少数民族有权独立，后版中他们就只能「自治」了。毛自己的思想反反覆覆，便十足表示他对此问题没有原则性的掌握，随意搞其黑猫白猫，而堕入中国历史上原先并没有的大汉族主义的框框，实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类似的情况下，毛泽东对现代的民治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认识不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明挑战(challenge)之下，「百代犹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续，但他老人家却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续下去，其不出纰漏也，岂可得乎？朋友，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近代转型史(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原只是个转型中期的民族领袖。他个人的个性、见识、修养、训练和时代，都只能铸造他做个转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个完成转型的汉武帝。这就叫做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自视为天生圣哲，其实他和读者贤达以及在我的我一样，也只是个渺小的脊椎动物，并不能扭转他们唯物主义者曲不离口的所谓「客观实在」啊！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但是他这个盖世英雄却未能创造时势。夫复何言？

我们及身而见的第二次大转型，与第一次大转型颇有不同之处。第一次转型时，由于我们内部的社会发展至某一阶段，促使我们社会政治结构非转型不可，那是主动的。第二次转型就不然了，它几乎是完全出于西人东来之后，对我们着着相逼的挑战——尤其是军事挑战。这一挑战揭开了近代中国国耻国难和社会政治大转型的序幕，于是有那个可耻的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和随它接踵而来的《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鸦片战争之可耻是双方都有份的。胜者的可耻，是他武装贩毒，竟不以为耻；败者的可耻，是他颓废腐化，政府无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国竟被数千个英国水兵打得一败涂地。

**战前千年不变，战后十年一变**

鸦片战争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长话短说，便是它推动了上述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在这两大阶段之间，它是个分水岭。战前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毛泽东所说的秦法政)是千年未变的；战后的中国那就十年一变，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这一转变过程虽万般复杂，但是事后回头看去，却又阶段分明。在各阶段中，身当其冲的革命家、变法家、观察家乃至一般智者与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无法识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数智者(像洪秀全、康有为、毛泽东等人)往往自以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势，难免就强人从己而贻误苍生了。

早朝的历史家，虽也不时回头看去，试作过历史分析。无奈这次转型，如果最后能转出个长治久安的定型来，根据中西历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时两百年才可能有个初步的结果。因此在转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时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分析家对中国前途的变数，实无法掌握。盖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渐少，羊在何路不难追踪，中国前途的远景何似也就隐约可见了。俗语说：「女大十八变。」小女孩才变了三、五变，您怎能看出她的变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变了十五变之后，将来她会成为怎样的一位夫人，我们也就不难预见了。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非后之来者胜于前贤也。

根据笔者大胆的观察，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实在是从割让香港之后才被迫开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难岁月也悄悄地溜过去了。从林则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传了五代了。古语说：「五世其昌。」当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经说过：「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见《夷务始末》道光给林则徐上谕）今日香港回归，国难结束，可能也是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完成的开始。笔者不揣浅薄，回顾前瞻，预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应可完成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伟大的历史任务。国有定型，民有共识，以我国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潜力，走入人类历史上民治主义的新时代，开我民族史今后五百年之新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舍我其谁？笔者毕生治史，历经国难国耻，艰苦备尝，守到天明觉夜长，终能初睹曙光，亦为之兴奋不已。谨以这部小书，野人献曝，追随读者之后，略表个人对香港回归之庆贺，至恳方家贤达，不吝教之。



本篇之能付梓，实有赖于刘绍唐、陈宏正两先生不断的指导，以及无数老友和读者热情的鼓励有以致之，衷心铭感，匪言可宣。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兄以下诸多执事之大力协助，感激之情尤难尽述，并此致谢。

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谨序于北美洲

## 目 录

□ 自序：告别帝制五千年

### 【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各阶段

二、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

三、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

四、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

五、中国郡县起源考（附跋）——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

六、论帝国与民国之蜕变

七、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

八、论「转型期」与「启蒙后」

九、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十、中国近现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十一、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袁同礼先生

### 【贰】太平天国

一、论晚清周期性内乱与洪杨悲剧

二、太平开国故事再检讨

三、预言书中的蒋毛与洪杨

- 四、「四不像」的洪杨割据
- 五、两次「长征」，两番「寸磔」
- 六、长征有始有终，丧权没完没了
- 兼论小刀会起义上海及英人窃据我海关始末

### 【叁】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

- 一、「甲午战争」百年祭
- 二、慈禧太后和她的颐和园
- 三、为黄海血战平反
- 四、一百年后回看戊戌变法
- 五、解剖康有为
- 六、「新学伪经」和「托古改制」
- 七、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 ◎附录：汉代的太学

- 八、那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 【肆】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 一、传教·信教·吃教·反教形形色色平议
- 二、列强刺激·太后玩火·端王窃政·群运出轨
- 三、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始末
- 四、不堪一击的拳民与七国杂牌军
- 五、「门户开放」取代「列国瓜分」



## 【伍】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

- 一、从蒋中正与毛泽东说到袁世凯
- 二、从中原世族到朝鲜监国
- 三、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
- 四、卷入三大危机·一项运动
- 五、论孙文思想发展的阶段性
- 六、细说辛亥革命
- 七、同盟会是个革命大拼盘
- 八、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 【肆】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 一、传教·信教·吃教·反教形形色色平议

在中国近代「转型期」的转变过程中，戊戌变法是个重要阶段。变法失败固然是件惨事，而真正可悲可叹，乃至惨不忍言的，却是它的后遗症，那椿几乎引起中国遭「瓜分」(The Partition of China)之祸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乱。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是戊戌政变的立刻后果。但是这件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拳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拳乱差不多过去快一百年了。近百年来，中外史学家，尤其近十年来在数次有关键性的国际研讨会之后，可说已把这椿惨史的事实，弄得相当清楚。就历史事实发生的经过来说，史家已大致没太多争辩的了。但是各派史家对这椿史实的解释，则仍是南辕北辙，各异其趣；有的甚至指着鼻子，相互辱骂。

不用说在事变当时的一两年中（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大清帝国的宫门之内，就为是非问题而弄得人头滚滚；一百年来的中外、新旧、左右、前后各派史家，以及国共两党的宣传家、理论家，中外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乃至东方和西方的社会科学家、宗教家、政治家等等，对这椿历史的解释，也是两极分化，各不相让的。

我们应该承认，作为一个华裔史学工作者，对这件惊天动地而是非难分的历史事件，要想笔端不带感情。而据实直书，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相信，古今中外，任何惊天动地的历史大事，都应该

有其基本上的公是公非的。戴有色眼镜、作曲笔之言，都是不对的；其记录也是不能传之后世的。

历史家如能压低他从任何背景所承继来的知识、经验和感情，心平气和地来寻觅这件史实的公是公非，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本篇在落笔之前，笔者就希望先把这件历史事实，简单扼要地弄清楚之后；在各派史家对此史实都会觉得没太多争辩之时，我们再进一步的来加以注释：是其是、非其非，找出它比较接近真理的「公是公非」，作为定论。

### 先看「曹州教案」

比较具体的说，义和团之乱，应该是从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阴历十月）所发生的「曹州教案」开始的。当然教案不始于曹州，义和拳也并非曹州土产。但故事从曹州教案说起，我相信是个比较实际的选择。

曹州教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清末山东曹州府属下的巨野县有个德国天主教堂和属于该教堂的一些教民。一次这批教民和当地人民发生冲突，教堂袒护教民，因而引起群众暴动。在暴动中有非教民一二十余人冲入教堂，一下不但把教堂砸了，连教堂内的两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Franz Nies）和理加略（Richard Heule）也被无辜的打死了。这一来闹出人命，尤其是那时享有「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的外国人命，就变成列强「强索租借地」（The Battle of Concessions）的导火线了。

曹州府位于山东省西南部，下接江苏省的徐州府，是个出「响马」



的地方，民风强悍。《水浒传》里的「梁山泊」，便在曹州境内。唐朝末年「黄巢杀人八百万」，也是从曹州开始的。继洪杨而起的「捻军」。也起于这一带。不用说清末乱世了，就是一般太平盛世，当地老百姓之间的械斗也是随时都有的。出了几个武松，打死几个西门庆，本是司空见惯，不算稀奇。只是这次械斗的一方是教民，教民之后有洋人撑腰，问题就复杂了。

### 外国教会是中国第二政府

须知那时在中国的洋人，都是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太上皇，他们都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的保护；犯了中国的法，只有他们自己的「领事」，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才能「裁判」他们。

纵使是外国教会传教士设在中国的教堂。也形同中国境内的第二个政府。外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官员也是按照对等职分，平起平坐的。据当时满清朝廷的规定：教会中的「主教」是与中国一品大员的地方官「总督」、「巡抚」平行的；「副主教」与「司、道」（省区二级官员藩台、道台）平行；「神父、牧师」与「知府、知县」平行。

在那官权高于一切的专制时代，老百姓对亲民之官的县太爷，都要叩头跪拜，尊称「老爷」的。老爷的妻子才许叫「太太」。哪像今天的台胞和华侨，动辄介绍自己的老伴为「我的太太」。今日大陆更不得了，开口闭口「我的夫人」。「夫人」者，在那义和团时代，政府高官、三品以上「大人」的老婆，始可有此尊称也。

相对之下，则洋教会中主教的老婆，就等于中国的「一品夫人」；牧师的老婆都是「太太」。一般「子民」老百姓见之，都是要下跪的。

所以那时在中国传教久了的西方传教士，一旦回到他们自己国内做平民，对他们根生土长的社区，都很难适应。因为他们在中国时，都有高官的身分，和供使唤的婢仆。高官就难免有「僚气」。有僚气的人，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社区之内，就很难适应了。

西方教会既然在中国境内形成了「第二个政府」(有时甚至是「第一个政府」)，则在这另一个政府庇护之下的「教民」，也就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

**【附注】**西方教会中的主教原都是有妻子的。有妻子自然就会有儿子。儿子在父亲死后自然就会争遗产。而主教当时都掌握有教会产业；而教会又是大地主大富翁。因此主教一旦死亡，则嫡子嗣子的遗产之争，就闹不完了。这样教廷乃干脆禁止主教们娶妻生子。

### 教民是怎么回事？

教民又是怎么回事呢？教民现在叫基督徒。那时中国境内极少中国牧师主持的华人教堂，所以中国基督徒都是在外国教会在中国建立的教堂中做礼拜。信徒全是由外国牧师领洗的。中国人虽久有一盘散沙之喻，而洋教会则善于组织。因此当时分布在山东省各教会中心的中国基督徒（人数约在两万至四万之间），实在是一个在外国牧师领导之下，很有组织、极有力量的一个社团。这个社团的「领导」（恕我借用一个目前通用的名词），每个人都享有「治外法权」。在「领事裁判权」保护之下，他们既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他们对接受他们传教的中国教民，也就只按他们的教义来加以保护了。所以这时在山东

的教民不是弱者。他们的团体在当时多重中心的中国社会里，其力量不但足与任何黑、白社会的民间团体（如大刀会、红枪会、八卦教、义和拳、青洪帮、农会、工会、宗亲会、同乡会等等）相抗衡，它甚至把当地权力无边的各级衙门也不放在眼里。——满清政府对当地人民虽享有生杀予夺之权，但是他们对在洋教会保护之下的教民，就凡事让三分，不愿自找麻烦了。

因此，那平时极少制衡的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这时总算碰到一个克星——那个足以与它分庭抗礼，甚或权势犹有过之的外国教会。所以从「抗拒那极权政府的鱼肉人民，和防制社会上恶势力欺凌以及引领教民走上比较现代化生活」这个角度来看，洋教会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里，有时也发生着很多的正面作用。

慢说清末那个腐化的政府了，就以目前这个张牙舞爪的北京人民政府来说吧！我们那个橡皮图章的「人民大会」，对中国人民所应享有的人权、民权的保护，究有多少实效呢？朋友，你嫌老美干涉我们的内政；他们的国会动不动就为我们的「人权」投票。但是我们的国会既然保护不了我们自己的人权，人家不愿只「自扫门前雪」，偏要「替天行道」，到我们门前来吵吵闹闹，发生点国际制衡作用，又有何不好？我们都是共同「球籍」的居民嘛！我们如果由于受不了芳邻善意的骚扰，便要拉拢一向不怀好意的恶邻日本，组织「大东亚共荣圈」，来和老美「冷战」，甘心让鼠首两端的日本反动政客来打「中国牌」，那就偷鸡不着蚀把米，后患无穷了。这虽然是题外之言，然一念及之，仍情难自己也。

## 耶稣会士与文化交流

可是那时的中国教民既享有如许的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优势，而信教的人，还是寥若晨星（约合山东全省人口的千分之一），原因又在哪儿呢？

简单的说来，那就是个文化融合的问题了。不同的文化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同一个社会里同时流行。就要发生社会矛盾；在家庭生活上也发生严重的代沟。要使这两种生活方式「水乳交融」；要打破这两个泥菩萨，再揉成两个泥菩萨，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所以当时中国老百姓之所以拒绝信仰洋教的原因，便是在那时的中国社会里，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和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不是水和乳的关系，而是水和油的关系。二者是融合不起来的。

须知任何宗教都是从一个特定的民族文化中滋生出来的；然后再以此民族文化为基础，推陈出新，发扬光大，向其它民族文化中渗透传播。基督教原是发源于犹太民族文化之中。是「犹太教」(Judaism)中的一个有革命倾向的开明支派。基督本人被钉上十字架时，他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基督之死，只是一个开明改革派的「犹太教徒」殉道而已。可是基督死后，那些尊师重道的基督之徒（在中国儒家则叫做「仲尼之徒」），保罗、彼得之辈受不了犹太本族的宗教迫害，乃向欧非两洲的异族之中钻隙发展；历尽异端迫害，终于篡夺了东西罗马的政权，成为独霸欧洲的宗教。在北非，他们也建立了一个黑色基督大国的亚比西尼亚（今衣索匹亚）。在欧非两洲分别传



播的基督教虽截然有别。——在欧洲的教义内，「上帝」是没有形像的；但在早期非洲基督教会内，「上帝」则有个人形塑像，也和佛道两教寺观之内的雕像是大同小异的。所以，洪秀全在梦中所见到的红脸金须的「天父皇上帝」，原是《旧约圣经》和非洲基督教中的上帝。美国当年的新教传教士罗孝全，不承认洪秀全的上帝，实在是他神学史未搞通而少见多怪。但是不论欧非两派是怎样的不同，他们同出于最早期基督使徒之传播则一也。

可是基督教却与中国文明风马牛不相及。在唐朝初年东罗马正教的波斯支派（The Nestorians）曾一度循「丝路」东来。但是它除留下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外，历史家找不到它是如何流行的，影响就更谈不到了。至明末清初，尤其是清初，「耶稣会士」(Jesuits) 奉教廷之命来华传教。但是清初的康熙二朝实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世。这时的中国把那些传教士真看得目瞪口呆。这批「耶稣会士」都是些圣洁(holy)而有殉道精神的学者。在当时中西文明互比之下，他们觉得当时的欧洲在政治管理、社会道德、经济成就各方面往往西不如中。因此在所有传教士书简中，真是众口交赞——甚至是未说过中国一句坏话。所以他们东来所走的路，不是「单线街道」(one-way street)。中国文明之西传，他们也是功不可没的。这些耶稣会士当年所搞的是一种真正的东西文化交流。他们要修正他们自己的教义，来配合中国的儒家道统，截长补短、采精取华的融合共存。不幸在十七、八世纪之间，他们的教廷却愈走愈教条化；而中国宫廷之内的政争也把他们无端卷入。因此这场多彩多姿、平等互惠中西文明之结合，

就无疾而终了。

### 全盘西化论的先驱

耶稣会士绝代后百余年，十九世纪中期欧美传教士又接踵而来。时隔百余年，双方环境都完全变了样。这时大清王朝已走入衰世——政府腐化无能，社会贫穷脏乱，公私道德也全部破产，真是人不像人，国不像国。而这时的欧美国家却正如日出东山，朝气蓬勃。纵是在他们治下的殖民地如香港，租借地如上海、广州和天津的各国租界，都远比中国境内要高明得多。

在这个尖锐的对比之下，十九世纪的传教士就没有当年耶稣会士那种虚怀若谷的雅量了。这时的传教士也不是像当年的耶稣会士那样经过教廷选拔而为宗教献身的圣徒。他们很多都是《圣经》之外别无所知的神职人员；有许多更是由乡曲小教堂筹款，把他们送到海外的落后地区传教的。因此他们一开始，就有不可一世的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感，认为他们传教的对象是一种遍身罪恶、满身传染病而无文化的异端。这种异端蛮族也只有信上帝，全盘基督化，才能「得救」。

所以十七世纪与十九世纪从西方东来的基督徒传教士的作风，简直是南辕北辙。前者所做的是两个对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后者则是一边倒——中国人民如要「得救」，就只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而全盘基督化，也就是「全盘西化」。他们实在都是「全盘西化论」的先驱。

当然那时中国的宗教信仰（如看相算命、崇信城隍土地），和一般生活方式如缠足、纳妾、吸毒、盲婚……等等都表现得十分落后甚

至野蛮的。但是中国文明中亦有其可取之处。不可因噎废食、玉石不分。除旧布新，原是一切有文化的社会都应该做的事。斯之谓「现代化」也。中西文明之对比，非中不如西也。只是中国文明「现代化」之起步，晚于西方文明三百年而已。

即以医药一项作比。中古时期中国之医药，实远胜欧西；而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时，则「中医」较「西医」之落后就不可以道里计矣。然「中医」（如草药、如气功、如针灸）又为何不可「现代化」、「科学化」，以至于「中西医结合」，截长补短，互惠合作呢？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废除中医，全用西医呢？

所以我们谈「中西文化之比较」、「中西文化之融合」、「东西宗教之对比」等等比较史学和比较文化上之专题，实千万不能忽略其间的「阶段性」。中西互比，我们只能以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近代比近代，而分别论其短长。不可不分层次，不辨古今，囫圇吞枣，而泛论一切！

吾人如自觉近两百年来，在「现代化」过程中落后的衰势中国文明，远不如「现代化」较早，而至今仍处于盛势的西方现代文明，就要尽弃传统。「全盘西化」，这原是启蒙时代的幼稚病；启蒙诸子的矫枉过正之言，不值深究。而好汉专提当年勇，不分阶段、囫圇吞枣，硬说精神胜于物质，东风可以压倒西风，当然更是不通时务之论。要知东西文化，原无优劣；而时间今古，则长短分明。

不幸的是，在那清末民初之世，中西双方均各走极端。西方神职人员之来华者，认为落后贫穷的中国异端，除信他们的上帝之外，无

二话好说。伯驾牧师说得好：「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bend or break）。」因此那时纵是最善良、最具好心肠的传教士。对他们母国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胡作非为，也多表支持。有的甚至认为「帝国主义」并不存在。此一「帝国主义不存在论」的心态，其后且蔓延至西方汉学界。连新近才逝世的西方汉学泰斗的费正清先生亦终身服膺之。到他写完自传的死前数年，才稍有转变。

这是那时西方人在中国的基本态度。这一态度如不改变，则西方教士传教中国，就永无安宁之日——上至士大夫，下至工农兵，都要一致抗拒了。太平天国之覆灭，就是中国士大夫抗拒基督教之结果；如今义和团之兴起，则工农兵和基层社会中人抗拒基督教之行为表现也。拳乱之时，除少数满洲贵族乘机附和，企图扶清之外，汉族士大夫几乎完全靠边站；甚至有奋起「剿灭拳匪」者。非汉族士大夫有爱于耶教也，只是他们头脑较为清楚，吃一堑长一智，认为洋人惹不得罢了。

### 士大夫和工农兵抗拒耶和華

若问中国士大夫和工农兵为什么一定要抗拒基督教呢？为此难题，近年来台湾基督教会在一些杰出领袖如林道亮、阮大年、王永信、周联华、林治平诸先生策画之下，筹有巨款，设立专门计划来加以研究。

据吾友李湜源教授的解答，中国人未尝反对耶教也。只是耶教教义与中国伦理传统互异，二者交流乃发生严重的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不解决，则中国人就难于接受耶教了。李君亦是虔诚的基督徒，



对神学与神学史均有深入的研究。举例以明之，李君就认为曾在《圣经·旧约》中出现六千次的「上帝的上帝」耶和华（Yahveh）就不是「中国人的神」。下面且抄一段李君对耶和华的讨论：

耶和华是一位很特别的神，第一，他是神人合一。他有手，有指，有脚，有腿，有眼，有耳，有口，有鼻，能说话，有声音。他能够种树，也能够缝衣。他是男性，是父亲，有儿子，他能教训，也能咒诅，他能记忆，也能忘记，他能笑，也能哭，也能喜、怒、哀、乐、爱、恶、欲。他有一定的住所，西乃山是他居住的地方，但是他又时常奔走，「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篷到那帐篷。」（《历代志》上，第十七章第六节）第二，他是一个恐怖（Terrible）的神。原文「Terrible」一字，中文圣经译作「应受敬畏」。「耶和华因为不能把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十六节）「我是耶和华，不轻易发怒。我有浩大的爱；我赦免罪恶和过犯。然而，我一定要因父母的罪恶而惩罚他们的子孙，甚至到第三、第四代。」（《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十九节）「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与米甸人打仗。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原文作曾与男子性交的）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指小童）凡没有出嫁的（原文作没有与男子性交过的），你们都可以存留他的活命（原文作留作你自己使用（奸淫）。）」（《民数记》第三十一章第七至十八节）「耶和华是一位嫉忌的神，他的名字就是嫉忌。」（《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第十四节）「嫉忌就是我（耶和华）的圣名。」（《以西结书》第三十九章第二十四节）。在旧圣经我们可以处处看到，耶和华是一位战神，是一位犹太人的神。

湜源认为耶和华是一位犹太人的神，是一位战神。吾人授中东文化史，固知所有发源于中东的宗教，都是战斗的宗教；在中东寄居或过往的民族所崇拜的神，都是「战神」。因为中东地区，自古便是四战之区，人民不好战便不能生存；为战争而激发的宗教所崇奉之神，自然也都是战神了。

战没什么不好。不过他与宣传反战的儒佛两教，也是教义不投的。

所以中国人很难接受上述的耶和華。

李君又提到「十九世纪中国人信教原因（之一），是因为教会能够赦罪」。但是教义里的可赦之「罪」不是「罪恶」的罪（Crime），而是「过错」的罪（Sin）。那时中国教民受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洋教士的庇护。「中国人犯了罪就参加教会，得到罪的赦免。因此参加教会要付相当的价钱。」当年教会办的刊物，就记载过一则故事如下：

一位（西方）传教士在渡船里听到两位中国人磋商购买参加教会证书的价钱。这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某个中国城市，中国传道人要定下普通参加教会证书的价钱。（见《教务杂志》一九一〇年三月，页二〇九。）

李教授也对章力生先生所著的《人文主义批判》，作了些反批判。

章君说：

东方是异教的大本营。我们要使基督教会在东方扎根，建立不拔的基础，必须掀动异教的文化结构和哲学系统，向他们积极挑战……

湜源又说：

章先生劝告中国人，大彻大悟，在全能全知的真神之前，去其「娇气与多欲、色态与淫志」；好像「多欲」、「淫志」也是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原因。（章力生《人文主义批判》，页四）（见李湜源著《中国人与基督教——商讨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响》，载《文艺复兴月刊》，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民国七十年（一九八一）十月一日，第一二六期。页五八～六二。）

章力生先生还是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一位笃信基督的良心教

徒。他的言辞之一边倒，和他反华卫教态度之绝决尚且如此；我们可猜想庚子年间，那些享有「知府」、「知县」地位的西方传教士，其卫教反华的态度，就不言可知矣。明乎此，我们也可了解当年所谓「民教冲突」的因素是多么复杂。

### 其罪可赦而养儿不能防老

须知当年的中国基督徒原有「良心教徒」(Conscience Christians)与「吃教教徒」(Rice Christians)之别。良心教徒一旦入基督之门，则终日忏悔有罪，时时在上帝之前思图自赎。

老来笃信基督的张学良将军夫妇，便是一对标准的良心教徒。前年张将军在其九十寿诞致辞时，劈头一句便说：「我是个罪人！」当时曾使全场大惊。或谓少帅当年在李烈钧庭长之前都没有认罪。这一下被关了五十年，反而认罪忏悔起来，亦见军事委员会「管教」之有方也。其实张氏所讲的只是基督教义里的一个术语，他所「认」的只是此罪(sin)，而非西安事变时所「犯」的彼罪(crime)也。可惜在国民党的传统之中，党魁之外，教民寥寥。听众之中，通基督教义者，小猫三只四只而已。所以大家就错把冯京作马凉。以为少帅对西安事变这项「罪恶」，忏悔了，认罪了。因此全场大鼓其掌，亦民国史中趣事之一也。

把少帅之 sin 当 crime 来曲解，小事也。最多让后世史家上错一笔帐，也使把少帅看成「千古功臣」的中共党人稍感惶惑罢了。可是对基督其它教义如「赦罪」的误解，那关系就大了。根据教义「罪」既可「赦」，则又有何罪不可「犯」呢？——这就对「吃教教徒」为

非作歹，大开方便之门了。

抑有进者，纵是那些最善良最虔诚的良心教徒，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有时也可制造出极严重的社会矛盾。举例以明之：当时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是以「反孝」甚或「仇孝」作号召的。他们认为人只能向上帝尽孝，不应向父母尽孝。笔者便有一位在中国出生，说得一口京片子国语的传教士好友。她当年在北京对一位搞「晨昏三叩首」形式主义的满族「孝子」，印象太坏了。所以她一辈子坚持她的格言：「孝顺」就是「笑话」。

清末在中国传教最有成绩也最有见识的美国传教士，后来又做到中国「同文馆」乃至「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W. A. P. Martin, 1827~1916），也坚持相同的意见。他认为人对上帝的孝顺，不应被人对父母的孝顺所阻隔。

基督教这种上帝独大的「反孝」立场，因此与当时「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伦理，便针锋相对了。我们如把十九世纪末年来华的传教士与十六、七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相对比，则后来者就显得武断专横多矣。

笔者不学，亦尝读布道诸子之书，对他们处理如「孝道」这类的社会问题之轻率自信，就时感骇然。姑不论其道德价值如何，「孝」的本身却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a socio-economic institution)。在那个缺乏「社会立法」(Social legislation)、社会保险，没有退休金、养老金的中国传统（今日仍然如此）的社会里，「养儿防老」岂只「道德」而已哉？社会经济之必需也！

设有男子，受了上帝影响，或经济和老婆的压力而置父母饥寒于



不顾，这一「不孝子」，不但道德有亏，为亲友乡党所不齿，他在《大清律例》之中也是个「刑事犯」，要被捉将官里去的。

假若这个刑事犯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甚或只是个「吃教」的骗子。但是这个官家捉人的消息一旦由他家人妻子哭诉到教堂里去，那些笃信教条、诚实而又偏心的外国牧师们，可能便要向官方施压索人。那时畏洋人如虎的满清官吏，为自保禄位，息事宁人，多半也就遵命开释。

那位精通中国语言文字，并曾在说京粤语的华人之间充当方言翻译的丁韪良，在他的自传里就曾自炫他替某些「不孝父母的上帝信徒」，开脱过罪名。这些中国伦理范畴内的「不孝子」，在洋人的庇护之下，是逃脱了中国法律的制裁，但他却逃不掉社会舆论的指摘。一旦他那年迈无依的二老，把家事闹上街头，则「梁山」下来的英雄，「大刀会」里的好汉，内外兼修、精通「义和拳」的气功师，就要仗义、行侠、锄奸（不孝子）、除暴（洋教堂）了。为锄奸除暴而砸了教堂、打死了洋牧师，问题就大了。打死人的李逵、武松等「义士」，可以上梁山一逃了事，但是这命案变成了国际事件，则本地县太爷、太守、刺史乃至中央的总理衙门，就无处躲藏了。中西读者们，且设身处地的想想，你如是那时处理这件公事的中国县太爷，你应该怎么办？

以上所举只是当年千百个「教案」之一例。其中是非曲直，从何说起呢？不幸的是当年的教会中人都是跟随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闯入中国内地的，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经济结构都只是一

知半解，而对他们自己教义的坚持，则半寸不让。因此对中国官府民间动辄颐指气使。中国政府对教会过分忍让，则失信于民；民间组织自行抗拒，在洋人压力之下，官又指民为匪，妄肆诛戮。如此恶性循环，治丝益棼。最后官方威德两用，剿抚兼施，难免又良莠难分，养痍成患，为无知昏聩者所利用，则义和团之形成也就无可避免了。

### 一根油条大小的国际交涉

再如咸丰年间影响中美关系极巨的小教案，则起源于美国牧师以发放铜钱，鼓励市民于礼拜天入教堂做礼拜惹起的。一个铜板对富有的美国牧师，只是九牛一毛，但它对流落街头的广州贫民，则至少是一根油条的价值。为控制这根油条的布施，礼拜天的教堂门前就要发生（如今日在美国亚裔社区内所习见的）「帮派斗争」（gang fight）了。青龙白虎两帮为抢地盘，大打出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美国教堂也被砸了。

这椿砸教堂打教民的街头武剧，被洋牧师闹入衙门，就变成国际事件了。等因奉此，那位出身牧师，后来变成美国驻华使馆的翻译，递升代办，终成公使的外交官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乃行文要求清政府赔偿损失。那时畏伯驾如狼，而讨好美国公使更唯恐不及的清廷钦差大臣，非敢不赔也；他老人家怕的是，此恶例一开便不得了也。他们就只好拖延。但是那时的美国佬也不是好惹的；伯驾岂是等闲之辈？他坚持清方非赔不可，案件一拖十年，竟成为咸丰朝（一八五一～一八六一）中美外交中最大的疙瘩。最后还不是清朝大臣打躬作揖，赔款了事。

这个由于传教失策引起街头帮派打架，再由帮派打架殃及教堂，递升为国际外交症结的小故事，笔者笨拙，不惜囚头垢面，自美国档案中穷索之，终于水落石出。但是这一类事件，在一些有既定成见而又不愿深入的史家的笔下，都变成华人排外反教的实例。

其实，朋友！他们为上帝的一根油条打架是真；排外反教的帽子就未免太大了。

### 儒徒、佛徒比较阿 Q

在这百十件「教案」中，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为排外而排外，为反教而反教的实例，因为「排外族」、「反异教」都属于基本「人性」(human nature)。各民族之间只有程度深浅的不同，没有有无的例外。试看摩西的出埃及；基督之上十字架；古罗马人之屠杀基督徒；中古教廷之焚杀异端；近古之宗教战争；回教之崛起与传播；回教两派之内战……，血流成河、尸骨堆山，何一而非排外族、反异教耶？

但是在世界各大民族及主要的宗教文化之间，还算是儒佛两教较为缺少「排他性」。凡耶教、回教所不能忍者，儒徒佛徒多能身受之。余读教士书，知彼辈来华之初，多乏托身之所。初期天主堂与基督教堂迨多借地设于佛寺、道观之内。其神父、牧师讲道往往便置十字架于佛前香案上。宣道至高潮时，往往便挥杖直指神坛上泥塑木雕之佛像，斥之为胡涂偶像，有罪而无灵……基督教原为排他性极强之宗教，对异教之「敌我矛盾」，界限分明。诋辱异端之百辞，均极严峻；而传教士笃信本教真理，亦从不讳言之。有时在其辱骂异端至激烈之际，四周围听之僧侣与群众不但不以为忤，每每且为之欢笑助兴……余读

书至此，辄掩卷窃笑，想我民族何阿 Q 若此？然亦中国文明宽容之一面也。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正是圣贤之道也。

试思此一情况如主客易位。设有东方黄人，于坐满爱尔兰码头工人（Irish longshoremen）的纽约天主堂内，挥杖直指怀抱婴儿之圣母玛利亚（Virgin Mary）为无知村妇、玛利亚之子为顽劣牧童，岂不头破血流，天下大乱哉？

华民非不反异教也。然华族固为一无宗教之民族。群众百姓一般均安于土宗教（Folk religion），随地拜拜，神佛处处，再加几个耶稣、上帝，不以为多也。有教无类，故对入侵异教，颇能阿 Q 之。斯为独崇一教之中东及西方诸民族所难能者。所以若论反异教，则我民族较之西人，较之回犹诸族，宽容十倍矣。

作者落笔至此，电视内正演映前南斯拉夫境内塞尔维亚族耶教徒与波斯尼亚境内之回教徒相互残杀，血肉模糊之镜面。为虚无的超自然而相杀，我民族史中，除洪杨一役之外，未尝有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杀生人而事鬼神，科学耶？民主耶，终须等到中西文明现代化扯平之时，始可言其是非也。

### 德人强占胶州湾

可是在那义和团时代，最可叹的还不是这些宗教上和哲学上的是非问题，而是德国凯撒以此为藉口而强占了中国「胶州湾」的政治问题。德人既占胶州湾，其它帝国主义之列强乃发生连锁反应。中国沿海港口上自旅顺、大连、威海卫，下至九龙、广州湾，一时均为列强所霸占——九十九年之强租与霸占何异？由港口之霸占，乃有列强对



中国内地「势力范围」之划分。若非由于诸帝国主义之势力相持不下，则大清帝国早就变成波兰了。

此一瓜分局势之形成，实德意志帝国以「曹州教案」为藉口而始作俑者。义和团就是国人对这次国难愚蠢的反应。

德国原为近代世界政治史上扩张主义之后进。所谓德意志联盟本来只是日耳曼民族之间一个松散的城邦组织。一八七〇年（清同治九年）普鲁士一举击败法国之后，普王威廉一世在名相俾斯麦策画之下，一跃而为诸邦之首，德意志始粗告统一。其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至一八九〇年威廉二世即位，俾斯麦罢相时，德国后来居上，俨然已发展成为当时一主要的中欧强国，搞合纵连横，不可一世，而威廉对外扩张尤迫不及待。不幸此时亚非拉诸落后地区，已为诸先进列强所瓜分，空隙极小。至一八九五年中国为日本所败，割地赔款。这对欧洲后进的帝国主义德意两国却是个极大的鼓励（意大利之统一、复兴及扩张，几与德意志同一时间，同一模式）。两个迟来晚到的小强梁，当意大利在浙东三门湾一带伺隙而进之时，德皇的先遣密探已在胶州海面打主意了。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阴历十一月十日）德国驻华公使海靖（Herrvon Heyking）乃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胶州湾五十年之要求。

总理衙门在它的创办人恭亲王奕訢主持之下（奕訢是同治和光绪两个皇帝的胞叔），爱护胶州事小，怕列强援例事大，乃加以婉拒，交涉经年，没有结果。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和他派驻北京的海靖公使，这时气焰正盛。威廉已派有实力可观的远东舰队游弋于胶州湾内外，

虎视眈眈。这是当时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所享有的特权，而中国北洋海军则于甲午战败后，今已一舰无存，无丝毫抵抗能力。

就在这德国已准备动武而没个藉口之时，正好发生了「曹州教案」。这时中国的山东巡抚是李秉衡。李氏本于教案（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发生前一月已调升四川总督，遗职由张汝梅接替。不幸他官运欠佳，正办交代而尚未离任时，曹州就出了事。李氏自知大事不好，乃倾全力「破案」。十一月九日竟将曹州杀人犯全部缉获，向德使请罪。但是这时德人已决定借机强占胶州湾，并囊括山东为势力范围，请罪有啥用场呢？

德皇于十一月九日始得曹州教案之电讯，经三数日外交试探之后，德国远东舰队乃奉命于十一月十四日轰击中国炮台，陆战队随之登陆，占领了胶州湾，并拘禁奉命不抵抗之中国驻军总兵章高元，再向邻近即墨等属县进袭，一时难民如潮，血流遍地，时局就不可收拾了。

于此同时，德国公使向北京总署，亦提出六项要求：

- 一、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李氏尚未到任的四川总督也就被革了）。
  - 二、赔三座教堂建筑费各六万六千两，教堂失物费三千两。（这笔款子在那时是大得惊人的。）
  - 三、巨野等七县建教士住屋，建费两万四千两。
  - 四、中国道歉，并保证永不再犯。
  - 五、中德合资建全省铁路，开发矿藏。
  - 六、赔偿德军侵胶澳军费约数百万两。
- （引自摩尔斯著《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卷三，页一〇七。）

此六条墨汁未干时，德使又补提若干条，在落实上述路矿要求之外，更提出租借青岛及胶州湾九十九年之详细条款。

这时清廷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之下，焦头烂额，在君臣对泣一番之后，也就全部承认了。经四月之磋商，这项《胶州湾租借条约》就在翌年三月六日（阴历二月十四日），正式签字了。今日我们仍然很欣赏的「青岛啤酒」，也就是那时德国商人在青岛开始酿造的。

### 「不可战而战」与「可战而不战」

那时的所谓「教案」是怎么回事，而列强利用教案为藉口，以侵蚀中国领土主权，又是怎么回事？笔者已不厌其详，缕述如上。这些都是历史上扳摇不动的事实。我不相信任何中外史家可以否认的。若说「教案」完全起于中国老百姓的排外行为，这分明与事实不符。若说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存在，那就更是强词夺理的胡说。上述胶澳租借史，你说不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侵华行为的标准记录？

当然，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欧美帝国主义为什么不侵日本呢？胡适老师说得好，帝国主义为何不侵「五鬼不入」之国呢？帝国主义之侵我，也是我们自己窝囊的结果嘛。哪能专怪人家呢？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窝囊呢，如今民运人士怪共产党；共产党怪国民党；国民党怪洪宪皇帝和慈禧老太后；老太后又转怪洋人。

其实什么都不是。我国近百余年的动乱，是一种历史上社会「转型」的现象。文化不论中西，都是要从落后的「中古型态」，转入「现代型态」。西洋文明从「文艺复兴」（一三〇〇）开始，已「转」了六百年。我们从「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至今才一

百五十年，按理我们还应该有一段苦日子好过呢！分阶段「转型」是慢慢来的，急不得也。笔者于「转型」之说，谬论已多，这儿就不再噜苏了。

总之在戊戌和庚子那个阶段，自曾左李张（之洞）而下的汉族士大夫和器重他们的皇帝爷——义和团同志们尊之为「一龙二虎」者，他们吃一堑、长一智，知道洋大人是碰不得的。他们知道「外事棘手」、「教案难办」，不可轻率从事。

记得「九一八」时代，笔者当小学生时，曾读过陈布雷先生的大著《国民政府告学生书》，曰：「……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其实这也是九一八前三十年中国士大夫的心境。可是这种士大夫情怀就不是当时工农兵——李逵、武松、花和尚和济公法师一流人的想法了。

在这批英雄好汉、江湖豪杰眼光里，他们所见到的只是洋人的横蛮，教民的仗势和政府的畏葸。尤其是德军占领胶澳，向内陆进袭之时，官军狗走鸡飞，总兵（今师长）被俘，在如潮的难民，儿啼女叫声中，那群受到洋教士保护之下的教民，尤其是「吃教的教民」，自然无逃难的必要。道左傍观，可能且有幸免和得意之色，不肖者更可趁火打劫，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相形之下，不但强弱分明，甚至忠奸立辨。

这样一来，不但民教双方阵线分明，地方各种教门、拳会、会党，也会认为政府过分孱弱——「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则江湖豪杰，乃至当地武生仕绅。也都要揭竿而起，以保乡卫国、仇洋灭教为己任

了。

山东本是民风强悍的地方，如今人民既同仇敌忾若此，则一向对人民只知诛戮镇压而畏洋让教的满清地方官，对他们的传统政策，也就有重行考虑之必要了。

### 「农民起义」的另一面

我们要知道，在满清末年的中国政府里和社会上的动乱，基本上是与秦汉隋唐宋元明诸朝代的末年是大同小异的。这时的国家机器彻底锈烂。政府纪纲、社会秩序，同时解体。人祸天灾（天灾往往是人祸的延续），一时俱来。衣食不足，安知礼义。公私道德，也彻底崩溃。人心惶惶，莫知所适；邪教邪门、恶僧妖道，也就乘虚而入。饥民索食，难免打家劫舍，为盗为匪。强梁狡黠者以及劣绅土豪，就更耍结团结练（练亦为捻，便是捻军的起源），斗争称霸。强凌弱、大吃小，逐渐形成大小军阀，来糜烂一方。一般良民百姓，不论从善从恶，但求自保，亦势必卷入洪流，不能幸免。这种盗贼横行，饥民遍野的社会情况，在我们安徽淮军发源地的江北淮南，俚语便叫做「遍地黄花开」。这种遍地黄花中，如能突出个中心力量来加以统率，头目分等、旗号划一，他们就变成所谓「农民起义」了，「捻军」就是这样起来的。

这一自然形成的中心力量，如为张角、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所领导，他们就要横行天下、赤地千里。作历史上有名的「流寇」。这种中心力量如为朱元璋、洪秀全、毛泽东所领导他们就可以重建国家机器来改朝换代了。

但是对这种农民起义，一个衰世朝廷，如剿抚有术，他们也未必就造反到底。国有大故，他们往往也可受抚立功；外御强寇，内除反侧。这一事例在汉末唐初两宋乃至民国时代都屡见不鲜。当年东北的「胡子」、抗战初期淮河流域的「马虎」（红枪会）都是入侵敌军所敬畏的爱国游击队。后者且为笔者所亲见亲闻。但是他们只能做做「敌停我扰」的辅助力量。招抚不得其当，他们就抗敌不足而扰民有余了。抗战期间的「八路军」就最善于利用他们来扩充自己。庚子年间那些糊涂的满族统治者竟然想利用他们作「扶清灭洋」的主力，终于失去控制。闯下了滔天大祸，如此而已。没啥深文大义也。

### 当年的「义和拳」，今日的「气功师」

在庚子（一九〇〇）之前在直隶（今河北）山东一带，农民运动的中心力量显然是「义和拳」。义和拳本是有数百年以上历史的「拳术」。我国拳术本有内外两派，所谓「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义和拳亦名义合拳，可能是内外兼修的。内外兼修的拳术往往能练出一些科学上不能解释的「特异功能」来。

朋友，这种特异功能是实有其事啊！如今不特大科学家钱学森笃信不疑，连不才也不得不信，因为我曾亲自参加过中国气功大师严新的「带功讲座」。亲眼所见，哪能是假呢？最近侨美邻人之妻，一位五十开外的华裔老太太，就因为练气功的「自发功」而不能「收功」，一下「飞」出了两丈多远而摔断了膀子呢！至于「铁杆压喉」、「卡车辗腹」、「头断石碑」等等现在也都不是新闻了，也都是笔者所亲见。庚子年间的洋人亦屡有类似的报导。义和拳早期的大师兄本明和尚，



据说就是「浑身气功、能避枪炮」。

不过他们那时表演气功要设坛烧香、画符念咒，然后才有「鬼神附身」。严新的气功，不搞那一套迷信也照样有效，所以钱学森教授就认为是一种新科学了。

义和拳那一套事实也就是一种「气功」。中国古代自春秋战国以降，对气功的记载是史不绝书的。《史记》所记「大阴人」，以阴格桐轮；台北今日还不是有一家以「阴吊百斤」为号召而生意兴隆？据吾友刘绍唐先生他们说，这都是千真万确之事呢！

所以气功之为术，在我国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半世纪来余读「义和拳源流论」，不下数十篇，大半都是浪费精力的以偏概全之作也。

严新说他在大陆某次带功讲座，一场便有听众十九万人。最近他在洛杉矶某大学讲道，美西七座大学校园「同时带功」！华夷学生舍学相从者，多如过江之鲫。

最近在联合国一次表演会上，余亦获晤另一气功大师「鹤翔桩创始人」的赵金香先生。他说：「严新有『听众』数十万人，我有一千四百万学生呢！」

乖乖，有学生一千四百万人，则「扶清灭洋」、「兴无灭资」……何事不可为？

据大陆学人告诉我，这批气功大师原都是中南海内的御医红人。他们为诸当国者保健防老、壮阳补肾，都受尽青睐。不幸他们在民间的信徒亦动辄百万千万。万一这些千万信徒也搞起黄巾军、白莲教和天安门来，那还了得？有老佛爷当年的恶例在，所以当政者对诸大师

也就由疏远而到防范了。因此有很多大师小师，一旦出国便流连海外，乐不思蜀矣。

### 「毓」字帅旗下的「义和团」

朋友，今日的气功师便是当年的义和拳啊！今日的统治者被民运吓惨了，因此对保健补肾的气功运动也要加以防范。当年的满洲贵族被洋人欺够了，乃想组织他们来驱洋除教。这样便出了个巡抚毓贤。他要把他们的「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打起「毓」字大旗，由官方认可为保家卫乡的正式「民团」。然后又把全省良莠不齐的牛鬼蛇神——什么大刀会、红灯照、八卦教（尤其是有较多群众的「乾卦」、「离卦」两派）、红枪会等凡数十种，义而和之成为一单一团体，由他来统一指挥，联合「灭洋」。官方既有此辅助和认可的政策，则风行草偃，「义和团运动」立刻就如火之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了。

毓贤原是一个汉裔旗人（汉军旗），秀才出身。捐官在山东，于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署理曹州知府。毓贤本是个很干练而狠毒的屠夫。他上任不及三月便杀掉一千五百人。杀得那强盗如毛的曹州府（也像今天的纽约市吧），「民怀吏畏」，秩序大定。因此毓贤也颇有能吏之名而为上级所嘉许，以致官运亨通。当一八九七年冬曹州教案发生时，他已官拜山东按察使，为全省最高执法官吏，俗称臬台。所以在巡抚李秉衡为怕洋人藉口生事而严令彻查此案时，毓贤在数天之内便把这案子破了。他破案之时，德国政府还不知教案发生呢！亦可见毓贤的干练了。

但是毓贤虽然杀人如麻、草菅民命，他毕竟是个洞察民情的亲民

之官。他知道这些教案的详细内容。所以当德军藉口入侵，山东全省鼎沸而北京朝廷又一再为洋人所迫，严令「剿匪」以安「教民」之时，毓贤和他的顶头上司李秉衡与李的继任人张汝梅，都有了心理矛盾。他们明知在「民教冲突」的两造之间，「教方」（尤其是吃教者）仗入侵洋人之势，并非皆是善类；而「民方」亦非打家劫舍的真正盗匪。如诬以盗匪之名妄加诛戮，非但有欠公允，尤恐激民成变，不可收拾——因为那时纵曹州一地即有「大刀会」众十余万人。冠县一县的「义和拳」拳会群众即有「十八团」；茌平县治下有八百六十余庄，习拳者即有八百余处。对如此广大的群众，诬民为匪，妄加诛戮，官逼民反，不得了也。因此纵是屠夫鹰犬的毓贤，面对此一实际情况，亦有「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之叹。（此「即系」二字是否为「原系」二字之抄误，尚有待另考。）

根据他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三人都主张分清善恶，剿抚兼施。当毓贤于一八九九年继任山东巡抚时，他就公开宣告他的「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三大原则。正式把「义和拳」、「大刀会」一类的民间结社颁予「毓」字大旗，改组成为政府正式认可的「义和团」了。其实「大刀会」当时的声势亦不在「义和拳」之下。毓贤之所以舍大刀而取义和者，「义和团」较「大刀团」雅顺多矣。毓贤虽喜欢大刀，但是他毕竟是个秀才嘛！这一来「义和团」在中国历史上也就褒贬难分了。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五期

## 二、列强刺激·太后玩火·端王窃政·群运出轨

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

发生在二十世纪的第一年，庚子、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之乱，从星星之火烧成燎原之势，实在是与当时山东巡抚毓贤的三原则分不开的。前文已偶及之，毓贤的三原则是：「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老实说这三个原则本没有错，错的是他把抽象的原则化为具体的运用，不得其当，就要出毛病了。

就以「民可用」这一条来说吧！当年由于列强对中国所作的赤裸裸的侵略——尤其德国人在山东，俄国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已激起中国全民的公愤。

德国人在山东以教案为藉口强占胶州湾，已无理已极，而德皇为皇弟海因利盍亲王（Admiral Prince Heinrich）率远东舰队远征中国，在汉堡所作之送行训辞，什么：“should any one essay to detract from our just rights or to injure us, then up and at him with your mailed fist”（原文英译载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伦敦观察报》（London Spectator））。那时我方奔走交涉的大员之一的翁同龢，在其日记上译为「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德皇这一「挥拳」演说，那时是腾笑欧美的。世人固对德皇之横蛮，嗤之以鼻，而对我华人之不争气，也是怜而鄙之。此事当时对我国我民之刺激，亦至深且痛。斯时在巴黎冷眼旁观之法国史家克利厄（Henri Cordier），便认为这种德国佬加于华民之刺激「纵非义和团

兴起的全部原因，也是主因之一」。（见克著《中西关系史》，卷三，页三六五。转引自摩尔斯《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卷三，页一一一。）

至于德军当时在山东之横行，更是笔难尽述。当地百姓如对若辈稍事抵抗，动辄全村被焚，老幼难逃。某次在鲁东日照县，为一极小的民教冲突，在当地仕绅出面试行调解之时，五位在场仕绅竟被德军强掳而去，送至青岛拘留所，勒令执行极无理之要求。似此绑票勒索之行为，使在一旁观察之美国外交官，亦为之忿忿不平而报请华府留意。（见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致国务卿海约翰的报告书。载国务院「外交档」，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七日。）

俄国在中国东北所犯的罪恶，就更是罄竹难书了。一八九九年三月某日，俄人自旅顺港违反条约，侵入中国境内征收地税。当地农民召集群众大会并缮具申请书，请求免征，态度极为和平恭顺，而俄军竟突然对群众开枪，当场便打死农民和老弱妇孺九十四人，伤一百二十三人。（据西文《北华捷报》记者的专栏报导。）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五日，当俄军于黑龙江畔的海兰泡（俄名「布拉戈维申斯克」）开始越境时，华军稍事抵抗，俄军便一举将两岸华民男女老幼六千人，悉数屠杀，弃尸江中，江为之塞。此一屠杀，中国政府虽未敢深究，欧美媒体却向莫斯科提出抗议，而沙皇政府竟声言是边远驻军擅杀，俄皇鞭长莫及，无能为力，搪塞了事。（见 Arthur H. Smith 著《震撼中之中国》（China in Convulsion），一九〇一年英国爱丁堡出版，第二册，页六〇七。）其后俄人在「江东六十四屯」一带和其它城市中的烧杀，据各方报导，死伤华人二十余万，本篇也

就无法详加叙述了。（见李文海等编《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一九八六年济南出版，页二九七。）

以上所记只是根据西方官员和记者零星的报导，并非受害华人的夸大。当时如作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则入侵者之残暴，就更是罄竹难书了。笔者不学，曾就清末民初各种中外冲突中，双方的死伤数字略作比较，所得比率大概可说是一千比一。换言之，在中外冲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殒命，无辜华民就要以千命「相陪」（不是相赔）。如曹州教案中有德国传教士二人被杀，德人藉口入侵时被杀之华人，加上中国官府在洋人要挟之下所杀戮之华民，以及民教冲突所造成的死伤，即不下数千人。——假如鬼神之说真有可信，以数千枉死冤魂，在耶稣之侧、上帝之前，与在曹州殉道的两位神父的幽灵，同时出现，互控冤情，在此情况之下，上帝和耶稣又何择何从呢？

不幸的是，在类似情况之下惨死的洋人往往都名扬天下，垂誉后世；但是陪他们一道丧命的数千名华人包括妇孺，那就死得虫蚁之不如了。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件惨事；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数字。」在那庚子年间，死掉任何一个洋人，都是个惊天动地的「惨事」；死掉千万个华民，甚至连「统计数字」也没有一个。但是中国人究竟不是个麻木的民族。在那千万家披麻戴孝的寡妇孤儿的哭声里，稍有良心的血性男儿，都会拔刀而起和敌人拼命的，这就叫做「民愤」。在全国人民都感到国亡无日，都要和入侵者舍命一拼，这就叫做「民气」。这股民气，笔者这一辈在「八年抗战」的日子里，都是亲身卷入、亲身体验的。老实说，八年抗战就是当年全国人民以血肉之躯与不可一



世的入侵强寇，死命纠缠，拼过来的。

朋友，在那庚子年间，八国入侵的时候，全国同胞国亡无日的感觉，实数倍于抗战前夕的一寇独来，尤其是在情况最紧迫的山东和东北。所以该两地区民气最激昂，义和团也滋长得最快。毓贤这个好杀成性的地方官，他也深深地体验到这种同仇敌忾的民愤，而感觉「民可用」。他觉得与其杀民媚洋，何如「用」民来除教灭洋呢？毓贤这一心态，事实上是与当时西后以下，那一批在戊戌以后突然掌权而又颡顽无知的满人小贵族的心态，如出一辙。他们但知民气可用，要「用」它来「扶清」。他们怎知甲午、戊戌之后的腐烂朝廷，已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以它来「灭洋」，则洋又岂是气功师徒「刀枪不入」所能「灭」掉的？

对民气但知其有而不知其用；激起了民气，又没个安全塞可保安全，那就非爆炸不可了。义和团运动也就是近代中国，无数次锅炉大爆炸中的一次。

### 只能造反，不能保皇

再者，毓贤究竟是个非科甲出身而习于杀人的莽汉。下棋不看第二步；为政不作三思，因此他的「团应抚、匪必剿」的原则，应用起来，也漏洞百出。

山东那时是处于王朝末季的黄巾、赤眉时代。饥民遍地、盗匪如毛、邪门盈野。毓贤最初的办法是以杀止乱。但是他纵是个嗜杀的屠夫——他有一个月杀五百人，一任杀五千人的纪录——也杀不胜杀。最后改杀为抚。他抚的办法是化零为整、招匪入团（民团）。他纵容，

甚或授意，乃至干脆鼓励和认可，并发下「毓」字大旗，由徒弟众多、能呼风唤雨的大邪门，并吞那些只有低级气功，组织能力欠缺，而良莠不齐的小邪门，划一名号，整齐服色，统名之曰「义和团」，以示这些组织是由他巡抚衙门认可的民办民团。

这种以大吃小、化零为整，组织并统一指挥起义农民的办法，原不是毓贤所发明的——那是我们的国宝。试翻我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且看陈胜、吴广、赤眉、黄巾、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洪、杨乃至我们亲眼看见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成长和扩大，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毓贤所搞的与上述情况有个基本上的不同。上述诸大家都是搞革命，造反，以「打天下」为号召的。毓贤统一组织他们的目的却是「招安」，为大清王朝「保天下」。这样就变成抱薪救火了。

第一，毓贤无法真正把「义和团」化为「民团」。农民起义的造反大军，「裹胁」起来是愈大愈好；官办民团的容量，那就有限了。再者造反打天下搞革命，是泄民愤、主正义的义士之行，士气极高。保卫腐烂王朝，助纣为虐，那就义士却步，智者不为了。所以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始终未能步入正轨。它不是个正正堂堂的群众爱国运动，而是以烧香念咒，或间有「特异功能」的气功师为主导，终于走火入魔的工农兵运动。——它缺少个「伟大、光荣、正确」而成熟的革命党从中指导和策画，因此它搞起「扶清灭洋」、「烧教堂、杀教士」，就变成红卫兵式的打砸抢，乱来一泡了。但是红卫兵究竟还要听命于一个老谋深算，也可说是老奸巨猾的「最高指示」；最后在军警环伺

之下，偃旗息鼓，去农村下放学习。义和团没个最高指示，在军警也都相率入团之后，连「老佛爷」也失去控制，使它真的变成了「拳匪作乱」。发展至此，连老太后也只好丢掉「盆底鞋」，梳上「髻髻头」，化装农妇，逃之夭夭。「拳匪造反」(boxer rebellion)就只有靠洋兵来「助剿」了。——「拳匪造反」原是李鸿章替慈禧推卸战犯责任的外交辞令（见下篇）。

所以毓贤的「匪必剿」的原则也出了大毛病。他不知道「匪」是饥民的化身。饥民在被「剿」得走投无路之时，便入「团」受「抚」。受抚之后还是没饭吃，那就继续为匪，终于良莠难分、团匪并存。加以毓巡抚对教民有成见，又没有办外事的经验，不知洋人之可怕；而教民教士与洋公使又恃强欺人。民教冲突中，不论屁大小事，往往都要劳动位同总督巡抚的「主教」甚至更高的「公使」（在对华文书上自称「本大臣」），来向中国朝廷和地方，加油加醋，甚或无中生有，抗议恐吓。弄得中国官方不胜其烦。巡抚衙门仅为教案一项便案卷如山（原档至今仍满筐满篓），忙不开交。毓贤一怒乃干脆告其属下府县官吏，把教民控告、教士抗议当成「耳边风」，「当成废纸」。（见李宏生著《毓贤与山东义和团》等多不胜数的第一、二手史料。）

但是毓贤并没有忽视他自己标准中的「团」、「匪」之别。义和团中如有不良分子对教民杀人绑票，他也绳之以法，大量诛戮。事实上义和团在山东早期最有名的大师兄朱红灯，和遍身气功的本明和尚，就是因为枉杀教民、窃取财货，被毓贤捕杀的。——有些后世史家对事实未加深究，竟把朱红灯与本明之死划在袁世凯帐上，实为误入。

然毓贤既有其「耳边风」、「当废纸」一类的指示，则抢匪多劫教民；下级官吏时予纵容，也是事实。这样就要引起洋人严重的抗议了。果然在一八九九年冬季美国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乃向北京总理衙门连续抗议，要求中国政府把毓贤撤职。总理衙门不敢开罪康格，乃于是年十二月五日奏请太后把毓贤「开缺」，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并率其新建陆军一万一千人入鲁镇抚。毓去袁来，义和团运动便进入一个新阶段，从山东转入直隶（今河北省）和京津地区了。

### 毓贤和袁世凯的正反两面

毓贤原是慈禧的宠臣，他在山东的所作所为都是太后所嘉许的，如今受洋人胁迫去职，慈禧亦为之不平。所以毓贤奉旨回京觐见时，太后竟颁赏亲书「福」字以为鼓励，并随即调任山西巡抚。毓贤既受此洋人鸟气，又蒙太后赏识，他一到山西对除教灭洋真的就毫无顾忌，大干起来了，甚至不惜亲自操刀去砍掉洋人脑袋。可是这时在山东接任毓贤遗缺的袁世凯，其作风却正是毓贤的反面。

袁世凯是一位比毓贤更为老辣而干练的官僚。甲午战前他在朝鲜即有十年以上办外事的经验。如今虽手握重兵，他知道洋人还是得罪不得的。为着传教等等皮毛小事而开罪洋人，更是得不偿失，亦无此必要。再者义和拳民也不只是反教闹教了事，他们是逢洋必反的短视群众。袁氏所统率的「新建陆军」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现代化的武装部队，在时人的眼光里也是一支洋部队——穿洋服、上洋操、吹洋号、用洋枪、抽洋烟、用洋油、点洋灯……无一不洋。如今扶清学洋

之不暇，怎能逢洋必灭呢，可是那时山东省内的工农兵群众在洋人和教民的刺激之下，和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位巡抚的暗地鼓励之中，不但反对筑铁路、开煤矿、办学堂、开报馆，并且要砸海关、拔电杆、封邮局……，所以袁世凯一来就要扭转这项落后反动的群众行为了。袁氏尤其认为义和拳民的画符念咒、刀枪不入的迷信是邪教惑众，断难扶清灭洋。因此他对「义和拳匪」就主张全面镇压。这时在他军中以候补知府衔实任「营官」的胞兄袁世敦，其剿灭「拳匪」的意志似比乃弟更为积极。所以在他兄弟于一八九九年冬领兵入鲁时，世敦衔老弟之命，对义和团民大开杀戒，认真剿办。其后不久，山东的义和团就被袁世凯肃清了。

### 慈禧太后也有个四人帮

可是袁氏兄弟在山东的行为却有反于当时北京城内的政治气候。——这时满清朝廷的最高决策权是掌握在西后包庇之下的一小撮满族王公贵人之手。尤其是皇族近支和宗室的「载」字辈四兄弟：载濂、载漪、载澜、载勋和他们的近亲密友们更是这权力圈的重心所在。他们依附于那权力无边的西太后裙带之上，把持了朝政。以最无知的头脑，最下流的手段，为着最自私的目的，利用一个最乐于暴动的社会基层的群众组织「义和团」来「扶清灭洋」，夺取政权。他们这一记夺权行为，简直与六十六年之后再度发生于北京，由毛泽东和「林四」所搞起的一小撮无产阶级小贵族，要利用爱好打砸抢的「红卫兵」来「兴无灭资」、夺权专政，真是前辉后映，历史重演，如出一辙。

载濂、载漪、载澜三兄弟原是惇亲王奕訢的儿子。奕訢是道光皇

帝的第五子，比他异母兄咸丰皇帝奕訢只小六天。一八八九年奕訢死后，载灃袭爵为惇郡王；而载漪由于过继给一位早死无后的叔叔瑞亲王奕誌，也于一八九四年慈禧六十寿诞时袭爵成为「瑞郡王」。不意「瑞」字被书胥在圣旨上误写为「端」字，将错就错，他就变成庚子年间权倾一时的「端王」了。

**【附注】**载漪承继的瑞王是奕誌还是奕志，《清史稿》和英文《清代名人传》有不同记载，容续考之。

端王的权势还不止于承袭爸爸和叔叔，他还另有西太后的「裙带关系」，并兼任禁卫军虎神营的总兵（师长）——他老婆是西太后弟弟桂祥的女儿，所以她也就是光绪皇帝载湉的姑表妹。——光绪是西太后的妹妹所生。因此在戊戌政变之后，西后想把光绪「废」掉，再「立」一个新皇帝时，她最后就选中近亲内侄女的儿子，也是载漪的儿子溥俊，时年九岁。溥俊终被册封为「大阿哥」（详见下节）。作为大阿哥的爸爸，则端王载漪的权力，就更上层楼了。

据说为着增强载漪为首的载字辈四兄弟的权力，老太后竟颁赐「尚方宝剑」一把，交载灃、载漪二兄弟执掌。使他二人在朝中有「先斩后奏」的专杀之权。——这一「尚方宝剑」的故事，当时曾传遍海内外。英文《字林西报》（一八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亦有绘影绘声的记载。但其实情如何，笔者因未能细查清宫秘档，只好暂时存疑，以待高明补正。



以上是四人帮中老大老二的故事。老三载澜那时也官拜「辅国公」。在那「公侯伯子男」五等勋爵里，功高不赏的曾国藩不过封「侯」；李鸿章生前只是个「伯爵」；刘铭传只是个「一等男」，都已显贵非凡。四人帮身为「王」、「公」，其权力地位，岂在话下？何况他们又手握兵权，于拳民入京时载澜亦出任禁军的右翼总兵。

至于载勋，他虽非皇族「近支」，却是一个尊贵无比世袭罔替的「庄亲王」。庄亲王是清初康熙年间八大近支勋臣，世袭罔替的亲王之一。这时的载勋已是第九代的庄亲王。他的门第在北京城内已烜赫了两百余年。载勋此刻则总统禁军，掌握了步兵衙门，与上述他的三位族兄弟沆瀣一气，硬是权倾朝野。

总的说来，这批载字辈的亲贵子弟，都是一批娇生惯养、志大气粗、教育低劣、不谙世情，并无军政经验的纨绔子。这种贵族纨绔子那时在北京是随处皆有的。他们这小小的四人帮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而已。但是他们却是围绕在太后四周，所形成的一个挟天子令诸侯的权力核心。他们不但是决策人物，同时也是政策的执行者——是现职军官、大臣和参预实际外交的官吏。为了解他们在政府中所发生的作用，且让我把当时满清政府的权力结构，择要表解一番。

## 拳乱时期清政府的权力结构

### 一、极权巅峰的「两宫」

慈禧皇太后

光绪皇帝载湉

※按清制皇帝应拥有最高权力。然此时光绪帝的命运实与后来

生活在幽禁中的「张少帅」不相上下；而太后之权则超过有最高决策权和最后否决权的「毛主席」。

## 二、朝廷最高决策机构的「军机处」和「军机大臣」

礼亲王世铎（温和而无太多主见的满洲老贵族）

荣禄（戊戌政变时最保守的官僚派的领袖；庚子拳变时却为开明派幕后首领的满族强人）

刚毅（干练而不通时务的保守派，力主重用义和团的满族老官僚）

王文韶（十分衰迈而比较通达的汉族大学士）

启秀（干练而不通时务外情的满族宠臣）

赵舒翘（不通时务外情，保守派的汉族老官僚）

端郡王载漪（西后最宠信的满族亲贵，「大阿哥」之父，纵在西狩途中，仍被提升的保守派领袖）

鹿传霖（没太多主见的汉族大臣）

※参见《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与〈列传〉

## 三、畿辅与北洋军权所在地

### ◎ 京畿戍卫系统（禁卫军）：

步兵营统领庄亲王载勋兼任（掌京师九门管钥，统帅八旗步兵，肃靖京邑，总兵佐之）

虎神营总兵端郡王载漪兼任（掌辖本营官兵以备扈从，车驾搜狩列前驱）

神机营总兵辅国公载澜兼任（职掌同上）

◎ 北洋国防军系统：

武卫五军总节制军机大臣荣禄

武卫中军总统荣禄兼（德式训练的精锐部队，驻京师南郊）

武卫前军聂士成（日式精锐，驻天津）

武卫后军董福祥（原旧式甘肃地方军改编，驻北京城内）

武卫左军宋庆（原旧式毅军改编，驻山海关一带）

武卫右军袁世凯（德式新军驻小站，后入鲁）

※参见英文《清代名人传》、《清史·兵志》、《义和团档案史料·正续编》、英文《字西林报》及各将领本传。

四、总揽外交系统行政大权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和「事务大臣」

端郡王载漪（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出任总管大臣）

庆亲王奕劻（与荣禄争权而粗通外情的满族元老）

启秀（见军机处表，六月十日随端王入总署）

溥兴（满族宗室，随端王来总署，不通外情）

那桐（原官诸部侍郎，随端王入总署，满族，不通外情）

桂春（三品京堂总署行走，满族）

裕庚（原太仆寺少卿，满族）

崇礼（官协办大学士，满族）

廖寿恒（原礼部侍郎，军机处行走，汉族备位大臣）

赵舒翘（见上节军机处表）

吴廷芬（官户部右侍郎，汉族）

联元（内阁学士，满族，奏保皇帝，被杀）

袁昶（光禄寺卿，汉族，反宣战，主剿义和团，被杀）

徐用仪（兵部尚书，汉族，反战，主剿，被杀）

许景澄（原驻俄德等国公使，反战，主剿，被杀）

※参阅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附表，暨《清史》诸臣本传。

## 五、南北洋大臣暨南北主要督抚将军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裕禄（满族，亲贵出身，少年得志，晚年观望承旨，对义和团先主剿，后主抚，兵败自杀）

山西巡抚毓贤（旗籍，抚团，灭洋，仇教，不通外情，兵败伏诛）

陕西巡抚端方（满族，西狩期间，护驾有功）

黑龙江将军寿山（满族，抗俄兵败自戮）

盛京将军增祺（满族，驻奉天，即今沈阳，曾招安张作霖）

山东巡抚袁世凯（汉族，力剿义和团，驱拳民自鲁入直）

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汉族，驻南京，力主剿灭义和团，反宣战，与列强签约，东南互保）

湖广总督张之洞（汉族，驻武昌，剿团，反战，东南互保）

两广总督李鸿章（汉族，驻广州，力主先安内，后议和）

闽浙总督许应骙（汉族，驻福州，主东南互保）

安徽巡抚王之春（汉族，驻安庆，主东南互保）

浙江巡抚余联沅（署理，汉族，驻杭州，主东南互保）

江苏巡抚松寿（满族，驻苏州，随刘坤一主东南互保）

※参阅《清史·疆臣表》及〈列传〉

### 志在夺权的四人帮，另有暗盘的老太后

读者如稍一浏览上列五表，立刻便可看出庚子年间清朝政治的特点所在：

第一便是那时中央地方、保守开明，北满南汉，分治而不对立的政治形势。

中央最高的决策与否决大权独操于慈禧一人之手。她在朝中所掌握的生杀之权，远超过后来的蒋中正和毛泽东。但是当时在她手掌中的光绪皇帝，其命运虽不如张少帅，但是他这个政治幽灵却为在康梁影响之下的海外华侨、位高权重的南方汉族疆臣，和鞑毂之下各国驻华公使同情甚或崇拜的对象。所以戊戌以后的光绪是慈禧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她不把这个儿皇帝废掉，她是食不甘味、睡不安枕的。因此「他（指光绪）要谋害我」这句话，在戊戌之后简直变成她的口头禅，而这个恐怖感也使她害了心理上的「偏执狂」（paranoia）。所以她那时在政治上的第一要务便是「废立问题」。

清制只有皇太后可以「听政」，而太皇太后则无此特权。所以她第一个废立的对象原是以庆亲王十四岁的长子载振来代替三十岁的光绪皇帝载湉。此一试探消息一出，不但刘坤一等汉族督抚反对，满

族军机大臣荣禄亦表示异议（庆王是荣的政敌），连庆王父子本人也不愿伺候，而最重要的则是英国公使也公开表示不支持，终使此阴谋泡汤。

再经过一年的准备，西后退而求其次，就不搞废立了。她选中了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册封为「大阿哥」（皇太子），以承继穆宗皇帝（同治）。如各方阻力不大，她显然还是要把光绪废掉的。这一次她果然获得满族亲贵（包括荣禄）的一致支持，汉族之中除上海少数绅商（如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之外，各疆臣亦多沉默。但是美中不足的，则是如此「册封皇太子」的大事，各国驻华公使却拒不入贺。西太后此时最怕的不是康梁领导的海外华侨或汉族督抚，当然更不是革命党领袖孙文。她所最怕的却是列强的驻华公使。她认为只有他们才真有此力量来强迫她「归政」，强迫她「退休」；乃至搞阴谋诡计，暗助光绪搞「苦挞打」（像谭嗣同所策画的），把她幽禁，甚或把她砍头。

在这一「偏执」心理的支配之下，老太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便是如何解除这项最可怕的洋人（尤其是列强驻华公使），对她所构成的威胁。同样的心理状态，也促使她的行为走向另一极端（恕我试以行为科学来解释历史）——她开始相信只有与她有血缘近亲关系的小圈圈，对她最为忠诚。只有生活在这小小圈圈之内，她才有安全感：她每晚才能睡得着觉，不致发生梦魇。

朋友，你说叶赫那拉老太太生了精神病了吗？非也。那是所有孤单的独裁者所共享的精神状态！不信，你去分析一下蒋中正、毛泽



东、金日成，甚至李光耀、李登辉诸领袖的「行为」，你就知道科学论证之不我欺也。至于理论所自出的西方领袖们大同小异的行为，就不必说了。

晚年的慈禧就是掉入这个心理学上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她不但对所有的洋人显得 *paranoia*，她连替她老人家做了一辈子，最最忠实的鹰犬的李鸿章和荣禄都不信任了。她把李鸿章下放到广州去「署理」两广总督；在北京，她也另外扶植一个小亲贵组织的四人帮来夺荣禄的权，把荣禄挤得靠边站。同时她对荣禄所掌握的精锐部队「武卫中军」也不信任，而把荣禄也掌握不了的杂牌军——董福祥的「甘军」调入京城，来和载勋、载漪、载澜所统率的「禁卫军」，协同保卫畿辅，并以牵制荣禄的嫡系部队。必要时老太太自己也可直接指挥各军，来搞一番扶清灭洋。

至于载字辈四人帮的迅速崛起自然更是老太后的杰作。不用说职司京师卫戍的数万八旗军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据英文《字林西报》所获自曾侯（曾纪泽，文正公之子）府内的消息，当时载漪所直接指挥的虎神营即有枪兵一万人。属庆亲王奕劻指挥的则有五万人之多。庆王是当时众所周知的荣禄的政敌。他所节制的武力可能包括载勋的九门提督和甘军全部。连专掌财权的刚毅也可掌握有一万二千名枪兵。（见该报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六日专栏。）

这项卫戍系统在国民党时代属于首都卫戍司令。在毛泽东时代那就是「八三四一部队」了。谁掌握了这项武力，谁在首都就有生杀之权。所以西后和她的四人帮，后来在一怒之下便可把出言忤旨的五大

臣，牵往菜市斩首。德国公使克林德也是在街上被载漪的虎神营章京恩海打死的（详见下篇）。至于在庄王府前广场被砍头的千百个「教民」和「白莲教」（包括妇孺），那就不必谈了。

既有军权，枪杆就可出政权。从暗到明，挟天子以令诸侯，最高决策机关的军机处也一直掌握在他们手里——原先最有权力的军机大臣荣禄，一直在「病假」之中，居家养晦。（见〈荣禄致四川总督奎俊书〉，《要录》有节录，页一三。）

一九〇〇年（庚子）六月十日，端王载漪并被派入「总理衙门」为总管事务大臣，连庆亲王也得靠边站。（见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上谕〉，载《史料续编》上，页五九六。）

军、政、财务、外交大权都集中到以西后为首的一小撮满族亲贵之手，剩下的如何掌握「义和团」运动这个政策，别人就更无法置喙了。

### 「义和团」与「红卫兵」后映前辉

大体说来西太后之扶植「义和团」与六十年后毛主席之玩弄「红卫兵」，简直是后映前辉，一模一样的。他二人自以为掌握了兵权政权，对一个民间的群众运动就可发可收，终于亲贵骄纵、大权旁落、一发难收，最后闹到天翻地覆、全民遭殃的结果也没有两样！

慈禧太后是统治大清帝国至四十八年之久的女王。在过去两千年的中华帝国的历史里，除掉她本朝的康熙、乾隆和西汉的武帝之外，也没个男主比她统治得更长。所以她深通统治的艺术。她在中央政府里所表现的那一套纵横捭阖的本领，可能还在后来的蒋、毛二公之上，

她统治大陆的时间，也是蒋、毛二公的总和。但是她有个缺点也和蒋、毛二公一样——她不懂外交；内交内行，外交外行。这不能怪她，因为她所主持的中央政府，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外交部」的中央政府。早期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英法联军烧掉圆明园（一八六〇）以后才建立的。辛丑条约（一九〇一）以后改称「外务部」，在洋人胁迫下成为「内阁第一部」。这个第一部的荣銜一直到国民政府成立，才让位给「内政部」（清朝叫「吏部」）。

我们这位女家长早年把《三国演义》背得烂熟——可能都是习自京戏的剧目。据说当年多尔衮入关时，他的政治学教科书也是一部「清文」翻译的《三国演义》。但是在《三国演义》里学不到十九世纪的国际外交。所以慈禧对早期外交的决策全靠她的小叔子恭亲王奕訢；晚期则靠北洋大臣李鸿章。——奕訢和李鸿章二人都是外交界的行伍出身，但他二人都不失为十九世纪国际间第一流的外交家。奕訢于一八九八年老死之后，鸿章就变成西后在外交上的第一位谋主。在庚子年初拳乱刚起之时，老太后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听信亲贵谗言把鸿章下放到广州去。

李鸿章者，慈禧太后之周恩来也。在此紧要关头把周恩来下放到广州去当「省委书记」，北京的军政外交大权落入「林四」（林彪和四人帮）之手了。西太后的「林四」（刚毅和载漪四兄弟）有权而无知，荒唐而暴虐的程度，也不在毛主席的「林四」之下。她的「义和团」烧杀抢的本领和毛氏的「红卫兵」文攻武卫的行为也两模一样。——一言以蔽之，慈禧以极高明的政治手法来「安内」；却以最愚蠢

的外交头脑来「攘外」。她不但对国际局势懵然无知，她甚至连最起码的讯息也无法掌握。最后竟然被一记假情报惊破了胆（见下篇），连下十二道金牌到广州去找他的周恩来，而周又迟迟不归。老太婆在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之下，以王婆骂鸡的村妇放泼行为，伙同四人帮，放纵义和团来和洋人一拼……要悬赏杀尽中国境内所有的洋人，并对十一国同时宣战……如此胡来，她老人家最后还能全尸迁入纪念堂，也算是「命大」了。此是后话。

现在再看看她的四人帮如何乱政；她的红卫兵是怎样蔓延的。

### 太后阳剿阴抚，总督后抚先剿

前节已言之，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到直隶（今河北省）去的。在义和团北上蔓延之初，西后对处理拳民的政策原是举棋不定的。她一面听信毓贤的「民可用、团应抚」的忠告，想利用拳民来驱逐洋人；另一面她又心虚怕洋人干涉，不敢公开庇护拳民，因此朝廷政策就弄成个阳剿阴抚的局面。在一连串的上谕里，朝廷都不断告诫疆臣说拳会有「良莠之分」。对「不逞之徒」固应剿办，但是对一般「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所以官方剿匪，只能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见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一日，光绪二十五年阴历十二月十一日〈上谕〉，载《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五六。）这一来，朝廷便公开表示民间组团是合法的了。

但是在一九〇〇年六月之前，那两位首当其冲的地方官：山东巡抚袁世凯和直隶总督裕禄，都是一意主剿的。二人之中以袁世凯尤为

坚决。朝廷当权派对袁不敢轻动。为着杀鸡儆猴，乃把世凯之兄袁世敦加个「纵勇扰民」的罪名革职，并驱逐回籍。

但是袁世凯并没有被朝廷吓阻。他抗疏力辩说拳会「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护身家。焚毁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为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他认为莠民习练邪术，不论是会是团，必酿巨患。私团官练（如毓贤所条陈的办法），断不可行。所以他主张彻底剿办。（见前书页九五）

袁世凯有何胆量敢如此忤旨抗命，盖义和团当时已闹到十一国驻华公使联合抗议的程度。死掉两个德国传教士已弄到胶澳不保，举国惶惶。一八九九年除夕，又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卜克斯(Rev. S. M. Brooks)在山东为拳民所杀，岂不是火上加油？所以袁氏不敢怠慢，乃对义和团全面镇压。加以他手握重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重要的还是他与力主剿匪的华南三督声气相通。他不受命，朝廷亦奈何他不得。当然在剿拳行动中，他也给予朝中当权派足够的面子，说他所剿者均是盗匪冒充的「伪义和团」，非真正爱国反教的「真义和团」也。

在袁的督饬之下，他的部将张勋、曹锟等则日以诛戮为能事。张勋那位在民国初年曾拥溥仪复辟的「辫帅」，即有在一日之内杀掉「黄巾红兜」的「拳匪」五百余人而受袁巡抚重赏的纪录。（见〈阳信县令禀〉，载《山东义和团案卷》，北京社会科学院编辑，济南齐鲁书社一九八〇年出版，下册，页六五九、六六一。）

山东的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尽杀绝了。可是拳众北窜进入直隶，直隶总督裕禄却慌了手脚。裕禄原与袁氏约好对「拳匪」南北夹击的。

庚子春初他的确也曾命令驻津聂士成的「前军」出剿，杀掉不少「拳匪」。可是渐渐地他就看出朝中四人帮崛起、太后护团转趋积极、他的老靠山荣禄已逐渐靠边站，他的「剿匪」政策也就开始动摇了——由剿办到纵容，到包庇，最后他就干脆投靠了。既靠之后，他的总督衙门就变成义和团的招待站。两位草莽出身的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亦啸聚徒众三万人，建起「天下第一坛」，祭起关公、周仓，诸葛孔明；烧香念咒，表演刀枪不入。裕禄为讨好朝廷，竟拨饷银二十万两（其后西太后亦加赏十万两），敦请众师兄率团来津，扶清灭洋。张、曹二酋竟亦由裕禄保荐，挂一品衔，分乘一品高官的「绿呢大轿」，堂哉皇哉的直入节署，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杯酒交欢，分庭抗礼。裕禄并打开军械库，一任此乌合之众，自新式器械中自择所喜。在张、曹二师兄佑护之下，天津市民亦沿街设坛，头裹黄巾、腰系红带，相率皈依。入夜家家均悬挂红灯，奉迎仙姑下凡，诛教灭洋。烧教堂、杀教民、搜捕「二毛子」，攻打租界，一时俱来。

裕禄这一转变乃导致山东拳民大量涌入直隶。东入天津、西据涿州、南占保定。焚香念咒、烧教堂杀洋鬼、毁铁路拔电杆，乃至搞「均粮」、「吃大户」，乱成一片。山东之团既来，直隶之团亦起。入团群众除工农兵之外，绅商官吏亦均相率参加——其中尤以十来岁的青少年最为积极。各州各县、各村各镇，均纷起组团，设坛练技。义和团小将们更是四处串连，「闹教」、「打教」了。——这在后来的红卫兵小将口中叫做「造反」、「闹革命」！

### 义和团在保定和涿州蔓延

就在天津地区和保定涿州一带已闹成红旗一片之时，那些住在北京使馆区「东交民巷」（义和团后来把它改名为「割鸡巷」）之内和天津租界之中的被悬赏捉拿的「洋人」，当然也紧张起来。他们十一国之间的使领侨民和教士当然更是函电交驰。协商会议，调兵遣将，忙成一片。他们既要自保，也想浑水摸鱼，则「八国联军」也就呼之欲出了。下篇再细论之。

在此混乱期间，身居「相位」的荣禄，虽在开刀养病（据说是足疾，由西医开刀），当然对太后意旨、朝中空气，更看得清楚。因此当义和团迅速向保定、涿州一带蔓延，北京城内的响应者，亦正蠢蠢欲动之时，他也将原在各该地驻防的武卫中军的主力，以保护铁路为名，一一调开，以免与拳民冲突。

当时的各路清军（包括董福祥的「甘军」），由于历史性的对立，与职业性的嫉妒，他们与义和团、大刀会等教门都是势不两立的。如今防军主力一撤，团教乃如雨后春笋，一时俱起。少数防军剩余部队反而成为他们追杀的对象了。五月二十四日武卫中军的一位分统（旅长）杨福同率步骑兵百余人往涞水县一带巡逻，义和团师兄满立和尚乃率众千人，设伏围攻。福同逃避不及，竟被拳众乱枪刺死，「脏腑皆出」。（见《史事要录》页一一〇，引抄本《闻见录》及《畿南济变纪略》。）于此亦可见当时拳民猖獗的情况了。

即在杨分统被杀的同时，另支拳民万余人则侵入保定。这时「卢汉铁路」（自卢沟桥至汉口，亦即今日京广铁路的北段）正在施工。当地有外籍专家和传教士暨家属数十人。义和团一旦串连到此，官方



不加阻遏，当地青少年乃群起响应。一时黄巾红带满天飞，秩序大乱。这批洋专家和妇孺闻风落胆。中国地方官不愿也无力保护，原遣护送兵丁又半途加入义和团，倒戈相向。他们走投无路，四散逃命。这群洋专家连家属妇孺原有四十一人。最后逃入天津租界幸存者九人；轻重伤二十三人；余九人则终无下落。据幸存者追忆，其逃难之惨状，有不忍卒述者。（见《字林西报》一九〇〇年六月六日暨十三日专栏报导。）

官方对拳运既失去控制，拳民的群众行为也就越轨了。五月二十七日拳民三万人乃冲入涿州府。知府衙门被霸占之后，涿州知府龚荫培守城无力、弃城不敢、殉城不甘，因而他想出个聪明办法——绝食对抗。在那个专制时代，地方官守土有责。城池失守，不论陷敌陷匪，守土者都例当殉职。失土而不死节，其结果也是正法砍头。如今朝廷政策既剿抚不明，殉城而死或正法而死都嫌冤枉。龚大人来他个半死不活，可死可活的绝食抗议，对朝廷、对拳匪，都不失为装蒜自保之道也。——做官搞政治，要有点鬼聪明啰！

涿州是当时京师的门户。乾隆爷下江南时曾许为「天下第一州」。上溯往古，它是「桃园三结义」的故乡；下及民国，它也是傅作义将军死守、张学良少帅猛攻的历史名城。此时也是与北京城共存亡的咽喉要塞。如今既被三万黄巾所窃据。官军旅长被杀；守土之官也在绝食待命。事实上他们现在都在向朝廷的当权派摊牌：你大清王朝对洋人，究竟要和要战，对扶清灭洋的义民，究竟要剿要抚？总得有个抉择，有个交代！朝廷年来的混沌水政策，总得有个句号！

## 和战必须决定，剿抚不可再拖

其实事到如今，关于和战、抚剿的抉择，地方与中央，满族与汉族之间，早已泾渭分明。南方的汉族督抚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朝中有嘴无权的汉族大臣兵部尚书徐用仪、光禄寺卿（主祭祀宴饷之官）袁昶、吏部侍郎（前驻俄德公使）许景澄——后三人均兼总理衙门事务大臣——皆坚决反战主剿。后来此三大臣也均为主战派所杀。

此时朝中满族亲贵（除荣禄称病不愿表态之外）在载字辈四人帮，尤其是端王载漪，和协办大学士刚毅的领导之下，连八二高龄的大学士徐桐（汉军旗）父子皆坚决主张抚团开战。其中尤以少年亲贵贝勒者流，呼嚣抚团灭洋，已至疯狂程度。

笔者此处所言汉满、和战之分。并不是说主战派中无汉人。李秉衡、赵舒翘皆汉族大臣也。主和派中亦有满人。主和被杀之五大臣中，内阁学士联元即是进士出身的镶红（汉军）旗人。在和战争论中，联元坚持「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又说「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强国乎」？遂为端王所杀。另一主和派户部尚书立山（蒙族），因在太后之前驳载漪「民可用」之论，说「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验」，也以言祸被杀。（以上均见《清史》本传）这些都是多数中无权的少数，其言行无足轻重也。

因此在涿州知府龚大人的绝食待命期间，对和战两策还在踟蹰之间者，唯慈禧老太后一人而已。她个人的一念之间，立刻便可决定这架和战天秤的轻重。

慈禧不是个笨人。在理智上，她未尝没有想到联元的名言。一国且不能敌，况八国乎。事实上南华四督的电报，和被诛三臣生前的忠谏，说得都比联元之言更彻底、更可怕。但是她毕竟是个知识有限的老女人。她怕洋的理性，始终敌不过她恨洋的感性。加以她始终对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存有幻想。在涿州被拳众所据时她就派军机大臣赵舒翘、顺天府尹（今北京市长）何乃莹与刚毅于六月初相继去涿州视察，一探究竟。赵到底是个进士出身的高知，他与何市长因此都对众师兄的带功讲座能否「灭洋」存疑。可是继至的刚毅则对刀枪不入的气功表演大为折服，认为是神术可用。（见《清史·刚毅传》，及其它杂著。）

刚毅是太后的红人，也曾是舒翘的恩人。赵氏回朝怎敢顶撞刚相。聪明的何市长自然更会顺风驶舵。太后一旦对调查所得的结果如说「拳民忠贞、神术可用」，如予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就可以化为劲旅，抗御洋兵一类的报告，稍加默许，义和团运动就进入北京了。

### 慈禧太后的红卫兵

北京城内发现义和团是庚子四月的事（非另有注，本篇都用阳历）。但那是城内居民响应外界的组织。间亦有少数来自外府州县入京串连者，然为数有限。城防军警亦曾奉命严缉。可是自刚毅于六月中旬回朝复命之后，外州县的义和团就大举入京了。一般都认为团众之来是朝廷导之。义和团本身也认为是「奉旨」入京「闹教」的。因太后颁发奖金，他们要进京领奖！

义和团开始大举进入北京的日期大致是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阴历五月十四日）。这个日期很不平凡。此日端郡王载漪也奉旨出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的死党启秀、溥兴、那桐也同时受委（见是日〈上谕〉，载《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页五九六）这就说明了四人帮夺权已完全占领了大清帝国的外交部。主和派在外交政策上，已无转圜余地（详见下篇）。

第二，驻天津各国领事和海军将领也组织一支拥有二千零六十六人的「联军」——这是后来「八国联军」的先头部队，由英国海军陆战队队长西摩（Admiral Sir Edward H. Seymour，或译薛慕尔）率领，也在这天自天津乘火车开往北京。声言加强东交民巷的防卫，保护十一国公使。他们车行至杨村，由于铁路为义和团所破坏，进退不得，乃被奉命前往阻遏的聂士成军，连同当地团民所包围。这是中外武装接触的第一次。这一冲突不论何方胜败，皆无退路可走。清兵若败，则联军便长驱直入北京，就不得了也；洋兵若败，则援军必至，就更不得了也。事实上最后便是这个更不得了结局（见摩尔斯前书，卷三，页二一三～二一四），下篇再慢慢交代。在北京方面，四郊的义和团，便是在这一天大队涌入北京的。

义和团好汉是何等样人？我们不妨伫立街头，看看热闹。《庚子纪事》的作者仲芳氏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抄与读者共赏如下：

……团民自外来者，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岁童子尤多，俱是乡间业农粗笨之人。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大红粗衣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械不一，各随所用，装束却都一般……

朋友，你看过大陆上文革时代的电影吗？毛主席的义和团，和西太后的红卫兵，有何不同？其实仲芳先生所看到的只是武清团、永清团、香河团、固安团、红旗、井冈山、好派、屁派……的一支。这一支是红巾红旗的「坎字拳」。那支被张辫帅杀掉的黄巾黄兜的「乾字拳」，另外还有黑的白的，他还未见到呢！（参阅《拳匪纪事》）仲芳先生也笑他们是粗衣粗布粗笨之人。但是他还未见过蒯大富、聂元梓等头头所领导的北京本地的「义和团」呢！他们是遍身罗绮、眉清目秀的高干子弟。你笑他粗笨？

红卫兵不是有文革小组、司令部和各级造反领导头头吗？……他们造反的对象不是「赫鲁晓夫」、刘邓走资派吗？他们各派文攻武卫，不是也曾和解放军武斗过吗？

义和团照本宣科，样样齐备。

六月初有「义和团」万人整队入城。九门提督着了慌，闭门不纳。双方正相持不下时，忽有差官持来「辅国公」载澜的「令箭」，责令开门，守城者不敢违，拳众乃一拥而入。辅国公不也是文革小组的首长吗？自此九门大开。拳众自四方涌入北京，日夜不绝。经旬而入者多至十万余人。家家念咒、处处设坛。最后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参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页三〇六及《要录》页一四四。）

此时端王庄王都有大师兄随侍，随时表演特异功能。据说李莲英曾引拳师去颐和园表演，并于六月九日护驾还宫。太后对拳艺大为折

服，并亲自习画「灵符」云云。（散见阿英编《义和团文艺选辑》中，诗文随笔等杂著。）

奉太后懿旨，所有入城的十万义和团，都由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统一指挥；由载漪、载澜等三兄弟从中协助。义和团入城第一步便是去庄王府中「报到」、「挂号」。关于战防的地点和时间，要听候上级「转牌调遣」（见《庚子纪事》）。当时「坎字拳大师兄」便住在庄王府内，上听庄王调遣指挥，下对徒众发号施令（见「军机处杂件」坎字老团大师兄德，六月二十五日〈通知〉，载《史料续编》上册，页六一八）。那时众师兄用以杀人的那种形状奇特的「大刀」，其图案后来被洋人摆成 ABC 字母，用为污辱华人的象征。谁知用久了竟变成一种「东方艺术字」。在今日海外华人社区的招牌上、广告上、名片上，仍随处可见。然使用者已不知其历史根源矣。

### 杀人放火的收场

试问义和团小将十万人，如今摩拳擦掌，挤在北京城内，意欲何为呢，曰：他们来此为的是「闹教」；为的是「扶清灭洋」。

六十年后，十万红卫兵小将也挤在原处，为的是「造反」，为的是「兴无灭资」。红卫兵把革命对象大致分成十等。地、富、反、坏、右之下，笔者这类教书匠名列「臭老九」。七、八百年前，蒙古统治阶级也把我们的社会级别，列为乞丐之上，妓女之下——八娼九儒十丐，也是第九等。

义和团把他们镇压的对象，据说分为「十毛」。老毛子、大毛子是遍体黄毛的洋人，杀无赦。二毛子是教民。教民允许退教，不退教

亦杀无赦。三毛以下则是用洋货，行洋礼，崇洋、让洋……等而推之。

红卫兵当年要打倒国家主席「赫鲁晓夫」（指刘少奇），揪斗刘邓「走资派」等等。义和团也要杀掉他们的「一龙二虎」。一龙者光绪爷也；二虎者搞洋务的李鸿章、奕劻也。所以迅速窃政的端王，就要自己掌握外交系统，使奕劻老叔靠边站了。据传闻则庄王载勋的阴谋更大，他计划率领众师兄入宫去把一龙干掉。

这还是比较文明的上层。那些设坛长街，十万人摩肩接踵，歹徒再乘间闹事，一呼百应，群众兽性大发，烧杀奸掳，一时俱来，北京城就秩序大乱了。

义和团在北京之烧也，始则逢「洋」必烧。六月十六日拳众在大栅栏焚烧「老德记」西药房。一时火焰冲天失去控制，左右前后，烈火延烧三日不灭，把最繁华的前门大街一带，千余家巨商大铺（一说四千家），焚成废墟。正阳门楼亦被烧毁。京师二十四家铸银炉厂亦全被焚毁。北京市所有钱庄银行因之被迫歇业。通货既不流通，市场交易全停，一夕之间，北京就不是北京了。（见六月十八日〈稳定行市事上谕〉，载《史料续编》页六〇四。）

义和团在北京之杀也，是从杀教民开始的，他们集体残杀教民的屠场，便是庄亲王府前的大院。在这空阔的广场之上，他们一杀千人。真是人头滚滚、尸积如丘、血流成渠啊。（见《义和团史料》上册，页五〇。）

迨教民为之赶尽杀绝，幸存者则逃入使馆区和西什库大教堂，依附洋人，筑垒自保。教民既绝迹，义和团便捕斩私仇，滥杀无辜。市



民被他们以「白莲教」三字狱砍头者，为拳民趁火打劫而烧死戮死者，军团相斗，军军相杀，团团武斗而暴尸街头者，尤不计其数。天热尸腐，臭气冲天，全城鬼哭神嚎。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儿童曾仿制「断头机」(guillotine)为玩具——真正的「以杀人为儿戏」。庚子夏天的北京城，尤其是庄王府前的广场，天天杀人，虽妇女儿童亦所不免，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屠宰场啊！与北京这个屠宰场相比，巴黎瞠乎后矣。

至于庚子夏天发生于北京的奸和掳，则禁军、甘军也是首恶啊！妇女被奸被杀的无法统计。而商户被抢被劫的，则一九九二年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洛杉矶暴动，相形之下，也是小巫见大巫啊！我们的义民和军人，在洗劫北京商民之后，并摆出兴隆的「跳蚤市场」，把赃物公开拍卖呢！（见《要录》页一九〇，引《史料丛编》及《档案史料》上，页二〇。）

抢掉商户不算，像吏部尚书孙家鼐和大学士徐桐那样的深院大宅，也不能幸免。徐桐固为义和团保母之一也。他在被抢之时，义和团小将还把这位「老道」（徐的译名）拖出公审。八十岁的老进士只得跪地哀求，才幸免殴辱。——当年的义和团小将，似乎比后来的红卫兵小将，还要文明一点。红卫兵打人杀人，「老道」的「太上老君」也阻止不了啊！

总之义和团运动发展至此，是完全出轨了；出轨到四人帮自己亦惴惴不安；他们自己的亲友也性命难保。七月初，清军副都统（一「旗」中的第二位高官）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十三口，竟为义和团寻仇，全

部杀害。庆恒是二品高官，又是满族，且系载勋、载漪的好友，而一家被杀，两位王爷皆不敢深究。终以凶手为「伪义和团」而销案，可见义和团此时的声势了。若非清军打败仗，「八国联军」入京「助剿」，任义和团如此发展下去。则老太后四人帮本身是否控制得了，犹在不可定之天也。

义和团和各路清军在北京抢够了，杀够了，再分头攻打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来助兴。他们已把一半北京夷为平地，另一半则有待于「八国联军」之接班，而继续其奸掳焚杀之余孽矣。呜呼哀哉！我们写历史的人，拿着原子笔空着急。眼看历史一幕幕地重演，又从何说起呢？

\*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六期

### 三、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始末

一九〇〇年庚子，六月中旬，当北京城被十万义和团小将和他们的主使人庄王、端王，烧得烈焰蔽天，杀得血肉满地之时，慈禧老太后对义和团的抚剿政策还是摸棱两可，没个明确的抉择。她对那日夜逼她在和战之间表态的西方列强，更不知如何是好。老太后并不是个糊涂人。她知道义和团那套魔术既不能扶清，更不能灭洋。虽然她

自己也在日夜「念咒」。

至于洋人的凶狠，她在做姨太太时代就已领教过了。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秋九月，那时年方二十五岁的懿贵妃，就被英法联军赶出圆明园。据当年西方的传说，她逃得如此惊恐和仓卒，连她最爱的一只北京狮子小狗，都做了英军的俘虏。小狗不知亡国恨，当牠们被奉命前来放火的夷兵发现时，小贵族们还在追逐为乐呢！

此一故事或为西方媒体的渲染。但是「狮子狗」这个可爱的小宠物（现在纽约市价至少每只五百美元），和许多东方的珍禽异兽，后为西人所宠爱者，每多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未被烧死的「烈士遗族」。笔者早年留美，在纽约动物园中，就见过源出圆明园的「四不像」。

那时娇贵的懿贵妃，在战火中随夫秋猎北狩。青年丈夫一气殉国。读者们看过大陆演员刘晓庆扮演的美丽的小寡妇吗？她多么可怜。夫仇国恨未报，守节抚孤四十年，到如今还要受老仇人的鸟气。老太后其恨可知；但是其内心的畏葸，也就不难想象了。不幸的是她现在已堕入她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亲贵四人帮的包围圈中，而谋主无人。更不幸的则是正当她在歇斯底里，方寸已乱的情况之下，忽然晴空霹雳，收到一封「蒋干」偷来的绝密情报，说洋人要逼她「归政」，痛哭之余，老太后自觉反正是死，就不如干脆「拼」掉算了——这是一记《三国演义》上「蒋干偷书」的假戏真演。才使老太后决心攻打使馆区，杀尽在中国所有的洋人。欲知其详，还得从她于六月九日自颐和园还宫说起。

## 甘军惨杀日本书记

慈禧在颐和园长住时期，她本人原有一支数百人的贴身卫队。他们使用的也是当时最新式的后膛钢枪。但是这几百个青年士兵既然在美女如云的后宫和御园之内，担任警卫，他们如是生理无亏的健壮青年，那就太危险了（后来毛主席在中南海，显然也有相同的苦恼）。所以这支卫队是由太监组成的。太监怎能持枪作战呢？因此慈禧一旦还宫， she 就把董福祥的甘军调入北京内城，作为她内城的宫廷警卫。

这时担任北京九门城防的禁卫军和在街头日夜巡逻的义和团大刀队，均在端王、庄王的掌握之中。纵是太后想制止「拳匪」在北京一带烧杀抢劫，已渐觉力不从心。——虽然「拳匪」一辞，仍随时见于「上谕」（用皇帝名义）和「懿旨」（用太后名义）。

甘军是有实地战场经验和赫赫战功的劲旅，非义和团和九门禁军所能望其项背的。所以太后曾一再召见董福祥，慰勉有加。董福祥亦向太后保证，他既能「杀外人」，也能把义和团镇压下去。——不用说，甘军就是慈禧的一张王牌了。谁知甘军入城的第一天就错杀了（东）洋人而使太后无能为力。原来董福祥的「甘军」也是西北一支纪律最差的土匪军，视杀人放火如儿戏。如今拱卫京师，独承天眷，那就更肆无忌惮了。因此当甘军于六月十一日（阴历五月十五日）奉命开入永定门时，适值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彬乘车出门公干。双方相遇于途。董军营官乃喝问：「何人？」杉山自觉是外交官乃据实以报。谁知他碰到的却是一支无知的土匪军。未待他说完，这营官便抽刀向前，直刺其腹，就把杉山彬一下杀掉了。残酷的士兵一拥上前，不但

把杉山尸体支解，并剖腹去其脏腑而实以马矢，弃之道旁。（见柴萼《庚辛纪事》）

杉山之死立刻成了国际新闻。驻北京各国使馆人员和各教堂内的传教士，弄得人心惶惶、个个自危。中国教民一向被拳民呼为「二毛子」，其罪仅次于「老毛子」（黄发洋人），当然更自知大祸临头。而一些仇洋反教的群众则颇为积忿得泄而鼓掌称快。

### 李鸿章、袁世凯是关键人物

杉山之死不用说在五大洲都引起震动。世界名都中各大报刊的报导，不是头条也是花边。这消息也引起中国皇宫内廷的不安。很显明的，如今《马关条约》墨汁未干；李鸿章在日本被刺的枪疤犹在，怎能再杀个日本外交官呢？

老太后慌了手脚，她除专派荣禄和启秀向日本使馆道歉之外，并召见董福祥与载漪加以申斥。可是福祥的面奏，和载漪的帮腔，终使慈禧内外交煎也处置不了。福祥说他一人如受罚是罪有应得，但如因此把他麾下的甘军激成兵变，则京城治安就大有可虑了。——聪明的慈禧当然体会到，这时的「八三四一部队」是抓在他二人的手中啊。他二人如联手不听「老佛爷」的话，则释迦牟尼也无计可施啊！为杉山之死而惩凶的谕旨也只好不了了之。

据说福祥与戴漪从陛见退出时，载漪拍福祥之背，并翘起大拇指，大夸福祥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见《清史·董福祥传》）

时局发展至此，慈禧显然知道，外御洋人，内安反侧，她已渐渐失控了——这时在天津，聂士成为阻止西摩的「联军」入侵北京，双

方已打得炮火连天，士成后来终于战败殉国。为抢救此一失控局面，她似乎与荣禄有过密议。二人决定了一个最有效的万全之策！急调李鸿章与袁世凯来京共纾国难。

李鸿章原是荣禄的政敌。李之下放广州就是受荣禄排挤而去的。但是荣禄没有应付洋人的本领。现在夷情紧迫，他与慈禧束手无策，只好又策动老太后速调李鸿章回朝了。

至于袁世凯，他本是荣禄的死党。一向对荣感恩戴德、忠贞不二。如今又手握重兵，诛义和团如杀鸡犬，深为洋人所喜。因此如李、袁二人能联袂返京，则荣禄和慈禧所感棘手的一切内外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这确是最高明的一着。因此六月十五日军机处便传旨，令李鸿章与袁世凯迅速来京。——这时由于义和团拔电杆，北京与外界电讯已断。然荣禄与袁世凯之间，则「百里加急」的传统驿马，仍可照跑无讹；而袁与南方三督，尤其是与广州的李鸿章，则电讯日夜不绝。

百年回看水晶球，当时如李、袁应召返朝，则我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八国联军」这项国耻，或可消灭于无形。不幸的是，西后把召袁之命随即取消，转而重赏义和团，决心攻打使馆，杀尽洋人，并决定与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

她老人家何以一夜之间发起疯来，把原先设计好的万全之策，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扭转，而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的绝境呢？这就出于一个小小的「蒋干偷书」所获得的假情报的刺激了。——历史发展的长江大河，为一点藐小的个人情绪而变了方向，是史不绝书呢！一

九三六年冬，张少帅发了一顿小小的少爷脾气，不是把我们五万万同胞，朋友，包括你和我的命运，彻底的改变了方向，以至于今日？

### 「蒋干偷书」的假戏真演

就在西后决定调回李、袁之翌日（六月十六），由于时局紧张，老太婆便召集了一个包括六部九卿、军机、总署和诸王贝勒的大型「御前会议」，以商讨和战大计以及剿抚义和团的决策。这个会显然被端王所领导的激烈分子控制了。会中主和派袁昶、许景澄等偶持邪术不足恃之说，便被端王所呵止。慈禧也认为邪术虽不可用，而人心则可用。可是就在这一天，义和团在大栅栏放火，把前门大街一带数千家商铺烧成灰烬，而大失人心。因此在会议之后，慈禧还是要方从涿州回京而力言拳民可用的刚毅，偕同董福祥「开导（拳民），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管束。」（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一四五。）

谁知这道「勒令解散」的上谕颁下不及二十四小时，朝命便反其道而行呢！

原来就在当天的午夜，朝中接到一通绝密的情报，说洋公使已决定合力扶植光绪而赶掉慈禧——这是戊戌以后慈禧最怕的一着，如今这最怕的一着就要成为事实，怎能不令老太婆魂飞天外呢？情报的来源是这样的：

原来就在这天午夜，忽有人私叩荣禄之门，说有机密要事告急。荣禄接见后才知是他的心腹，时任江苏粮道罗嘉杰的儿子，奉乃父之命亲来告密者。这情报透露各国公使已联合决定向清廷提出四项要求：



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各国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

荣禄得此情报之后，顿时如雷贯顶。他知道在「戊戌政变」中，他当慈禧鹰犬时所做的好事。如今十一国列强勒令太后归政，拥戴光绪复出。光绪复出，荣禄还有脑袋吗？所以荣禄得报，彷徨终夜，绕室而行，知道是大祸临头。天方亮他就入宫觐见，把情报递给慈禧。太后览报，自然更是热泪横流，悲愤交集。

这位老泼妇独裁专制四十年；她谁也不怕，只怕洋人。如今洋人最后真来要她的老命了。在眼睁睁就要投缳自尽之前，她还管得了大清江山，兆民生命？她就放泼，和洋人拼命了。

### 「政治家」退化成「女人家」

西后显然与荣禄计议之后，便立刻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她在会中讲话时首先叫「诸大臣」；在激动之下，她又口称「诸公」。在中国两千年专制历史中，皇帝与太后向无称群臣为「诸公」者；骄傲跋扈如叶赫那拉氏者，自然更是前所未有，足见其方寸已乱、手足无措之激动情况。当她连哭带说把「四条情报」宣布时，全场惊愕，不知所措。端王以下最激烈的亲贵二十余人，竞相拥哭成一片。在激动之下，他们咬牙切齿，立誓效忠太后，不惜一切与洋人一拼。太后也说洋人既已决定开战，大清亡在目前。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页四八～四九。《史事要录》所节诸书亦足参考，见页一六八～一七八。）

这样一哭一闹，老太后也就把前一日的对义和团「勒令解散……严加管束」的上谕一笔勾销。主和派的光绪、立山、联元、袁昶、徐用仪、许景澄，同遭申斥，齐靠边站，朝廷就决议重用义和团对十一国列强不惜一战了；主和五大臣，其后也相继被杀。

六月十七日（阴历五月二十一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因此也就变成了中国的御前动员会议。刚毅、载勋、载濂、载漪、载澜乃奉命统率义和团。载勋旋即代替崇礼出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从此九门大开，四郊义和团乃大批涌入北京。日夜不绝（见《庚子纪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大沽炮台也于此日被七国联军所攻占。（大沽之战时，美国海军拒绝参加，详见下篇。）

### 德使克林德溅血街头

北京情势既如此紧张，十一国公使自然也日夜开会商讨对策。他们第一目标当然还希望中国政府剿匪睦邻。在六月二十日清晨集会时，德国公使克林德（Freiherr von Ketteler）乃主张与会公使集体行动，联袂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各使不愿偕往，克林德乃单独行动，乘了他那豪华的绿呢大轿，带了一个乘小轿的翻译官克达士（Herr Cordes）前往总署交涉。行至半途他就被载澜麾下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小队长）恩海一枪打死了。轿夫大恐乃摔轿而逃。当时坐在小轿中的克君，也被摔在地上，把屁股摔成重伤。（据《景善日记》所载，克林德的死尸是袁昶收的，而载澜则要载漪下令，把死尸斩首，悬于东安门示众。史家或疑《景善日记》为荣禄伪作。然纵系伪作，书中所言故事亦大多可信。参见《庚子大事记》及摩尔斯前书。）

克林德公使一死，北京的东交民巷，就变成慈禧太后的「珍珠港」了。事已至此，一不做二不休，发疯了的老太后索性取出「内帑」（她老人家的私房钱）数十万两，重赏三军和在京津两地念咒打拳的义和团，要他们在天津攻打租界，在北京围攻使馆，务必把在华洋人赶尽杀绝，以泄心头之愤。（见《档案史料续编》页六一五～六一六。）

六月二十一日（阴历五月二十五日）她老人家乃用儿皇帝之名，写了十二道绝交书，就和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了（多余的一份则送给当时也被围在东交民巷之内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一诏战天下，慈禧老太后就变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最勇敢的女人了。

有四十年当国经验的慈禧老太后不是这样的人嘛！她原是一个凡事都留有退路的「政治家」嘛！这一次怎么做得这样绝呢？那时在一旁冷眼观察的费正清的老师摩尔斯，对她的评语最是入木三分。摩说：「太后一向作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这次她这个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了。」（The empress dowager had long avoided committing herself to any position from which she could not withdraw, but now the statesman was lost in the woman……见摩著前书，卷三，页二一九。）

**【附注】**慈禧太后在一夜之间，便从个「政治家」，变成个放泼的「女人家」，一般的当时和后世的观察家、政论家和历史家，都认为她在这紧急情况之下，歇斯底理的失去了理智。笔者虽基本上同意此说，但亦另有解释。那便是西后心智十分狡黠，她在这绝望情况之下，以义和团小将为幌子，对十国公使（德公使已死），来个「绑票勒索」。她的「赎金」或「释放条件」便是十一国改变对

华政策，不要她「归政」。否则义和团「绑匪」，就要「撕票」，大家同归于尽！西后不是个糊涂人。相反的，她是个最工于心计的女纵横家。笔者作此「大胆假设」，虽难于「小心求证」，但在现代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上，是可以言之成理的。

## 西太后的「珍珠港」

叶赫那拉老太太这一记轰炸「珍珠港」的行为，可把我们的国家民族弄惨了。最后闹掉十几万条人命，还赔上北京宫廷和市民千万件无价的珍宝，加上四万万五千万两雪花纹银。诸位华裔读者们要知道，你和我的祖宗，那时都各赔一两呢！说来难信，慈禧老太这个「珍珠港事变」从头到尾是从蒋干先生自作聪明偷来一件假情报搞起的。殊不知当时驻华十一国公使，本来各怀鬼胎，彼此嫉妒，搞个「七国联军」的集体行动，已非易事，不要说提出有关中国内政的「四大要求」了。这四项要求中如真能实现太后归政、光绪复位这一条，对当时中国政局可能真有起死回生之力呢！但是大清帝国的起死回生，关他们十一个帝国主义的屁事？他们才不会提出这项要求呢！等到事后中国方面发现列强并无此项要求时，大家乃怀疑这情报为端王载漪所伪造，来故意刺激太后的。其实端王那一伙哪有周瑜之才？他们才造不出这样高明的假情报呢！这个假情报来源实出自英商在上海所办的英文《北华捷报》（North-China Daily News）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九日（清历五月二十三日）的一篇社论。此文复于翌日重载于该报周刊的《字林西报》（North-China Herald）。这篇社论文稿在刊出之前，可能被报社中华裔职工所获悉，辗转为罗嘉杰粮道所闻。他乃根据情报人员的谎报或误译，也或许是他自己为邀功而改头换面、加油加醋，译成

汉文，便向荣中堂告密了。——这位粮道先生开了我们价值四万万五千万两雪花纹银和千万条人命的一个大玩笑。我们如把一百年前四万万五千万两纹银在那时的市场价值，折合成今日的物价，该值目前美金现钞几十万万元，我们「罗蒋干」先生这项乌龙，实在摆得太大了。

在这篇社论里，作者的确提到「太后和她的帮」愚蠢地蓄意与「全部列强开战」，并强调「这个帮如不自动毁灭，就应被赶出北京。我们希望能使光绪皇帝复位。我们应向中国人民确切表示，目前这一战争全为西太后所发动。吾人只是与北京的窃权政府作战，而非与中国为敌也」。

这只是一篇报纸的社论。以光绪复位代替慈禧甚或有违于英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呢！至于代收钱粮，共管军事，全为情报人员所妄加。此时英美两国为防俄德等国搞瓜分勾当，对己不利。他们但愿使中国这个最无能的政府，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庶几利益均沾，维持现状。英国当时掌握了中国外贸百分之七十以上，中国进出口航运近百分之九十；美国斯时在中国无半寸殖民地可向外发展，所以「维持现况」(maintaining status quo)——是所谓「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对他英美两国最有利也。

事实上，八国联军之后，美英二国协力维持首要战犯慈禧太后权力于不坠，其居心与二次大战后，美英联合维持日本首要战犯裕仁天皇的皇位，实如出一辙。老太后为一项假情报弄得方寸大乱，实在是知识不够，朝中无人，有以致之。那时李鸿章如仍居相位，叫他底下的洋员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赫德(Sir Robert Hart)或

丁韪良等到使馆一问，一切不就豁然冰释？哪要老太后去上吊寻死呢？

那时中国的南方督抚都雇有「洋员」，在涉外事件中以备咨询，以供跑腿，所以情报比较灵通，交涉亦能抓着要点。这些洋员如李提摩太等，大都忠心耿耿，为雇主实心办事，在中国官场中极获好评。这种洋员所提供的服务，到民国初年就逐渐被留学归国的「博士帮」所代替了。在民初军阀时代，诸大军头们从穿西服、乘汽车、打网球到买军火、订条约都少不了他们。接着而来的国、共两党原多是以归国的留学生为骨干的，涉外事件就少烦外人了；但是在「西安事变」中，还不是有个端纳跑来跑去？等到毛泽东登台，自恃天纵英明，一切恢复土法炼钢，在对美、苏左右开弓之余，伟大的盟友，就只剩一个阿尔巴尼亚（Albania）了。嗣后江（青）太后登台，「海外关系」简直就是「里通外国」。江老太后和她的四人帮如真的掌权了，说不定也会搞个「对十一国同时宣战」呢！江婆娘的泼辣与无知岂在叶赫那拉氏之下？

这番话当然是离题太远，但是在历史剧不断重演的近代中国大舞台中，偶把演懿贵妃的刘晓庆和演赛金花的王莹，排排坐、比较比较，可能也不算是浪费笔墨。——毛主席和他的四人帮与西太后和她的载字辈四人帮，土法炼钢的所作所为，真是如出一辙啊。

再者，西后之决定与十一国宣战，可能也是出于她自作聪明的愚蠢的权谋——她或许想利用义和团去劫持列强公使，以逼迫列强政变强迫其「归政」的政策。不成则以义和团为替罪羔羊！其手法与七十

年后毛泽东之利用红卫兵，如出一辙。当续论之。

### 刘坤一与「东南互保」

西太后既假儿皇帝之名向十一个列强同时宣战矣，她和她的四人帮的战时政策，第一便是整编义和团为「八旗」，由端王统一指挥守卫禁城。六月二十二日以后诏谕亦由端王发布。禁军亦唯端王之命是从（见《字林西报》六月二十四日以后各期）。端王并通令全国，筹款调兵，勤王抗敌。因此朝廷一再降旨全国督抚、上下臣工「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各将军督抚等，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务必灭洋到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二二一～二二二）。七月十四日天津失守，廷谕再次督战，强调「天津失陷京师戒严，断无不战而和之理」（见同上，页三六六）。与此同时他们还通令全国废除洋操、洋服，而恢复用刀弓石的武考呢！

但是清廷这时有何力量能抵抗八国入侵之联军呢？这分明是螳臂当车。战事一发动，李鸿章即认为各省勤王援军无益。盖不待勤王之兵到达，北京就要沦陷，朝廷就要「西迁」。（见《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一三，引〈李文忠公电稿〉致袁世凯电。）

李鸿章不是唯一的预言家呢！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尤其是铁路大臣盛宣怀等人都洞若观火。这原是常识，不待智者而后明也；只是端王把持下的中央政府太愚昧无知罢了。所以东南地区汉族督抚就藉口廷谕为「矫诏」，不从「乱命」。他们就与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分别议约搞「东南互保」了。

革命精神很充沛的后世史家，兼有对「东南互保」作非议者，殊

不知那时不搞「互保」，则长江中下游地区亦在战火中矣。盖宣战之诏尚未下达之时，英人即向美国驻沪总领事古德纳（Goodnow）扬言（Open talk）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及整个吴淞地区。以试探美国的反应。刘坤一得报，乃密遣洋员美人福开森（J. C. Furguson）与古德纳疏通，密报华府设法制止。另外亦调兵遣将决心武力抵抗，英人才知难而止。（见「美国国家档案局秘藏原档」，古德纳于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对国务院副国务卿之密报。）

在武汉方面，张之洞亦极力维持地方稳定，减少洋人入侵藉口（见同上附件）。同时诸方面大员合议，如北京失守、两宫不测，他们就选李鸿章作总统以撑持危局（这时孙中山也殊途同归，曾提出相同的建议）。鸿章对「伯理玺天德」（总统）大位，也颇有兴趣。其后慈禧与光绪安全逃到西安，此议遂寝。（见《年谱》页四三二，引《国闻周报》。）

张、刘、李这几位督抚，老实说，都是熟读圣贤之书的传统政治家啊！可恨国运如斯。形势比人强而长才不展。

### 悬赏捕杀洋人

西后宣战后第二项绝招便是悬赏捉拿洋人，把他们斩尽杀绝。

中国历史故事中原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说在蒙古人入侵中原时，每家都住有鞑子特务。某年中秋节民间以月饼为传媒，全国在一天之内同时动手把鞑子杀光。这次中外既然宣战，大学士徐桐等也奏请西后下诏「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一九六）。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等



也在北京街头遍贴告示，悬赏捕杀洋人。赏格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见同书，下册，页八四二。）因此当恩海一枪把德使克林德打死之后，他不但对凶行直认不讳，他还在等着领赏呢。

笔者昔年服务哥大时，前辈老友富路德教授（Luther Carrington）时常自笑幼年时小命只值三十两纹银。因为他在庚子年曾随他传教士父母被围于东交民巷之内。那时他才六岁。富家一直是在通州传教的。事发时就近逃入北京使馆，躲掉一劫。其他不幸在山西传教的欧美传教士，就全部罹难了。

当时山西巡抚毓贤，在奉命缉捕传教士和教民时，他谎称「集中保护」，把全省的外国传教士男女老幼四十余人，或骗或捕，都集中到他的巡抚衙门里来。七月九日他把他们全部剥掉上衣，罚跪于衙前广场，一一砍头杀死。有一位长着马克思式白胡子的老主教，起身质问毓贤为何无辜杀人。毓贤抽出佩刀，二话不说便一刀劈去。老主教头面血如喷泉，白胡子顿时变成红胡子。毓贤又补上几刀，便把这位老人杀了。这一天他一共杀了传教士及家属共四十六人，包括十五个男人、二十个女人和十一个小孩。真是甚于虎狼，残忍之极。（见管鹤著《山西省庚子教难前后纪事》及《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五〇暨 Robert C. Forsyth 著《庚子年殉难中国烈士考》（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页三〇以下。）毓贤在山西省一共杀了多少传教士，众说不一。因为教士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统计数字不易齐全也。至于他杀了多少「二毛子」（教民）和与外事有关的人士。那就更无法计

算了。

### 拿「一龙二虎十三羊」开刀立威

在大杀洋人和二毛子的同时，那些志在夺政权扶清灭洋的载字辈四人帮，还要在朝内立威，拿义和团所点名的「一龙二虎十三羊」来开刀祭旗。

在对列强宣战后四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已故恭亲王奕訢次子）四兄弟率义和团大师兄刀斧手六十余人直闯瀛台，要去把载湉（光绪帝）干掉。这樁「弑帝」、「杀龙」行为，虽为西后所制止，但是这条「龙」也就生不如死了。他不但在御前会议中时遭端王、庄王的折辱，据说连个年方十四的「大阿哥」（载漪的儿子）也指着他叫「二毛子」。如此，则老太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人物是谁，就不言可知矣。（见《景善日记》及多种杂著，故事多有可信。）

至于「二虎」——李鸿章和奕劻——李被下放广州，远走低飞，鞭长莫及，四人帮对他无可奈何。据说鸿章初闻下放消息时，乐不可支。盖以远离虎口，颇感身心两快也。如今「北事大坏」，收拾残局，「舍我其谁」（鸿章豪语，均见《年（日）谱》），杀不得也。奕劻之罪，只是对洋人「太软」（见《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志》），不足杀也。真正倒霉的便是「十三羊」了。

「十三羊」的名单上究竟是那些人，说者不一。但是他们和其它类似的什么「十三太保」、「十八罗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等等一样前几名总归是固定的。「十三羊」前五羊应该是那五位因力主剿拳议和而被杀的「五大臣」。前驻德俄等国公使，嗣任吏部左侍郎许

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是在七月二十八日被杀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前户部尚书立山，则是八月十一日被杀的，所谓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见《史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页二二），而时未经旬，北京亦为联军所陷。

慈禧为什么在弃城潜逃的绝望时期，把主和大臣一网杀尽呢？这就是一些大独裁者（不论男女）最狠毒的地方了。所有的独裁暴君对异议者都是睚眦必报的。她这次败亡出走，生死未卜。但她绝不能让她自己死于异己者之前，而使异己者有与敌人交通之余地也。她投鼠忌器，行前只杀珍妃不杀光绪。然洋人如真要逼得她非悬梁自尽不可之时，则太后之悬梁，亦必在皇帝悬梁之后也。朋友，奇怪吗？我们蒋公自大陆败退时，杀杨虎城而保留张学良，还不是一戏两演吗，那时如宝岛不守，蒋公向瑞士逃难，则少帅还能活到今天吗？——此理一也！

《崇陵传信录》的作者恽毓鼎，不谙此理，他把连杀五大臣的黑锅，全给端王载漪背去了。恽说：「先是载漪力主外攘，累攻战，不得逞，欲袭桓温枋头故智，多诛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

这是一派胡说也。试问载漪这个花花公子的师长，曾经「攻战」过什么呢？不错，他打过东交民巷。笔者年前曾在东交民巷（社科院招待所）住过两星期。在巷内巷外绕了无数圈。细看形势才知道当年董福祥、载漪他们攻打东交民巷，直是一场民间「械斗」而已。较之红卫兵「武斗」的规模可能也差得远呢！这又叫做什么「攻战」呢？至于诛大臣以逼上，与桓温废海西公立简文帝的故事相比，也是不伦

不类。试问载漪的「上」是光绪呢？还是西后？是光绪又何必「逼」？是西后，他敢？

诛大臣，载漪亦不敢也。大臣是太后诛的；恶名是端王背的罢了。

### 攻打使馆的闹剧与心机

至于攻使馆，「不得逞」，倒是事实。但这虽是战将的窝囊，事实还是太后留有退路也。且听听老太后在逃难之后，回忆起攻打使馆的一段口述历史。老太婆说：

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是虽没有阻拦（载漪、载勋、载澜）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留有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见《庚子西狩丛谈》）

老佛爷这段话讲的是事实，但在我们搞口述历史的老兵听来，她还是不太够诚实和坦白。——她没有提她受「蒋干偷书」那一段刺激。那时她决定是和洋人一拼，同归于尽了。但是「同归于尽」的「一拼」之间，这位老狐狸，还是留了一条退路。她叫那表面上手握重兵的大将荣禄、载漪、载勋等人代她去和洋人拼命。如果把洋公使的命都拼掉了，而交涉还有转圜余地，那她就以「妾在深宫哪得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藉口，把责任向诸悍将头上一推。杀凶以谢，她还可做她的太后了。——事实上，后来结果就是这样的。

谁知荣禄也是个曹操。他不敢不遵太后之命去攻打使馆。但如真把使馆夷为平地，杀死了几位洋公使，将来洋人追查凶犯，太后被迫缉凶，他的脑袋岂不要搬家。所以他首先装病请假，交出兵权。到后

来懿旨难违，他非出头不可时，他只有故作积极，三令五申督责董福祥的甘军拼命去打。董福祥是个大老粗，在中堂严令之下，他就认真的打起来了。自六月二十日起一连四天，甘军每日开炮多至三百余发。烟雾弥漫、炮声震天。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在这种情况下，区区东交民巷岂不早已夷为平地？各国公使和教士，断无生存之理。因此伦敦各报已刊出英国公使与海关监督等人的报丧「讣闻」(obituaries)。

可是这时在广州看报观战的李鸿章，他和荣禄虽是政敌，却英雄识英雄。六月二十二日鸿章在广州便向媒体透露，使馆无恙，请各界放心，因为他知彼知己。荣禄既未调用他那有德式装备的「武卫中军」，光靠董福祥的土匪军是攻不下使馆的，因为「甘军无大炮」。董福祥所使用的全是一些土炮。只听炮声响，不见弹下来也。（见《字林西报》专栏。）

李鸿章是说对了。使馆被攻，死伤不少，但并未被攻破。果然六月二十五日荣禄便奉太后懿旨停攻使馆，并慰问各国公使。廷谕并向拒奉乱命的东南督抚一再解释，不得已宣战之苦衷（见《义和团档案史料》诸书）。在停攻期间，一时西瓜蔬菜等慰问品满车而来，送往使馆。使在一旁观看而口渴如焚的甘军士兵气愤不已。太后意旨前后矛盾若此，荣禄如真把使馆夷平，那还得了？所以荣禄不但对被围敌人暗通款曲，他并且真的「里通外国」，令人假扮走私窃贼，大量接济使馆守军火药子弹，以加强防御。他怕洋人如真的「弹尽粮绝」被董福祥的甘军攻破，则朝廷和老佛爷，尤其是荣禄自己，都不得了也。

须知荣禄那时所接济洋人的军火可不是甘军所使用的土火药啊！他走私去的可能都是德制后膛枪的「七九钢弹」(? )，锐利无比。所以在六月二十八日停战期满，甘军又恢复攻击。其后「谈谈打打」，双方又械斗了五十余日，使馆始终屹立不动。而围攻的甘军和义和团则死伤千余，均荣禄里通外国之结果也。

上节所述的吾友富路德教授那时才六岁。他就时常违父母之命，爬上墙头「观战」。五十年后他还用他那地道的通州话向我们笑说庚子遗事。真是绘影绘声。

富先生是笔者在哥大二十五年中所遇最可爱可敬的一位老辈汉学家。他的汉语比我说的也纯正得多。他精通汉籍，也深爱中国。为人处世也简直是传统中国里的一位儒家老辈。他是胡适之先生的挚友。也是胡适在一九二七年回哥大接受博士学位典礼中的宾相。他佩服胡适佩服了一辈子。因为他没有适之先生那样的精明和调皮。他浑厚得像传统中国农村中的老农夫。富先生是笔者所认识的前辈之中唯一见过「义和团」的老学者。在退休之前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原名「中日文系」）里的「丁龙讲座教授」。这个讲座是为纪念一位可敬的华侨工人丁龙而设的。笔者对丁龙的故事曾另有记述，不再多赘。然据我所知，坐在这个「讲座」上的「教授」，只富路德一人在道德学问上受之无愧；继他之人则是个下流不通的痞子。

笔者今乘重治拳乱史的因缘，提一提这位拳乱目击者，也算是对他老前辈一点点私淑的纪念吧！（关于这一段拳乱史，中文档案笔记至伙；西文史料如摩尔斯前著，赫德回忆录，R. C. Forsyth 与 A. H.

Smith 等人的著作和汉译 Bertram L. Simpson 而化名 B. L. Putham Weale 所著《庚子使馆被围记》，均足汗牛不及备载。）

### 使馆幸存，首都沦陷

慈禧或松或紧、或真或假，把东交民巷围攻了五十余日的「行为」，可能还有一层她不愿告人的动机——行为科学上所谓「刺激——生机——反应」是也。她想以生死交关的危机，诱迫十国的「钦差大臣」（此时克林德钦差已死了）保证不要她「归政」；也就是撤销蒋干先生偷来的那四条秘密的要求。无奈这四条要求原不存在，而十公使也不是老太后肚子裡的蛔虫，不知如何反应。好在他们内有粮草、外有救兵。他们就冒着生命的危险，死守待援了。

至于老太婆说：「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她说这话确是胸有成竹的，因为她还有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重炮没有动用呢！三十多年之后，当「五次围剿」胜利在望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为当局向「朱毛」致意，不是也说蒋委员长对他们「手下留情」吗？因为中央军里最新式的德制武器都还未对他们使用呢！既然手下留情，为何又一定要打呢？贤明的读者，就自己去回答吧！

老太后的德制大炮在哪里呢？原来它是配备在荣禄的嫡系部队「武卫中军」的炮队里。当董福祥猛攻使馆十数日不得下，端王乃以上谕调中军分统（军阶略近旅长）张怀芝派「开花炮」助攻。这位张分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与曹锟同学。这个武备学堂原是李鸿章授命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主办的，是中国第一座新式军校。这时武卫中军所用的德制「开花（弹头爆炸）大炮」连后

来德国军官都自叹少见。因此张怀芝奉命之初自觉是立功的机会。他乃在城头架好大炮，瞄准使馆区，只要放三五炮下去，各使馆就成为尸体狼藉的一堆灰烬了。正当他要下令开炮时，这位三十九岁的军官忽然灵机一动——他知道炮声一响，后果就难以收拾了。他又改令缓发。随即自己下城直趋荣禄官邸请示，要他的顶头上司手写一道发炮的命令以为凭据。荣禄不敢亲发命令；也不敢不发命令。双方僵持甚久。这一来，怀芝更不敢离开荣府，自作主张，便在荣府赖着不走。最后荣禄缠他不过，乃支吾其辞说：「横竖炮声一响，里边（宫里边）是听得见的。」——这是荣中堂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句不朽的名言；而张怀芝这位后来官至安徽巡抚，民国时代袁皇帝曾封为男爵不受；其后又做到山东督军，和徐世昌任内的参谋总长的大军阀，也不是个笨人。他闻言大悟。乃匆匆赶回城上，谎说炮位不准，需重测方位，遂把目标定向使馆后之空地。众炮齐发，轰了一天一夜未停，直至上谕再次停攻始止。使馆虽饱受虚惊，宫中府中均至为欣慰。（见《义和团史料》下册，页五六二，引《春冰室野乘》；富路德老师与其它西文史料，也颇有惊人的叙述；张怀芝故事散见中英文传记，及《民国人物小传》第五册，页二八〇。）

庚子年围攻使馆的闹剧就这样一松一紧、亦真亦假的闹到八月十四日，使馆内被围洋人与中国教民忽闻哈德门外有机枪声，知洋兵已攻破北京，因当时中国军队尚无机枪也。是日下午二时在数百洋人一片欢叫声中，一大队打着英国旗帜的印度锡克兵（Sikhs, 上海人俗呼为「红头阿三」者），一举冲入巷内。五十天使馆之围是结束了；中



国的首都北京也就沦陷了。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一期

#### 四、不堪一击的拳民与七国杂牌军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可恨的惨剧，莫过于一百年中我们的首都竟三度为敌国占领。在占领期间，敌军的奸掳焚杀之残酷，也是世界文明史上所少见的。

这三次中的第一次便是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并把那一座「东方凡尔赛」的圆明园烧成灰烬。但是这次国耻对满族统治者的教训不大。那时入侵的洋兵不足两万，而北京的禁城之内，巍峨宫阙即有九千余间。加上圆明园、颐和园和东陵、西陵，仅是皇家内务府所管的财产，就足够这些洋强盗搬运的了。那时中国又没有通海口的铁路。再加上北京天津一带高官贵族的王侯宅第，和千万家富商大贾的巨铺广厦。万把个小强盗一朝窜入，个个满载而归，累得要死，也搬不了「天朝」的几座金仓银库。

最可叹的还是有些满洲贵族，他们却认为英法联军的入侵，对大清王朝是因祸得福。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三千年的帝国专制史上，首都沦陷，不是亡国，便是改朝换代。哪有像英法联军攻占了京城，最后只签订了几件「文书」，便率数退走！——历史上哪有这样轻松的事？

再者，签了几件文书，不但夷兵全撤，而且「英夷」还能效忠朝廷，派戈登将军来华训练「常胜军」，助剿「发贼」，消灭叛逆。——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

朋友，在你我看来，清廷在英法联军之后所签订的那一系列的《北京条约》，是何等丧权辱国？——在这些条约保护之下，英国人打开中国内地市场，并在全国各地大量「公开合法贩卖鸦片」，大发毒财！俄国人也拿走了我们的东海滨省（包括海参崴）和整片外兴安岭以东的西伯利亚！这块土地与我们长城以南的十八行省的面积几不相上下！

可是这些损失，对那时享福深宫的小懿贵妃，和后来「垂帘听政」的东西两个小太后，实在太遥远了，何关痛痒？

所以这第一次首都沦陷，对这些满洲贵族，教训不大。相反的，他们反掉以轻心，认为北京沦陷的结果，也不过如此而已。

在中国近代史中，我首都第三次沦陷，便是我们及身而见的，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冬季的「南京大屠杀」了。日军于是年十二月十三日攻破我首都南京之后，时未迭月，入侵日军竟一举屠杀我俘虏军民三十余万人。谁知他们血迹未干，汪精卫所率领的一群汉奸，竟然又搞起「还都」和中日亲善来。其后五十年来，国共两党政府为着讨好日本财阀，对我当年死难烈士也未尝作一日之祭——是何心肝？以后当辟专篇详论之。

### 防守东交民巷的八国洋兵

庚子（一九〇〇）年首都沦陷，是三次中的第二次，所谓八国联军进北京是也。

他们这八个帝国主义对中国这头肥羊的争夺，彼此之间本是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而他们这次竟能通力合作，联合出兵攻打北京，实在也是颠顽昏聩的满族亲贵自己惹出来的。语云：「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次国耻便是很标准的国人自伐的结果。我们如何「自伐」，上篇已详论之。本篇再看看我们「被伐」的惨象。

原来在一九〇〇年春义和团自山东渐次北移时，北京东交民巷里的列强使馆已开始紧张起来。英美德法日等大国驻华公使纷向各国政府及各该国驻华海军，要求派兵保护。

按当时（乃至今日）的国际惯例，使领馆的安全，原应由驻在国政府负责的。聚居北京东交民巷一带的十一国使馆，理应由中国政府派军警保护。但是拳乱一起，外国公使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我们今日回看，这实在不能厚责于他们。我们确实是太落后、太野蛮，外国人对我们才失去信心的。君不见前篇所述日本的杉山书记官和德国的克林德公使，不都是死于街头？

洋公使们既然对清方保护不存希望，他们驻在天津一带的水兵就奉命前去北京担任守卫了。洋水兵开往北京保卫使馆，按国际法是侵犯中国主权的，所以中国总理衙门里负责官员徐用仪、联元等人曾亲往各国使馆抗议（见美国国务院档案）。可是徐、联等人后来连自己脑袋也保不住，怎能怪洋人对他们不信任呢？——据说某次英国公使亲往总理衙门交涉，而接见他的两三位大臣之中有一位可能太胖太老了一点，天气又热，他老人家竟在接见当场中打起鼾来。英公使曾引为绝大的侮辱。然几经磋商之后，总理衙门终于答应各国公使可自带

警卫，惟每国以三十人为限。

中国政府既已让步，各国在天津的水兵就准备前往北京了——他们自己之间的协议则是各遣水兵一百人。但是各国在津水兵又多不足额，俄人只能派遣七十九人，乃又相约最高额以水兵七十九人为限。八国派往北京人数如下：英国七十九人；俄国七十九人；法国七十五人；美国五十三人；意国三十九人；日本二十四人。

以上六国警卫于五月三十一日乘火车入北京。另有德国水兵五十一人；奥匈士兵三十二人，则于六月三日抵京。另加军官十九人。所以当使馆被围攻时，各国共有武装警卫四百五十一人。其中军官二人率水兵四十一人被派往守卫北什库教堂。余众则是保卫使馆区的全部武装了。其中英、美、奥、意四队，各携重机枪一挺。——这支拥有「后膛钢枪」四百余支，加重机枪四挺的东交民巷卫队的实力，在那时也不算太小。所以董福祥那支土军队屡攻不下，也在李鸿章意料之中了。

这支八国拼凑的小卫队，原来也是各怀鬼胎的——尤其是俄国，其志不在京津，而在东北。它一贯的策略是在北京做和事佬，故示好感，以换取它对中国东北的掠夺。所以它这次派来的七十九人，运来大量火药，却少携枪枝，更无机枪；而它那批「俄国造」的大口径弹药，对其他各国的警卫，都不适用。狡猾的俄人是摆个姿态给满大人看的，而满大人（如端王）却一无所知也。

日本与俄国原是水火不容的。此次日本水兵只来了二十四人。书记官杉山彬嫌其太少，六月十一日他就是出城去探望援军，在半途碰

着甘军，才被无辜妄杀的。

大老粗董福祥、糊涂蛋的满族亲贵，哪知道「老毛子」、「大毛子」、「天主教」、「基督教」也是种类繁多的呢？把所有「毛子」一锅煮，则东交民巷里的毛子居民，大家不分南北，也就一道的同生共死了。

他们这支小卫队总算来得其时。全队抵北京后不及一星期，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就被杀了。再过九天德国公使克林德也陈尸街头。克死不足二十四小时，慈禧就下诏对十一国宣战；董福祥的甘军就围攻使馆了。没有这支小卫队，恐怕十一国公使和他们的馆员，以及在使馆区避难的数千名「二毛子」和百十个外国传教士，都要惨遭屠杀了。上篇已提过，那时的义和团红卫兵，和他们的头头四人帮的杀人，心不慈、手不软，是毫无理性的。

### 七拼八凑的联军先遣队

在北京使馆告急之时，原驻天津的各国领事，和在大沽口外游弋的各国海军将领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组织「联军」，开往北京增援。几经会商并由各国政府批准，他们八国终于组成一支拟开往北京的增援部队。这支援军包括英军九一五人，德军五四〇人，俄军三一二二人，法军一五八人，美军一一二人，日军五十四人，意军四十人，奥匈军二十五人。共计二千零六十六人。公推英国海军司令西摩（Admiral Sir Edward H. Seymour）统一指挥，并于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搭火车前往北京，保卫使馆。

但是这支浩浩荡荡的两千夷兵声势太大了。天津四郊拳民乃纷起阻遏，并把铁轨拆毁。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裕禄也下令聂士成统率的

武卫军前往围堵。聂士成原是淮军猛将。他所统率的这支国防军也是配备有重机枪的精锐部队。聂军对义和团原极愤恨。月前奉调镇压义和团时，曾有一次枪杀拳民五百人的血腥纪录，而为在北京当政的端王、庄王所嫉视。可是这次奉命阻遏入侵洋军，他更觉义无反顾。——聂军门原是一位烈性汉子，守土有责的国防将领嘛！因此西摩联军刚出发至天津西郊的杨村时，它就被义和团和聂军包围了。联军要突破围圈，战争也就一触即发了。

义和团原自夸是「刀枪不入」的。聂军乃把他们调上前线去冲锋。结果在敌军机枪之下，血肉狼藉。掉头逃跑，又为聂军所阻。在两面机枪对扫之中，这批可怜的乡民死难之惨，实在笔难尽述。

义和团这群乌合之众被屠杀殆尽，敌我两方的正规部队就短兵相接了。事实上西摩这支联军也是个七拼八凑的混合武装。西摩自己又是位海军将领，怯于陆战，而聂士成却是个视死如归的战将。强将之下无弱兵，因此双方在一番鏖战之后，西摩便陷入重围。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进退维谷，只好就地苦守待援。

### 一场国际轮盘赌

西摩之挫，惊动了八国政府，其时在大沽口外待命的列强海军也慌了手脚。他们在六月十日以后与北京使馆的电讯已失联络。十四日以后西摩亦不知存亡；十六日以后，他们与天津租界领事馆信息也全断。各国海军将领会商之后，就自作主张了。

从纯军事的观点着想，这批洋司令很自然的会想到，他们应该组织个联合舰队，先占领大沽炮台；从而进军天津，以解西摩之围。西

摩之围既解，他们更应组织强大联军，推向北京，庶可拯救命在旦夕的各国公使。事实上其后八国联军的动向便是循着这条逻辑发展的。只是当事各国互相猜忌，想浑水摸鱼，又不敢冒进。他们要搞个统一组织，亦殊不易。

我们贵国原是苏秦、张仪的老家。那时我们如有个把得力的苏、张之子孙，虚虚实实，来把他们挑挑拨拨，合纵连横一下，毛子们的「联军」也就很难实现了。无奈斯时京中当国的老太婆，事急了只会哭哭闹闹；要不就拼命「念咒」——慈禧和李莲英据说一天要念能够千里杀人的灵咒七十遍——希望把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德国的威廉大帝……统统咒死。而围绕老太后的那批亲贵「四人帮」，又是一批鲁莽灭裂、毫无现代常识，只知在国际赌场耍赖的糊涂蛋。

中外的赌场英雄好汉之间，都有一句大家共同遵守的赌规，叫做「赌奸、赌猾、不赌赖」。二次大战临终时，斯大林在雅尔塔那场「沙蟹」里，一枪未发，便取得大战后在远东最大的胜利果实——外蒙「独立」、旅大租借、东铁分享、北韩专占——这是斯魔「赌奸、赌猾」的结果，但是他没有「赌赖」。一九五七年「反右」，毛主席光荣正确伟大地提出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后来他尽食前言，把大嘴巴的「言者」，一个个抓了起来，下放劳改。或有「右派」抱怨主席搞「阴谋」、「食言」。毛说这不是阴谋；而是「引蛇出洞」的「阳谋」！这就是百分之百的「输打赢要」的要「赖」了。毛主席不赌奸、不赌滑，而赌赖者，是他老人家「坐庄」，赌本大。虽然在赌场上做无赖，为江湖好汉所不齿。但是他总算没有「打锅」。最后通吃全场，

席卷而去。——自得其乐也。无赖云乎哉？

可叹的是庚子年间，那些围绕在西后周围的一群以端王为首的亲贵小赌棍。他们霸占了总理衙门，挤入国际轮盘大赌场。却不知如何赌法。——既无赌术、又无赌品、更无赌本。只知乱下赌注，瞎赌一场。

那时我国驻外公使，例如驻美的伍廷芳、驻俄的杨儒、驻英的罗丰禄、驻德的吕海寰等等，都是第一流外交官。可是端王霸占下的总理事务衙门（外交部），对他们却一无指示。在北京当权的那一伙只知督促董福祥向使馆放炮开枪，在外交上他们简直是一群白痴。因此我驻外使节向政府请训的不是中央政府的外交部，而是地方上的三位总督：广州的李鸿章、武昌的张之洞，和南京的刘坤一，而这三位总督大人的意见也各是其是。李鸿章看重俄罗斯；刘、张则倾向英、日。外交上既不能统一指挥，使领人员纵有苏、张之才，也是枉然。

### 聂士成、裕禄相继殉国

现在再看看围绕赌台边的八大洋赌客，是如何下注的。

前节已言之，他们防卫使馆、攻打大沽、占领天津、进军北京，都是要采取联合阵线的。但是诸夷猾夏，他们彼此的利害是永远冲突的。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无法联合的。他们此次之所以能密切合作者，端王、庄王为渊驱鱼，导之使然也。

当大沽炮台于六月十七日被联军攻占之后，我津沽藩篱尽撤、海道大开；列强援军，遂源源而来。在陆上重行组合之后，联军就首解西摩之围（六月二十三日），再与各国租界取得联络，就进逼天津城



郊了。拳民鸟兽散，直隶总督裕禄乃饬提督聂士成，指挥武卫前军奋力抗拒。

士成于此役之前，曾受朝臣歧视，被「革职留任」。但是在七月九日拂晓。当敌军以强烈炮火向其天津南门外八里台阵地猛扑时，弹下如雨。士成两腿均受枪伤，犹督兵不许稍退。营官宋占标劝其稍避而士成「奋不可遏」，仍复持刀督战。直至两腮均被敌弹洞穿，颈侧、脑门等处均受重伤，直至脐下寸许亦被炮弹炸穿，「肠出数寸」，终于壮烈殉国。营官宋占标亦随同殉难。（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二七七。）真是惨烈无比。

但是将士的英勇并不能弥补朝臣的误国。天津城终于七月十四日沦陷。入侵联军纵兵大掠，死人如麻。直隶总督裕禄则率领一些残兵败将，退往北仓。迨入侵联军再度发动攻势时，裕禄遂在军前自杀。

裕禄虽然也是当时政府中的一个腐化的官僚。然自知守土有责，兵败之后，愤恨自杀。自古艰难唯一死。裕禄的殉国，较之三十六年之后，弃城潜逃，置数十万军民于不顾的唐生智，则可敬多矣。——此是后话。

### 面对「人民战争」的威胁

入侵联军既占天津，他们乃于租界之外，另成立一个傀儡政府来征税征夫。这个组织的中国名字叫做「暂时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简称「天津都统衙门」），英文名字叫 Tients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简称 T.P.G.，原意为「天津临时政府」）。天津原有英法德日四国租界，而此一临时政府的组合只有英日俄三国

委员。美国的缺席显然是基于它的一贯政策：中美既非「交战国」，美国即不应参加占领军政府。德国之自外，盖别有打算。因德皇正在向各国要求，以德人为联军总司令也。法国可能亦另有主意而不愿参加。总之当时的联军当轴是同床异梦，各不相下的。在他们联合打下天津之后，如何进兵北京，也是各有打算。只是其时义和团虽然雷声大、雨点小，不堪一击，但它究竟是个群众运动，华北遍地都是。入侵八国都不敢掉以轻心。所以他们才始终抱住「联军」的组织不放。盖其时没有一国，乃至二国或三国联军能具有直捣北京之信心也。——「义和团」洋人呼之曰 boxers(拳师)，是有他们的群众基础的。这一群众基础。不但使老太后认为「民心可用」；它也颇能吓唬洋人的。

当八国联军的头头，在天津会商如何进军北京时，他们面对这个浩荡无边的群众大海洋，也确实有过绝大的顾虑：万一这个广大无边的群众组织，真要对他们来个「人海战术」；来个「农村包围城市」；来个「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停我扰、敌疲我打」；来个逢山筑寨、遇水烧船、围援打点、过河拆桥……他们区区这小撮洋兵，也确是无能为力的。加以时值盛暑，我们那群久已习惯与苍蝇、蚊虫、臭虫、跳蚤、老鼠同居的义和团广大群众，免疫能力又都是天下无敌；而那些以现代化卫生清洁自炫的洋兵洋将，一旦碰到我们这些小动物同盟军，无不上吐下泻、头昏目眩，甚至醉卧沙场，永不西归……。

因此，在天津举行的攻打北京的参谋会议里，入侵联军的将领一致认为，进军北京若无十万八万之众，任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战而

不胜，那他们被困在北京千百个人质的性命，就定然不保了。（见摩尔斯著前书卷三，页二六四～二六八，所引各国原档。）但是哪里又能凑出偌大的兵力呢？摸摸底子，他们原来也是一群纸老虎嘛！

### 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尤其是当时主意最多、顾虑最大的帝国主义大领班的英国，困难也是入侵诸国之最。英国这时为着抢夺南非金矿，正在该区与荷兰移民所建立的两个殖民地小国，大打其「波尔战争」（Boer War）。波战发动于一八九九年冬，历时两年，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一次大战之前，所卷入的最大的一场国际战争。一九〇〇年春夏之交，极其野蛮的英国征波之战，颇不得手。那时年方二十五岁的丘吉尔亦在南非军中，竟为波尔所俘（「波尔」荷兰文意为「农民」），几遭不测。而这时的西摩又为东方的「波尔」所困；其后进军北京，更有几百万波尔在等着他们。因此英国这时侵华也是眼大于腹，手忙脚乱。它除掉勉强调出正规军的四连炮兵来华之外，再无兵可调。侵华武力就全靠它在印度殖民地中所训练的「红头阿三」（锡克兵），和它在威海卫所训练的少数中国雇佣兵（伪军）了。

美国原无作战之心。美军之最后入伙，实在是康格公使喊救命喊来的，而美国亦无多兵可调。这时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刚结束；麦金莱总统无意中竟然搞来一块烫手山芋的菲律宾，也正是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处理呢！在中国方面他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但是康格被困北京，命在旦夕，又怎能坐视不救呢——美国对入侵北京之战，原是勉强加入的。

前段已言之，德、意两国原是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的后起之秀。尤其是德国，野心无限、手腕毒辣，然究竟是个新手；夹于众老牌之间，想后来居上，亦殊不易。这次在天津，它的主意是率领强大兵力，居诸寇之首。要不那就干脆不参加，以待强大后援。——它不愿像意大利那样：无兵可出，仅派几十名小卒，扛了一面大旗，追随诸强之后，狐假虎威，以表示自己的存在。——德国既不想学意国，则庚子年攻破北京的实际上只是个「七国联军」。

联军的统帅瓦德西（Count von Waldersee），只是在七国联军攻破北京（八月十四日）之后的两个月零三天（十月十七日），才率领七千德军，匆匆赶来北京，直入禁城，住入慈禧的仪銮殿来耀武扬威的。这时七国联军在北京奸掳焚杀的高潮已过。——哪轮到当时在北京当妓女的「状元夫人」赛金花姑娘来丑表功呢？这自然是题外之言。

狡猾而贪婪的法俄日三国也深知打下北京，他们除能分点金银财宝之外，其它别无好处。他们的真正油水，是在他们个别的「势力范围」之内——俄在东北西北。法在西南（滇桂黔川四省）；日在闽南，尤其是厦门。在这些地区浑水摸鱼，则中国这潭水就愈浑愈好。如果这支「联军」一旦把北京打下；再由以英美为首的十一国列强组织一个远东联合国，来把这潭浑水滤清，共同监管这个「次殖民地」。那就扒手止步了——事实上，这时英美两国的外交水鸟，就正在向这一方向滑行。是所谓以「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利益均沾」为原则的「门户开放」政策也。——「门户开放」者，非要中国开放其门户也。大

清帝国那时还有资格「关门」？门户开放者，是英国这个既得利益的老流氓，利用一个拳大膀粗而头脑简单的美国「牧童」(cowboy)喝令其它新强盗小扒手，不许他们在中国乱划势力范围之谓也。——下篇再详论之。

总之，他们八国这次在天津开会，商讨进军北京的计画是英美德法意均感兵力不足。能无限制出兵者唯日俄二国，而此时日俄的援军已源源开来。这一形势，在老谋深算的英国政客看来，等到日俄增兵十万，联合占领了北京，其情况岂不比义和团更糟哉？——所以他们就决定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等日俄和德国的大批援军入境，便冒险向北京进攻了。

这支小小的「七国联军」原是个纸老虎嘛！可恨的是我们既有的数十万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却只是个包着火的纸灯笼。——这样则七国联军便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了。更可叹的则是我们那些天才游击专家：刘伯承、林彪、毛泽东、武元甲、胡志明……这时都还在放牛牧豕。他们要早出三十年，哼！定叫你七国夷兵，片甲不还！

**【附注】**我们写中国近代史的人不能把李承晚、胡志明、武元甲、李光耀等民族英雄，视为「异族」。中国自古便不是个单纯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他们也不是像三保太监那样的外族移民（不信你去翻翻他们的族谱）；他们是慈禧太后遗弃的孤儿。笔者不学，便有心为他们在国史中立传。

### 一万六千名杂种杂牌军

上述七国联军在他们占领天津之后，很快的便组织起来了。总人

数约一万八千八百人。各国分配人数和司令官姓名如下：

日军司令官山口率官兵八千人；

俄军司令官林涅维区（Linievitch）官兵四千八百人；

英军司令官葛司利（Gaselee）官兵三千人；

美军司令官霞飞（Chaffee）官兵二千一百人；

法军司令官弗蕾（Frey）官兵八百人；

奥国掌旗官兵五十人；

意国掌旗官兵五十三人。

上列各国入侵官兵人数原只根据各国司令官之自报，与实数相差甚大。而英军三千人中只有四连人是来自三岛的英国官兵。其余则系以印度锡克兵为主的殖民地杂牌军。法军的主体则为征发于安南（今越寮柬三国）的雇佣兵（annamese tirailleurs）。七国之师总人数盖不过一万六千人。（此七国联军总人数，史家各有异说。拙篇则根据摩尔斯前书，卷三，第十章，页二六〇～二八八中所引诸史料。相对之下觉摩氏所采较笃实也。）

在这个国际武装大拼盘里，谁也不服谁。所以他们没个总指挥。大家开会打仗。各军首于运河两岸占好位置；向北对清军防地分进合击。八月五日清晨一声炮响，这个各自为战的入侵联军就开始进攻了。

这时中国方面唯一的战将聂士成已死。武卫军由马玉昆、宋庆所统率。马、宋均是清军中腐化的旧式军官、甲午战争时的败将，畏日军如虎。何况这次八千日军之后，还有上万的红毛军、黄毛军呢！所以双方一经接触，清军便阵脚大乱，一溃不可收拾。溃军与拳民并趁

机大掠。入侵联军虽非劲旅，但是防军太差，两相比较，他们就追奔逐北，大显神威了。清方马、宋两将逃之夭夭。自觉守土有责的裕禄便在乱军之中自杀了。时未数日，入侵联军便进占通州。沿途奸掳焚杀之惨，固无待多述矣。

### 为李秉衡平反

在这场为时不及两周的抵抗七国联军的战斗中，清廷上下可说是窝囊之极。在这群窝囊货色中，值得一提的，反而是当年在山东的始作俑者，企图组织义和团的李秉衡。

李秉衡（一八三〇～一九〇〇），号鉴堂，奉天（今辽宁）海城人，是张作霖的小同乡。早年在清朝地方政府做小官。但此人十分廉洁耿直而勇于任事。曾为清议所嘉许。一八八五年中法之战时，他署理广西巡抚，与冯子材合作，曾打出个「谅山之捷」的小胜仗，颇为舆论所颂。一八九七年曹州教案之前，李是山东巡抚，升任四川总督。就因教案为德国反对而去「督练长江水师」的。前文已有交代。

据毓贤说，义和团之起实是他和「鉴帅」搞起来的。——从历史家绝对公正的立场持论，一位地方官为他所负责治理地方人民的幸福，把当时四处皆是民间自卫会党、团队，加以官方约束，纳入正轨，有什么不对呢，试看二十世纪中期的国共两党，尤其是共产党，不都是如此的吗？朱德、贺龙、刘伯承……不都是从帮会出来的？至于孙中山是洪帮，陈英士、蒋介石是青帮；张作霖是胡匪……，历史家也不应对他们乱作人身的讥评。

义和拳是一个有最大群众基础，而烧香迷信、杂乱无章的民间会

党。「鉴帅」要把他们有条有理的组织起来，有何不好，不幸的是时代未到；那个腐烂的朝廷，不具备组织群众的条件。更无学理足资遵循，群运就出轨了。——朋友，再晚生数十年，他们就是「中共」和「越共」呢！越共那一群土包子，有了新式的组织，就能打得法帝集体投降、美帝落荒而走。——李秉衡的悲剧是时代未到，他做了时代的牺牲品罢了。

庚子之夏，天津既陷。西后大慌，乃向东南各省檄调勤王之师。这时东南三督认为老太婆咎由自取，袖手不管。可是此时在「长江督练水师」的李秉衡这位耿直的东北佬，忍不住了。他认为他要「勤王」；勤王不成，就应死节！

秉衡原是在长江流域参加「东南互保」的。在此最后关头，大可安居华南，自保身家。可是这时他不顾自身安危，便只身北上了。当此兵临城下，朝中无主谋，太后亲贵乱成一团之时，秉衡之戛然出现，真是黑暗中一盏明灯。其后中外史家都把李秉衡看成个死硬主战派。其实李氏并不像端王、庄王那样糊涂。他知道中国断难对抗八国之师。但是权衡当时双方的作战能力，他在七月二十六日觐见太后时，认为「能战始能和」。他主张「以兵法部勒」义和团群众，堵住洋兵入京，始能言和。（见《庚子国变记》诸书）——这一点李秉衡是过分的自信了。他如真能「以兵法部勒义民」，他就是共产党了。共产党在他那个时代出现，就未免太早了。但是秉衡言之有理；兵法听之可信。老太后闻言大喜。乃把京郊几支没用的武卫军拨交秉衡统率，赶往天津堵遏联军。谁知他以卵击石，溃不成军。直至兵败通州。他目睹清



军不战自乱的情况，气愤之极，就决定一死了之。

秉衡于八月十一日在通州张家湾自杀之前，曾留有遗书说：「军队数万充塞道途，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而巨镇小村均焚掠无遗。

「身经兵火屡屡，实所未见。」他自觉「上负朝廷，下负斯民，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无心人矣。」（见《义和团史料》下册，页六四六。）

李秉衡是当时抗战清军的主帅。兵败通州，他原可退保北京；北京不守，他仍可护驾西行。但是他是条汉子，战局如斯，他没脸皮来忍辱偷生，甘作败将。他选择了主帅在阵前自杀的行为，至少还为我们中国男儿留点骨头！

李秉衡是我们中国近代史上，大敌当前而临难不苟免的极少数民族英雄之一。「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秉衡应该是名垂青史的！洋人后来把他列为「战犯」；我们历史家应该承认他是民族英雄。

### 徐家十八位女眷集体自杀

秉衡按体制、按官阶，都是当时前线清军的主帅、抗战将士的灵魂。主帅一死、灵魂全失。兵败如山倒，雄伟的千年古都，就再度陷敌了。

前节已言之，七国联军攻北京，是靠开会打仗的。他们在天津开过第一次战略会议。第二次会议按第一次的议决案，是在通州举行的。他们于八月十二日攻破通州奸掳焚杀了一天，也开了一个会。决议分配了各军分进合击的部位，和攻入北京后，各侵略军在北京内外的占

领区。——可是子女玉帛当前，先入关者为王。十三日夜半曾闹出诸将争功的丑剧。尤其是俄军想抢先入城。谁知他们低估了北京城墙的高度，屡爬不上；却被随后赶来的英军从水门爬入而占了「首功」。

（见同上）

庚子年八月十四日（阴历七月二十日）七国联军攻破北京，对北京市民尤其是妇女，是一场血腥的浩劫。最可恨的是当入侵联军迫近京畿时，那些土军阀的满族亲贵载漪、载勋等人，竟把九门紧闭，使城内居民无法向四郊逃难和疏散。一旦洋兵进城首蒙其难的就是北京城内的妇女了。在那「失节事大」的宗法时代，妇女为贼所污，则生不如死。所以洋兵一旦入城，发现每一口井内都有几个女尸。至于悬梁服毒者，更是无户无之。其中大学士徐桐的灭门之祸，虽只一例，然亦可见其余。

徐桐大学士原是一位力主扶清灭洋的老进士。洋人攻入北京时，他自知不免就自杀了。他儿子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则是西后杀主和五大臣的监斩官。北京陷敌时，他逃避不及为日军所捕，移交清方处死。

（俱见《清史》本传及时人笔记。）

徐氏父子之死可说是犯了政治错误的结果。可是当洋兵入城时，他们徐家竟有妇女十八人集体自杀。——上自八十多岁的老祖母，下及几岁的女童，全家女眷，无一幸免。其中稚龄女童，年幼无知，怎会「自杀」呢？她们分明都是被长辈迫杀的。这些幼女何罪？——笔者握管至此，停笔者再。——遥想九十年前他们徐家遭难的现场情况，真不忍卒书。

我国历代当国者的误国，所作的孽，实在太大了。夫复何言？

### 「赔款」而不「割地」也是奇迹

联军既占北京，分区而治。杀得人头滚滚，其后又意欲何为呢？

义和团之起，原是激于列强的「瓜分之祸」。如今闯下了滔天大祸——八国联军占领了首都，中国已成为八国共有的一块大饼。大切八块，各分其一，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后果呢！

谁知大谬不然。老太后对十一国公开宣战绝交，一仗之下，被打得大败亏输，逃之夭夭。谁知又一次因祸得福。首都沦陷之后，瓜分之祸，竟随之消失。她闯下如此滔天大祸之后，竟然寸土未失。最后只赔了银子了事，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一个奇迹！

至于这项奇迹究竟是怎样造成的，那就说来话长了。

历来我国治拳乱史者，甚少涉及外交；而专攻外交史者，亦不愿钻研拳乱。殊不知拳乱始于瓜分（所谓「势力范围」也）；而瓜分之祸亦终于拳乱。岂不怪哉？拙篇原非外交史，本想一笔带过，然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波及内政；治政治史少掉这一外事专章，政治史就不是全貌了。读者如不惮烦，下篇再把这场国际「沙蟹」，分析一番，以就教于高明。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三期

## 五、「门户开放」取代「列国瓜分」

「门户开放」（Open Door Policy）这个名词对每一个当代中国

知识分子都是耳熟能详的。它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连续发生了两次。两次都在中国这位老人家病入膏肓、九死一生之时，抢救了老人家的性命。

第一次「门户开放」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三年（一八九九～一九〇一）之中，正巧也就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大乱之时。它是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 1838～1905）和那位接着康格出任美国驻华公使，自称「大美国驻华钦差大臣柔（大人）」的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1854～1914）二人全力推动的。

海、柔二人所全力推动的这次门户开放，粗浅的说来有个四句偈的要义，那就是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这条要义的推行，海、柔二公是为着百分之百的美国的利益，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家的利益，也是大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构想的。他们并没有对「支那蛮」（Chinaman）的利益想过半分钟。相反的，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这三年也正是美国「扩张主义」的最高潮。「门户开放」和它原先搞「门户关闭」的所谓「门罗主义」一样，都是「扩张主义」的一部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正是他对这段世界史深入的观察。——在下是个以「笔则笔、削则削」自许的臭老九，绝不因老列的帝国主义也崩溃了，就对他打落水狗。

事实上，就在这个「门户开放」年代，数十万我们的旅美先侨，也正在最野蛮的所谓《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s）压迫之下，被整得家破人亡；妻子女数十年不能团聚。我们的驻美

公使伍廷芳是条汉子。为着护侨，他不惜攘臂力争。正因为他是个第一流的外交官，美国国务院就对他作最横蛮的杯葛和孤立，使他数年不能约见国务卿一次。一九〇五年在中国国内也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反美和抵制美货的群众运动。——那是一樁有高度理性的爱国运动；不是像后来红卫兵那样胡搞啊！

所以那时横蛮到绝顶的美国统治阶层，何爱于与禽兽同列的「异端支那蛮」（这是当年加州的《排华法案》上对中国移民的定义）。可是此次他们所推动的「门户开放政策」，却抢救了衰迈的大清帝国一条老命，使它维持了「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四人帮、义和团闯下了如此滔天大祸，结果我们全体老百姓只各赔纹银一两销案！你说这不是异数？没这个门户开放，我们这个古老的「东亚病夫」，可能就要和无用的「欧洲病夫」（The Sickmen of Europe）的鄂图曼大帝国（Ottoman Empire）一样，被各帝国主义大卸八块的瓜分了。

老美救了我们一命的伟大友谊，我们就应该泣血稽颡，感恩图报哉？朋友，国际间哪有真正的道义之交，大清帝国只是在各国的「利益均沾」的前提之下，与老美有点利害相同，也就无意中沾了点光罢了。当然。那时主持我们外交活动的东南三督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也是功不可没的。让我们再回头看看在八国占领中的北京情况，和我们三位外交领导是怎样地撑持危局的。

### 长老会的牧师也占领王府

前文已略言之，在一九〇〇年八月中旬，当七国侵华的杂牌联军一万六千人，攻入北京时，他们是把北京分成几个占领区，各占一区；

留一区给他们的德国总司令和后至的七千德国兵来占领。天道好还，这正和一九四五年苏美联军分区占领柏林一样。只是他们尚未在北京城拦腰筑道围墙，把北京一分为二罢了。

读者试想，那时我们的大清帝国是何等窝囊，竟让一队两万左右的杂牌洋兵，占了北京，横行华北，这些洋兵在北京奸杀掳掠，是横行无忌的。那时军纪最坏的是俄国兵——坏军纪是俄国兵的传统。二次大战后，占领我东北的正规苏联红军亦不能免。作家萧军就是因对这批老大哥的行为不满而被毛泽东罚令劳改的。

庚子十月始赶到北京的德军，其军纪之坏也是无以复加的。他们和二次大战时的日军一样，为对被征服者显示威风，杀人强奸掳掠，都是不犯军法的。可是庚子年攻入北京的日军，倒颇为不同。那时的日本刚做了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初尝滋味、乍得甜头；他们要自我表现，力争上流，因此作战争先，掳掠落后，一时颇为他们入侵的友军和本地华民，另眼相看。

入侵敌军的为非作恶，是可以想象的。可是原在东交民巷避难的上帝使徒，一旦重获自由，居然也加入为非行列，那就出人想象之外了。当东交民巷和西什库大教堂一旦被解围之后，数千教民在数十位外国传教士率领之下，乃一哄而出，在七国联军于大街小巷盲目掳掠之间，他们对北京城内情况最熟，就择肥而噬，作起有系统的掠夺了。就以那时原在北京传教的长老会中青年牧师都立华（Rev. E. G. Tewksbury）来说吧！在联军入城之后，他居然也强占了一座王府。这座王府的主人可能是个「世袭罔替」的亲王，他府内有各组建筑五

十余座，大得吓坏人。但是这位小亲王（根据史料不难查出）其时不过九岁，不可能与义和团有什么关系；更谈不上是什么「毁教灭洋」的战犯。但不论怎样，那位仅有县长资格的都牧师，就把这座显赫的大王府（在今王府井大街一带。）鹊巢鸠占了。真是羨煞洋兵、妒煞同伙。

在都牧师搬入王府之前，此处已遭洋兵数度洗劫。但是王府太大，数度洗劫之后都牧师还找到白银三千多两（那时与美金比值，大致每两值〇.七四元）。单单这三千两白银就是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后来都氏又在卢沟桥一带为长老会购地兴建一座郊区别墅，所费不过一千五百两而已。

再者这五十座府内建筑之内的家具陈设，各类名瓷和苏绣湘绣的桌帏椅搭帐幔等物，所余亦多。都氏竟异想天开地，摆起美国式的「跳蚤市场」，加以拍卖，大发其财。他的美籍友好，有的难免摇头非议，而都牧师却笑说是「上帝恩赐」。（见 Marily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91~193. 所引当时之第一手史料。此外本书作者所未及见的公私文件和国务院秘档中亦触手即是。）

这位老都立华牧师的儿子小都立华牧师（Rev Malcolm Gardner Tewksbury）。笔者亦曾有缘识荆。他是一位极可尊敬而热爱中华的宗教老人；说得一口很标准的京片子。在五、六〇年代里，不知替多少对华裔新婚夫妇用汉语证婚。所引《礼记》、《诗经》也可信手拈来。他老人家后来衰迈时，有次深夜为黑匪毆劫，爬行回家。我们闻讯都赶去慰问。

都老和我们之间，教会内外的共同朋友极多。有的友好如看到上段拙文，可能觉得我应为尊者讳。我自己则觉得无此必要。盖人类原是「社会生物」(Social Being)；任何个体的社会行为是摆脱不掉他自己生存的社会。拳乱时代在华的传教士，他们目睹当时贪婪暴戾的满族亲贵的胡作非为；目睹义和团小将的残酷杀人。都牧师那时仅是位美国青年，在死里逃生之后，对迫害他们的中国贪官污吏的报复心情，原是不难理解的。再者，他们的行为虽然也是掳掠，但与当时横行街头肆意奸杀的洋兵，究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这些小故事都早经哈佛大学师生采为博士论文之素材；而名垂世界文坛的大作家马克吐温，在其文集之内，对此也有长篇大论的专著。既然是举世皆知的史实，我们就更不必为华文读者特意回避了。

### 马克吐温仗义执言

上述这些故事除掉见货心喜的人之本性之外，他们也有些不患无辞的理论根据。那就是既是拳乱的受害人，不特中国政府要对他们负责赔偿；中国民间也有负责赔偿的义务。他们不特要向政府索赔；也要向民间索赔。因此一旦入侵的联军大获全胜之后，义和团销声匿迹，教士教民一哄而出，整个华北城乡，就是他们的天下了。不用说城乡各地原先被毁的教堂教产要勒令所在地区乡绅士民集资重建，而所建所修者，往往都超出原有的规模。如有动产被掠被毁，则本地绅民不特要折价赔偿，而所折之价，一般都超出原值甚多。被迫集资的华民，敢怒而不敢言，只有遵命照赔，谁敢说半个不字呢？可是美国毕竟是个民主国家，上有七嘴八舌的议员，下有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更多



的是专门揭人隐私、挖掘内幕的「扒粪作家」(muckrakers)。这些神职人员在中国胡来，很快就变成北美各报章杂志的专栏。事为大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 1835~1910, 原名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所知。他为之气愤不已，乃摇动大笔，在美国主要报刊上指名挞伐。教会不甘示弱，也组织了写作班子。与马氏对阵。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加以他们的文笔又怎配与马克吐温交锋呢，藏拙还好，抖出更糟。英语所谓「洗涤脏被单于大庭广众之间」(Wash dirty linen in public)。也可说是声名狼藉，乌烟瘴气吧！

最可笑的还有各不同教会之间的相互嫉忌与竞争。此种情况不特发生在华北，华中、华南亦不能免。尤其是「天主教」与「基督教」更是为着争地盘、争教民、争教产而吵闹不已。他们彼此之间又都各自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某次有位天主教的「神父」，绑架了一位基督教的「牧师」，闹入中国官府，而中国政府既无权也不敢稍加干预，只是当他们之间吵得不得开交时，始试作和事佬；在双方对立之间，两面磕头。

### 新旧教之间也势成水火

在安徽宿松县那时也发生一桩更可笑的偷窃小事而闹入巡抚衙门里去。原来宿松一座基督教堂失窃；其它财物之外，连教堂大门也被小偷拆去了。当地绅民谁有这吃老虎胆量来收购这些赃物呢？尤其是教堂大门，谁敢要？谁知道小偷有外交天才，他搞以夷制夷，乃把这副门卖给一个天主堂了。当宿松县知事奉美国牧师之命，追赃捕获了小偷，而发现赃物却落在位神父之手；这位中国县太爷傻眼了；

回报无能为力。牧师不服，乃亲向神父索取。而该神父则要他「备价赎回」。教堂岂可一日无门呢？牧师先生情急乃备款来赎；谁知神父认为奇货可居，又提高叫价，比他原付小偷的赃款要高出一半。牧师不甘勒索，不愿多付。不付则教堂无门；二人乃大吵。可是天主教比基督教组织更严密，势力更大。牧师纵有再大法理，不付钱只好开门传教。

他二人吵不开交，那在一旁观吵的宿松县太爷，两头作揖，也解决不了。因为他二人都有更高秩位，宿松县七品小官，怎敢乱作主张？他本可以我们安徽人民血汗，代赎了事，但此例不能开也。

新教牧师吵不过旧教神父，乃具状万言，报向上海美国驻华总领事；总领事越洋报入华府国务院；为一副木板门，官司打了半个地球！向本国政府寻求公理之不足，牧师先生又具状告向安徽巡抚。巡抚大人对华民固有生杀之权，对洋人的一扇木板门，他却束手无策。——此事庄王、端王乃至西太后都不敢碰，你小小安徽巡抚算个鸟？

至于这副木板门最后主权谁属？读者贤达如有兴趣，不妨去一搜盈篇累牍的美国国务院老档，自可找它个水落石出。笔者不学，然十多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究比一副老板门值钱，所以就不想打破砂锅去问到底了。但是还要噜噜苏苏说了一大堆者，也是因为见微知著。让中外读者们看看，我们那时作次殖民地的遭遇是多么辛苦罢了。（见美国「国务院原档」，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八日及以后，总领事古德纳致华府国务卿报告书及附件。）

**德军肆虐，传教士收保护费**

以上所述各国神职人员趁火打劫已属过分，更可恶的则是他们一不做二不休，还师法当时横行中国东北的「胡匪」和今日美国的（华裔越裔）帮派恶少，把华北村镇划为「保护区」，向居民征收「保护费」。因为当时八国侵华的占领军，尤其是迟到了两月之久的德军正向京津四郊，铁路沿线，南及保定府，北至张家口，西去紫荆关，窜扰不停。大小村镇，稍不如意，便被冠以义和团残匪罪名，恣意烧杀。当十月十九日部分南侵联军（美军未参加，俄军主力已撤离北京）奉瓦德西之命，进占保定时，当地中国地方文武官员由署直隶巡抚廷雍率领，奉李鸿章之命，持白旗备厚礼，全体出城郊迎。（此时李鸿章已在北京。李于十月十一日抵京，瓦德西则于十月十七日抵北京。李较瓦早到一星期。）谁知联军甫入城便将廷雍逮捕。旋即自组一军事法庭，以中国式的「三堂会审」的派头，使罪犯袒跪庭前供认罪行，然后将廷雍及保定守尉奎恒、驻军统领王占魁等三人当众砍头。道台谭文焕则被捕解天津，由洋人自组的都统衙门斩首示众六日。其它小官小吏甚至无辜百姓被捕杀猎杀者，更无法统计。其后数月联军更四出窜扰数十次。（以德军为主，法、意军次之，英、美军未多动。俄军在直隶亦未动；在东北则攻占未停。日军在直隶未动，在南方则图窃据厦门。俱见下节。）华北州县骚然。

德军四出，也提供传教士发财良机。这就是所谓「保护费」或「保险费」了。他们四出由口头或书面向乡镇勒索，出资者可保证不受洋兵骚扰。为着妻孥的安全，为着生命财产的保障，偷生于白色恐怖之下，战栗华民，谁敢不罄其所有？！

以上都是铁案如山的事实。笔者信手拈来若干节，只是冰山之一角耳。然纵是一鳞半爪，亦可聊概其余。笔者试选一二之目的，只是想说明，历史里面的悲剧与善恶，都不是绝对的。一个手掌打不响，两方面各有善恶。拳乱时代我们大清王朝内的贪官污吏，昏聩糊涂，和义和团的画符念咒，其劣迹固罄竹难书。但是侵袭我们的东西帝国主义，也万般混帐；不特他们的军阀政客毒贩奸商，罪无可逭；连他们专程来华劝人为善的上帝使徒，亦不无可议。如此则坚持「帝国主义不存在论」的中西学者，又从何说起呢？。

历史就是历史，故笔者直书之。知我罪我，则由读者公断之也。

### 瓜分中国事小，瓜分英国市场事大

可是就当大清帝国首都沦陷，列强串谋，瓜分就在旦夕之际，所幸美国立场坚定，极力淡化此一国际战争。把它说成「拳匪叛变」(boxer rebellion)。洋兵来华，只是助剿拳匪，而保全了大清帝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对各国只赔点银子了事。

美国何以心血来潮，搞起「门户开放」这宗新花样来呢？那就说来话长了。须知「门户开放」这个东西原是英国货。只是英国卖起来有些尴尬；乃假手美国推销，而坐收其利。美国认为有利可图乃大推特推。结果变成个烫手山芋，欲丢不能，致使若干美国外交史家竟把它看为「铸成大错」(a great blunder，见 Samuel Flagg Bemis 著《美国外交史》第二十七章)。

英国为什么要搞个门户开放呢，本篇不能捞过了界来大谈外交史。因此只想以最简短的辞句，略事交代：在「鸦片战争」(一八三九～

一八四二)时代,英国对中国的企图是要把大清帝国造成「第二印度」。可是为时已晚。在「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时,英国所搞的是政治与列强合作,经济则大英独占。这一点英国搞得十分成功。从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一八九四~一八九五)直至「八国联军」前夕(一八九九~一九〇〇),中国内河、沿海和对外航运的百分之九十及中国进出口贸易百分之七十都操纵在英商之手;而商品价值中百分之六十以上,又系英商经营和运载的鸦片毒品。

这种「毒品贸易」(drug trade)可能是世界经济史上利润最厚的贸易了。今日还是如此。「鸦片」是一种「黑色黄金」(乌金),只要有货,不怕没买主。吸毒者纵倾家荡产、鬻妻卖子、盗窃杀人都是要全力搜购的。瘾君子不可一日无此君也。庚子之前,中国对外开放贸易者共有三十五个港口之多。几乎无一港口不是以英商为主;也无一埠非烟毒弥漫之区也。鸦片一项已足说明一切。其它商品,就不必多提了。

可是这种以英商独大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到一八九七年就受到严重挑战了。前此一篇已言之,自德人占了胶澳,俄人占了旅大,法人占了广州湾,英人自己也补占了九龙与威海卫,与这些港口邻接的中国腹地,渐次就沦为列强的「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在这些「范围」之内,各列强始则强迫中国不许在各该范围内,让第三国插手租借土地或筑路开矿。次一步则各「范围」就要逐渐被各列强划为「保护地」(protectorate)。第三步则各列强就要各自建立其海关体制、关税税率和行政系统。如此一来,大清帝国就变成鄂图曼

帝国和波兰第二。要被列强正式「瓜分」(partition)了。「瓜分中国」(cutting the Chinese melon)几乎已成定局。

这一瓜分形势大致说来是：俄占满蒙新疆。德国以山东为中心，南向至吴淞口，北到秦皇岛，西及西安和宜昌。法则囊括滇桂川黔四省和粤西。日则独占福建包括厦门。英国如参加瓜分，则可侵占长江流域、粤东地区和西藏。

这一瓜分局势之迅速形成，作为倒霉的「炎黄子孙」不必谈了；读者试思，您如果是英国首相或美国总统，您作何感想，中国对外通商的三十五港口，二十一行省，蒙藏新疆地方，原来都是一强独大的英国市场；对美贸易粗及百分之二十。其它列强对华贸易之总和则不及百分之十。如今这些小鬼竟然要把大清帝国瓜分！在英国人看来，他们瓜分的不只是中国而是大英帝国的市场——这市场有四万万消费者，值百抽五由英国管理的低关税，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工，开不完的煤铁矿，建不完的铁路。千万以上吞云吐雾的瘾君子……要让这些小鬼来「瓜分」？他们瓜分中国事小，瓜分英国市场事大！因此，英国佬就要设法阻止他们来瓜分中国了。

要防止中国被瓜分，就要维持半死不活的大清帝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并取消列强划定的「势力范围」。但是在老虎嘴里抢肉岂是易事？为此，老谋深算的英国政客就双管齐下了；他们一面要积极设法阻止列强瓜分中国；一面又要积极参加列强瓜分中国的设计。庶几阻止不成，大英帝国在华的利益，也不会落空！

为着不在瓜分行列中落伍，当法国正强租广州湾时，英国就先强

占了九龙——其后遗症至今未了。在德国强占胶澳、俄国迫租旅大时，英国又单刀直入，强租了威海卫。为防德、俄两面夹攻，英国乃向德国暗示，绝不妨碍德国以山东为「势力范围」；英之强入威海卫者，防俄而已。但是它又于一八九九年四月与沙俄明订条约（所谓 scott-Mouraviev 协定），以长城为界，把两国在华筑路特权，一分为二。互不干扰。这些都是英国为瓜分中国设伏；但是它真正的政策，则是要阻止列强瓜分中国。这样它就只有远渡大西洋去疏通对瓜分无份的美国了。

### 美国突然变成远东强国

美国在二十世纪之前原非世界性强国，尤其远东之强，虽然它在中国的贸易，远在鸦片战争时已窜升至第二位。北美大陆是真正的地旷人稀，资源无限。因此它的扩张主义者在大陆之内已忙不开交，无暇及于远东也。可是当美国渐次进入太平洋，并吞掉夏威夷之时，正值中国甲午战败，免疫能力全失。后起的欧洲小帝国主义的德意两国竟然也尾随小日本之后对中国兴风作浪（如前篇所述），并激发了义和团在山东之崛起，也引起欧洲列强对华作「强取租借地之争」（battle of concessions），因此，少数美国殖民主义者这时也沉不住气了。他们主张也在中国沿海与列强抢夺殖民地。当时驻华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就是个积极分子。他向国务院一再建议，认为美国如不乘机动手，将来会悔之已晚。他这一呼唤，美国国内原不乏答腔人。麦金莱总统心头即忐忑不定。少数海军将领则摩拳擦掌。他们心目中在中国的殖民地是：北自大沽、南及厦门，中间有山东的

芝罘，浙江的舟山群岛，和闽浙之间的三沙得一便可作「加煤站」(coaling station)。——那时美国海军与商轮在远东「加煤」，都要仰仗英国殖民地。老美心殊不甘也。

就当这极少数扩张主义者正在龙心不定之时，谁知天赐良缘，为着古巴问题，美国忽然和西班牙打了起来，想不到这场为时不过四个月的「美西战争」(一八九八年四至八月)，西班牙这个老牌帝国主义竟如此窝囊，被美国打得一败涂地。美国随之解放了古巴；占领了波多黎各（也使今日纽约变成了波人乐园）和关岛；也使那拥有六千岛屿的菲律宾归顺于星条旗下。总之，一夕之间，美国就变成了世界强国；远东政局因此也随之彻底改观了。

美国力量在远东的异军突起，对它国内的扩张主义者自然是个绝大的鼓励。例如美国驻厦门的青年领事蒲安臣·约翰逊（Anson Burlingame）就兴奋不已。约翰逊知道菲律宾的经济大权是掌握在华侨之手；而菲律宾华侨主要来自厦门。如今美国既然占领了菲律宾，如果再占个厦门，建立一条美国掌握的菲华经济之桥，把菲律宾接往亚洲大陆，那该多美？！自此以后，约翰逊就变成了厦门的守门之犬。庚子八月当日本人正想浑水摸鱼，趁拳乱正烈之际，在厦门制造藉口，接着便派遣水兵登陆，以图占领厦门时。第一个攘臂而起大呼抗日的竟然不是中国人，而是约翰逊这个小帝国主义者。他终于伙同英国水兵，把日本人赶回大海。（见美「国务院原档」一九〇〇年九月一日及以后驻沪总领事古纳德致助理国务卿 T. W. Cridler 诸函及附件；并参阅 Young 著前书，页一〇一～一〇二，一七五～一七九。）



## 小班超不识大利害

这些美国的小班超勇则勇矣，但是他们所作所为并不一定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美国毕竟是个气魄恢宏的民主大国。国内多的是帝国主义者，也多的是反帝人士。美、西之战本是兵以义动。赶走胡作非为的西班牙帝国主义；援救古巴出于水火。谁知美国海军小将乔治杜威（George Dewey）竟如此英勇；他从香港带了四条小艇，星夜赶往马尼拉，三炮两炮也把西班牙赶出了马尼拉；轰毁敌舰十艘，自己竟未折一兵一卒！乖乖，这个小班超也实在是英勇非凡。可是同样的，勇将不得重赏。美国舆论和上下两院却认为此举是以暴易暴！美帝哪里就比西帝更好？——所以麦金莱后来的并吞菲律宾法案，在参院只以一票多数通过。

再者这些小将的行为也解决不了大选期间的政治问题（一九〇〇年麦氏正竞选第二任）。麦金莱和他的共和党当时（让我且引用一句当今台湾的术语）是搞「金权政治」的，离不开大企业大财团和大地主。其时美国南部的棉纱纺织工业的主要市场——占出口总量之半——便是中国。

**【附注】**清末民初之际那种又白又细又软又廉的「洋布」，已彻底摧毁了我们已有三千多年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体系。农村破产，贫下中农就只好去加入白莲教、义和团、大刀会和红军了。美国这时的大地主动辄占地数万乃至数十万英亩。哪像我们眼皮浅的毛主席把十亩八亩地的小地主，也斗得死去活来。

庚子年拳乱一起，中国华北东北大乱，半个地球之外的美国南

部棉纺工业也随之半数停产，损失不貲。纵使如此，一九〇〇年美制棉纺织品输华总额仍有两千三百七十四万五千美元之巨。（见 Charles S. Campbell, Jr., *Special Business Interests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 New Haven, 1951. pp. 10, 19~20）较十年前增加一倍。

中国东北当时也是美国德州油商，当年的美孚公司，今日的洛克菲勒财团的市场。拳乱未起之前，美油已逐渐受俄油之排挤。拳乱一起，俄军迅速自南北两路侵占东北。在北部它逼死黑龙江将军寿山；在南部它迫令奉天将军增祺（那位招安张作霖的满族地方官）和它私订终身，来个秘密的中俄地方协议，夺取特权，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逼令李鸿章在中央追认。可怜的李中堂就是在衰迈的风烛残年，被俄人活活逼死的。此是后话，见下节。

**【附注】**和中国地方当局私订终身，然后再要中国中央追认，是沙俄赤俄通用的老办法。君不见二次大战时斯大林对盛世才兄弟，对高岗，对张治中，对陶峙岳所用的手段是与韦特诸公前后辉映；高岗丢掉脑袋还不是和斯大林勾结的结果，——先提一下，以后自有篇章、再慢慢交代。

在那个「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 的美国，山姆大叔成了暴发户，不但商品充斥，需要外国市场；他和比他更早发财的英国老大哥一样，钞票也多得一捆捆地无法使用。小暴发户们有时会随手用十元钞票（值十三两银子）来点火抽烟；大暴发户的钞票堆起来，真是烧也烧不完啊；朋友，这是资本家暴发阶段的普遍现象嘛！我们大

陆上的左王们。开口闭口，什么「资产阶级的污染」。这些打赤脚出身的老八路，晓得个鸟。台湾的朋友多喝几瓶 XO，吓唬吓唬「老外」，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美国当年的资本家，黄金美钞多得受不了。国内消化不了，他们也要到国外去投资，他们不搞欧洲式的「殖民主义」去占领疆土；他们要在海外投资，建立企业，修筑铁路，代替土地占领。这时亚非拉落后地区的殖民地已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只有中国还剩一块完整的落后荒原有待开发。所以美国金融家、银行家也就看中中国了。

就以铁路大王哈里曼（Edward Henry Harriman, 1848～1909）来说吧！他老人家在庚子年间，一个人便掌握了铁路六万英里。比中国大陆今日（二十世纪九〇年代）全部铁路总长还要长过一万八千英里（一九九〇年中国大陆上铁路总长度为六七、五四九公里，合四一、九七三英里。见《大英百科全书·一九九三年世界年鉴》页五八五）。那时还没有飞机，哈大王要建筑「环球铁路」。中国这块荒原一片，筑起铁路来，多过瘾！说老实话，我们这片大沙漠，不让哈王爷来筑几条铁路也真是罪过！今日美国如再出个哈大王，能来中国投资筑路多好，谁知我们的「辛亥革命」就从「护路风潮」搞起的呢！当年有的美国人买错了中国铁路股票，迨人民政府成立时，他们还在鼓噪索赔呢！

再看看那家已发财三代的「毛根财团」有多少黄金美钞？哈里曼筑路需要钢铁；而钢铁则掌握在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1835～1919）和毛根财团之手。老毛根（J. S. Morgan, 1813～1890）搞

银行发了大财之后，儿子大毛根（J. P. Morgan, 1837～1913）花钞票为企业建立「美钢」（USS，且看今日大陆上的「首钢」、「宝钢」、「安钢」、「美电」（电话电报 AT&T）、「奇异」（GE）等等；使这个王子变成王中之王。到王子之子，老王之孙小毛根（J. P. Morgan, Jr., 1867～1943）崛起时，他点铁成金，加以收藏。一下把全世界黄金总储量的百分之八十，装入私人荷包！

朋友们知道吗？全世界黄金总量没有多少吨呢！我们如把全世界的黄金（包括你的金戒指和你夫人的金项链），统统放入矗立美京的华盛顿纪念塔之内，也装不到顶呢！但是小毛根一人便拥有百分之八十的纯金的华盛顿纪念塔，那也就够吓唬人的了！

试问小毛根搞这么多黄金干嘛呢？——吃喝嫖赌，讨姨太？曰非也。小毛哈佛大学毕业。做了一辈子文学艺术的大护法，私生活相当高级而严肃。加以「日理万金」忙不开交，哪有工夫作狎邪游？或问：那么做个大资本家，搞这么多黄金美钞，作何用场呢？

要解答这项哲学问题，你得回过头去，问问咱们自己的老毛（泽东）：主席呀！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垮了蒋介石，又斗彭德怀、又斗刘少奇、又斗林彪……斗来斗去，「不斗行吗？」不斗为啥就不行呢？老毛患不已知，是无言以对的。

明乎此，朋友，我们就有接近真理的解答了。原来「老毛姓社；三毛（毛根氏三代）姓资」。姓社的斗的是「权」；姓资的斗的是「钱」。社姓英雄说：「大丈夫宁可千日无钱；不可一日无权」；「有权便有一切，过时不候」！

资姓好汉也会说：「男子汉宁可千日无权，不可一日无钱」；「有钱便有一切，愈多愈好」！所以毛泽东和毛根氏祖孙三代，都姓毛。原是一家人。只是一个爱权，一个爱钱，大家都不一定爱国罢了。不幸老毛是生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里，所以他只许政客搞权，而不许人民搞钱。国家要管制一切，弄得我们十亿同胞都一穷二白。

三毛则是生在一个「社会强于国家」的传统里，所以他们只许资本家搞钱，而不让政客揽权。——「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The best government governs the least）嘛！政府不管事，因此就弄得盗匪横行，娼妓满街了。

所以姓社和姓资的原是一丘之貉。只许搞钱，不许搞权，固然有欠公平。但是只许姓社，不许姓资，也是照样落伍。

可是本世纪初的庚子年代，美国是姓资的当家，麦金莱总统只是他们的马前卒——他们只要全中国门户大开做他们的市场；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小班超在中国沿海搞小型帝国主义，认为是违反国策，对俄德法日想瓜分中国，他们也是反对到底的。——他们所要的只是这个完整的中国大西瓜。光绪爷是否应该复政，在他们看来，也大可不必！他们看中的只是西太后乱政统治下的那个腐烂的大帝国；大清臣民只要每人多穿一条洋布裤子，就可保证他们纺织工人一辈子不会失业。你们小班超要占领一两个弹丸之地的「三沙」，徒具恶名，有个屁用！

### 段数高超的唐宁街外交手腕

这一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不特当时窃政中枢的满族亲贵，端王、庄王等一无所知；连康有为、梁启超、刘坤一、张之洞也一知半

解。他们只知道英美对华政策比较温和开明，不像德俄那样穷凶极恶，就误认为英美是礼义之邦。他们也就变成亲英美派的主力。英美对华何以满口仁义道德，他们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余读康子论英文，固知圣人尚为一老学究也。

可是天下事每每是「一物降一物」，若论十九、二十世纪之间的国际关系，则美国牧童就远非伦敦唐宁街政客的敌手了。伦敦政客知道有关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为英国利益之必需；然英国一国绝不能对抗俄德法日等瓜分派的联合阻力。所以唐宁街非拉美国下海不可。但是他们也知道美国朝野亲英分子（如海约翰这一类今日所谓 WASPs：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固多；反英分子（如德裔、爱尔兰裔及天主教徒等）亦复不少。怎样使前者突出，后者缄默，这是一宗外交上的大艺术。

再者，门户开放政策对英国固有「大利」，然亦有「小弊」。——门户开放了，则香港九龙、威海卫、西藏和缅甸，开放不开放呢？为大英帝国的最大利益着想，它如果能「只开放人家，不开放自己」，那就十全十美了。

朋友，大英帝国的外交政策，这时就向这个十全十美的方向前进。这就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所谓「门户开放照会之拟订」(Writing of the Open Door Note) 这一章的主要内容了。

门户开放观念之出现实始于当时已掌握中国海关四十余年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 (Sir Robert Hart, 1835~1911) 和他的助手黑卜斯莱 (Alfred E. Hippisley)。英人于「英法联军」(一八五八~

一八六〇）期间强夺了中国海关，原是一种破坏「条约体制」（treaty system）的非法行为，曾为当时美国驻华公使马歇尔（Humphrey Marshall）所强烈反对。但是到一八九七年当德俄等国在中国强占租借地，搞非法的势力范围时，英国人为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乃倒打一耙，反说他们破坏「条约体制」；英国因而要联合美国，替中国主持公道，甚至为中国助练新军，来维护这个「条约体制」！门户开放的原始基础便是从这个「维护条约体制」的观念开始的。

长话短话。英国为着促使美国支持英国政策，它首先是在亲英的美国社团和政客中「造势」（今日台湾政坛通行的术语）。一八九九年二月因有英国财界议绅贝思福（Lord Charles Beresford）在美国鼓吹门户开放，英美合作的巡行演说。真是天如人愿，当他们正在造势的中途，便发生了上述的「美西战争」，把全美政客和媒体的注意力都吸向远东去。美国既占有菲律宾、关岛、夏威夷，英美如一旦携手，则三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海（黄海、南中国海和地中海）使是他们两国的天下了。

美西战后美国的扩张主义者气焰熏天。他们也主动拉拢英国。英美携手，则列强在远东的均势，就变成一边倒。纵使俄德法日对中国仍有瓜分的企图，英美二国只要消极的示意不参加，他们就得赶快住手；坚决说「否」，其它列强也就赶快表态——公开声明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这就使「门户开放政策」从「维护条约体制」，升级成为英美保险公司，担保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甚至担保胡作非为的慈禧老太后，也不必向儿子「归政」了。

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英国是最重实际利益，最有远见，其手腕也是最能屈能伸，恰到好处的。吾读英国外交史，真未见其有严重「败笔」也。——纵即使是后来的「慕尼黑」，那也是对一个有心理病态的独裁者的估计错误，而非正常外交政策的失败。

英国人搞外交之有如此高超的段数，我想是它全民族政治成熟的结果。他们搞国际政治发育最早；成熟也早。整个外交政策之逐步落实，是它全民族智能的产品。不像美国专靠几个锋头人物；或我们中国专靠几个独夫独妇「一句闲话」也。

深沉的英国人都知道，肤浅的美国人都是有自大狂的。对中国搞门户开放，是不能采取英国主动、美国追随的 Anglo-American 方式；相反的，他们要搞个 American-British 的顺序，使美国领先，英国追随，则美国牧童就一马当先，勇往直前了。

英国这一计「低姿态」玩得十分巧妙。果然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海约翰就浪得虚名，变成「门户开放先生」了。当海氏于一八九九年九月电送《门户开放照会》至英伦时，唐宁街政客还半推半就地来个「有条件的接受」(Conditional acceptance)！「条件」者何，说穿了就是「只开放人家，不开放自己」。一般美国佬（包括若干历史家！）都以为英国支持美国政策而大乐；约翰黄牛亦以十全十美的收场而心满意足。

朋友，和英国佬办外交，要读书呢！光和肥彭大人出粗气、拍桌子，有个屁用！

**李鸿章段数也不低**



现在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苏秦、张仪。

在庚子年间，我们这个腐烂的大清帝国，真能在国际间纵横捭阖，为列强侧目而加意防范者，还是那位老谋深算的李鸿章。

不才读中国近代史数十年，深感近代中国堪称为「外交家」者，只李鸿章、周恩来二人。不幸周公受制于一个不学有术的暴君。因此他和一辈子稀泥而长才不展，庶民沟壑，真国族之不幸。

李鸿章则在一个腐烂而瘫痪了的帝国体制之内，「与妇人孺子共事」（此语为鸿章与俾斯麦对话时感叹之言；笔者幼年闻之于曾为李氏幕友的乡前辈）。受制太多而难展所长，终以悲剧人物收场。周、李二人都是办「外交」而受制于「内交」，夫复何言！

至于笔者曾为之作传的外交长才的顾维钧先生，到头来只能算是个不世出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博士帮首。其在历史中浮沉，终难望李、周之项背耳！

鸿章在甲午战争时以「一人而敌一国」（梁启超语），兵败；全国诟怨竟集矢于李氏一人。拳变前夕，李被下放，避祸于广州。拳乱既作，举朝上下（包括鸿章自己），又皆知折冲樽俎，和戎却敌，仍非李不可。因此自六月十五日起，匝月之间，懿旨圣旨诏书十下；促鸿章回京，撑持大局。这时长江二督张之洞、刘坤一也深知才有不敌。为撑持此危局，必要时他二人宁愿拥戴李鸿章出任民国大总统。事详前篇。

鸿章此时一身系国族安危。他在广州奉诏时，华南震动。两广臣民和香港英督均深恐鸿章一去，华南将不免动乱而群起挽留。李氏自

己当然也知道，此时朝中西后与满族亲贵四人帮沆瀣一气。他这个「二虎」之首，一直被他们公开辱骂为「汉」奸的「李二先生」，何能与这群无知而有权的「妇人孺子共事」，所以他在广州迟迟其行。但是中国将来与八国媾和，鸿章势必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因此他在广州，对内对外都要大搞其「水鸟外交」（duck diplomacy 水上不动，水下快划）了。

**【附注】**义和团所要杀的「二虎」共有三人，李鸿章、奕劻和荣禄。李实居首。奕、荣二人则互补第二名。

首先他要知道当时中国驻列强使节是听朝中当权的四人帮的话，还是听周总理的话。幸好这些使臣如杨儒、罗丰禄、伍廷芳……都是他的老班底，没有做风派，更没有变节，他可以如臂使指。对列国政情了如指掌。为争取外援，他甚至不惜假传圣旨。

**【附注】**笔者在美国原档内发现，七月二十日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曾向麦金莱总统亲递由光绪具名的《国书》一件。情辞恳切。大意说大清时局失控，举世交责，至属不幸。他恳请望重全球的麦金莱总统能作一臂之援，号召各国恢复旧好，云云（见美国国务院公布一九〇一年「对外关系」原档）。这件《国书》显然是李鸿章伪作。盖北京此时不可能颁此国书，而国书日期为七月十九日缮发，翌日便抵华府更无此可能。清档中亦无此件。

第二，他要摸清自己朝中的老底子，看四人帮的控制究竟深入到何种程度。幸好这群小亲贵原只是一群浮而不实的高干子弟。乱政则

有之，控制则未必。他们对那些老谋深算的老干部的水鸟政策，是莫名其妙的。（文革期间那个四人帮和这个四人帮，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鸿章很快的就与奕劻、荣禄甚至慈禧建立起秘密管道来。奕劻、荣禄原都是李的政敌，但此时救命要紧，他二人暗中对李鸿章是言听计从的。他二人对西后的私语，其影响力亦不在载漪、载勋之下。

这时北京对外的电讯已断，但北京与济南之间的传统驿马最快的「八百里加急」，仍可照跑。往返一趟需时六日，而济南在袁世凯治下，与各省会各商埠，则电讯畅通。所以华南各地与北京往返讯息需时八天（见李鸿章与驻沪美国总领事古德纳谈话记录，载美国「国务院原档」一九〇〇年八月二日古氏对国务院之密电）。鸿章并派遣儿子经述长驻济南，观察京津并监管电讯。因此，李氏对国内外讯息的掌握，都相当正确而完备；可说是达到知彼知己的境界。七月十六日鸿章自袁世凯电报中得知慈禧已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重任，七月十七日遂力疾北上，二十二日抵上海，就正式进入外交前线了。

### 棋高一着，逼手逼脚

笔者在前节已交代过，庚子年间列国对华外交是各有其既定政策；他们在彼此之间是互争短长，永不罢休的。可是他们对中国朝野的反应如何，则一向是耳边风，绝不买帐的。中国的外交家，纵使本事通天，你所可能做的，至多只是在他们之间，搞一点挑拨离间的工作，使他们鹬蚌相争，你收点渔翁之利。所幸的是他们之间的鹬蚌之争是永不休止的，而我们的李鸿章（周恩来也是如此）却正是个搞以夷制

夷闻名世界的高手。

笔者落笔至此，心有余酸。盖二次大战之末，当罗、邱、斯三人在「雅尔塔」会商支解中国时，罗氏忽然良心发现说：「我们还没有通知蒋介石呢！」斯氏莞尔说：「我们三个人决定了，蒋介石还敢翻案？」果然蒋介石不敢翻案，而蒋氏之下的几位，却又是只想承旨做官的政客，因此那片大于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就被他们不声不响的断送了。——李鸿章这个「封建官僚」，还没有这样窝囊呢！

所以当李氏于七月二十二日在上海登陆时，那些作贼心虚的列强外交官总领事，怕他挑拨离间，几乎对他一致杯葛。海约翰虽然对老李不无兴趣，一再训令古德纳与李鸿章接触，而古氏这个小班超却大不以为然。他一再向上级顶嘴说：你们在华盛顿认为李鸿章是个政治家，我们（指列强在沪的外交圈）在此地都知道他是个老奸巨猾、专搞挑拨离间的大骗子呢！（见上引「原档」，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七日古德纳致海约翰之密电。）

对老李挑拨离间的伎俩，最感恼火的莫过于那位急于要把中国瓜分的法国殖民部长了。他后来曾特撰长文，警告法国朝野。千万要提防李鸿章的挑拨离间，并大声疾呼说：

李鸿章之分化联盟政策已著成效。中国驻外使节在鸿章指导下，破费活动。对俄秘密交涉；对美法请求调解；对德国道歉；对日本动以种族情感相召；对英以长江商业利益之保护为词……（把入侵列强挑拨离间得七零八落）（见前引《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二四，转引自 ECHO DE CHINE 及《字林西报》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二日。）

我们老奸巨猾的李鸿章，在这儿是被那位一心要瓜分中国的法国殖民部长说对了。但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老李为扶清保国，除掉老奸巨猾、挑拨离间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这位法国殖民主义的大总管对老李这一套也无可奈何；只有眼睁睁的看他去「挑拨离间」。老合肥倚老卖老，阴阳怪气，也从不讳言。各色洋人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也哭笑不得！朋友，搞外交、搞国际政治，原来就是赌博，就是下棋嘛！——棋高一着，逼手逼脚。你下不过老头子；你对老头子，就哭笑不得。

### 弱国未必无外交

古德纳这个小班超对老李原有极深的成见，也对他处处设防。但是这个手扶大美伯理玺天德敬赠的拐杖，脑后拖个猪尾巴，呵呵大笑，蹒跚而来的中国老头子，可不把这个小洋人看在眼里呢！他出言不逊，口口声声「你们的康格，和康格的老婆……」怎样怎样。

略通汉语的古德纳认为这老头太不懂外交礼貌；那位中国翻译也顿感尴尬，乃改译为「康格公使夫人」如何如何。可是也略通英语的李老头子却大声改正他说「瓦壶、瓦壶」(wife, wife)，弄得古德纳啼笑皆非，奈何他不得。（笔者幼年即尝闻这一则「李鸿章轶事」，原以为是好事者所编造。谁知后来在美国档案中发现，竟实有此事。见上引「原档」，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古德纳致国务院密电。）

李鸿章这次到上海，原是有备而来。至于怎样对付这批小帝国主义，他是胸有成竹的。他知道海约翰曾于七月三日向各国送致「备忘录」。重申美国在此次事变中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坚定立场，并突

出保证中国之「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此一文件以「循环照会」(circular note)方式通知各国；各国毋须覆文。按国际法规，受文国如不适时提出异议，则被视为默许。此备忘录即有「临时协定」(modus vivendi)之约束力。(参见美国国务院公布之一九〇一年「对外关系」档。)海约翰此一 modus vivendi 之提出是得到英国全力支持的，而美国此时在老麦克阿瑟将军(道格拉斯之父)指挥之下的驻菲美军亦有七万五千人之多。故海氏提出之照会，俄德法日意均不愿说半个不字也。

根据此项重要的外交情报，李鸿章也就制订了应变的腹案。为着贯彻他自己的策略，他首先要折折这批小洋人的骄气。在拳变期间，华人对洋人的态度是走两个极端的；义和团和四人帮对洋人是悬赏缉拿、斩尽杀绝；互保区臣民和「二毛子」，对洋人则奴颜婢膝，一恭三揖。一个小小美国总领事，把个中国宰相也不放在眼里的。所以老李要折其骄气，使他服服贴贴为自己传话。说也奇怪，自此以后，古德纳纵是在他的密电里，对老李的态度也大为改变。

李鸿章当时应变的腹案大致有如下数端：

第一，他要在国际公法里把中国由交战国换成受害国；拳匪是叛逆；两宫被劫持(有荣禄密电为证)。宣战诏书是「矫诏」；入侵洋兵是来华助剿叛逆。按此逻辑，则入侵之洋司令官，包括瓦德西在内都要变成李中堂的「戈登将军」了。因此中国对来华助剿的洋兵固有赔偿军费的义务；但是助剿各国却没有对华要求割地的藉口。如此「赔款」而不「割地」，大清帝国就可幸免于瓜分了。李鸿章这套「拳匪

叛乱」的逻辑，当时亦竟为入侵列强所默许。其实老李哪有这力量来左右帝国主义呢，他搞的只是百分之百的「狐假虎威」罢了。在鸿章于七月底透过古德纳与华府接触之后，海约翰要求与困守东交民巷的康格用「密码通讯」(cipher telegram)，鸿章未加考虑便答应下来了。自此美国驻华使馆与华府国务院之间密电频频，都是由总理衙门和袁世凯以「八百里加急」代转的。其它列强闻讯也纷提同样要求，都为李氏老气横秋的花言巧语地搪塞了。——至于海、李之间在搞些什么样的勾搭呢？那就让善疑者，自己去幻想吧！

记得一九七九年春初，邓小平在访美之后，不久便发动了他的「惩越之战」。这一仗打得苏联老大哥一头雾水。这也可说是中国外交史上两件巧合的小事吧！

鸿章抵上海后的第二项腹案，便是想解散各地的义和团，并把困在东交民巷之内的各国公使送往天津，以化除联军进攻北京的藉口；然后再恳请美国，根据门户开放的原则出面阻止。此时的麦金莱和海约翰已早有此意，可是这一点他是彻底的失败了。——是所谓外交受制于内交吧！

那时的北京是主战派的天下。连荣禄也还在假装指挥攻打使馆呢！哪有可靠的部队可以护送各国公使及外国传教士（总数约一千人）离开北京呢？外国人走了，剩下了数千名「二毛子」又如何处理呢？更何况死守在东交民巷之内的洋人，衣丰食足，军火充裕，并未尝感觉有生命危险。日常以枪打义和团为狩猎消遣，他（她）们才不要冒险迁居呢！

**【附注】**那时有一对叫 A. F. Chamot 的夫妇，二人都是打活靶老手。因此夫妻二人在被围五十五天之内，共射杀义和拳民约七百人。Chamot 先生有一日射杀五十四人的最高纪录！Chamot 太太亦有杀十七人的可惊夸口！见 Young 著前书，引自《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一九〇一年一月二日「访问录」。那时来福枪的有效射程是二千米。前后左右四千米街道上居民行人都在他们射程之内。被射杀的全是拳民，吾不信也。

时不我与，李鸿章与北京办内交，要八天才能通讯一次。他们通讯未及三两次，北京就沦陷了。首都既失，两宫西狩；鸿章在上海也不能再待下去，就于九月十日搭招商轮。摒挡北上了。

### **使馆解围，联军解体，瓜分结束**

鸿章轮于十九日抵大沽。他的「挑拨离间、老奸巨猾」的恶名再度引起当地洋官的联合杯葛。德军司令官竟不许他上岸。正是由于挑拨有道吧！其后终由俄军保护登陆，进驻天津。十月十一日复由俄兵护送，迁往北京，与奕劻会晤共筹和局。

其实李鸿章此次北返，对整个入侵的联军来说，只是中国向八国占领军投降的一位代理人而已；一切听命于联军，他作不得多少主也。虽然俄国却要强迫他作为占领中国东北的代罪羔羊。当然对沦陷区的中国人民。他却不失为一个恢复安定的象征。

前篇已言之，联军的八国，彼此之间矛盾太多，本不能联合也。它是愚昧的满族亲贵攻打使馆打出来的。一旦使馆解围，便是他们联合的结束。

大致说来这时入侵的八国盖可分为三大阵营。最穷凶极恶者为沙



俄。它志在并吞东北，不达目的不已也。因此它在国内要尽量示好中国，不特首先自京津撤兵为各国示范；并协助鸿章抗拒列国。然李鸿章亦终为它逼死，留为后话。

另一阵营则为德法日意等瓜分派。他们对领土野心远大于商业利益，无奈浑水摸鱼的局势已成过去。如今一致行动，并向英美「门户开放原则」（Open Door Doctrine）一再表态。因此各国想再次作零星殖民地之抢夺，心虽不甘，行动上已不可能矣。

再一组便是英美二国了。两国对华的基本原则，前节已不厌其详缕述之矣。因此庚子之后，英美二国竟成大清帝国的看门犬。其后英国为着联日抗俄，美国为着防日守菲，两国都背弃门户开放之原则，取媚日本，牺牲朝鲜；而中国之免于瓜分，则不能不说是受惠于海约翰之门户开放也。——前节所言；拳乱起于瓜分的威胁，而瓜分的威胁，亦以拳乱的结束而告终，此之谓也。国际政治之奥妙，有如此者！

### 每个中国公民各赔美金七毛四

所以庚子年李鸿章在北京所办结束八国联军的交涉，除后来对付不要脸的沙俄那一段之外，实较戊戌前（一八九七）恭亲王、翁同龢等应付列强强租殖民地那一阵，反要轻松。且看庚子年冬八国要求、十四国受惠的十二条：（条文从简）

- 一、向德皇谢罪、为死难公使立碑。
- 二、惩凶。

【附注】李刘张三督，似乎比洋人更有兴趣。《史事要录》页四五八，引

英国《蓝皮书》，在洋人要求的死刑名单中把「怡亲王、溥静」误为二人，其实是一人。共十一人。三位总督，恨不得全部答应呢！

- 三、为殉难日本书记官作追思。
  - 四、为被毁洋人坟墓立碑。
  - 五、暂禁武器入口。
  - 六、赔款。（包括各国政府和民间及雇佣华民之损失。）
  - 七、各使馆自设卫兵。
  - 八、毁大沽电台。
  - 九、维持北京大沽之间的交通安全。
  - 十、禁止排外团体。
  - 十一、修正通商航海条约。
  - 十二、改革总理衙门及外交礼节。
- ※节自美「国务院原档」中之汉文原件。

在这十二条要求中，比较难解决的只是第六条，赔款。究竟洋人在中国损失有多大，他们就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了。就以教会损失来说吧！当时美公使馆就通知各教堂「自报」。其实他们早已私自解决（如上文所述），捞回已不止十倍八倍了，最后美国各教会还是分到两百多万。这还是美国当局柔克义等有意限制的结果。

柔克义这位「门户开放政策」的有力推动者，在使馆未解围时，即由海约翰推荐来华为「特使」，曾致力于战争地方化，不让德军把战局扩大；在赔款方面，他的计算也比较温和合理，因与力主强硬报复的康格发生龃龉，终代康氏为驻华公使。俄人为示好中国，英美代表为让中国不致破产，曾主张把赔款问题移交「海牙国际法庭」（The Hague Tribunal）仲裁，按实核算，未果行。最后各国乃随意订个天文数字四万万五千万两了事。这个数字之决定据说是出于列强公意，

认为此次战祸是目无上帝的异端四万万五千万支那蛮共同犯的罪恶。每人应罚银一两(按时价每两值美金七角四分钱),就这样决定了——这数目大致是在各国实际「损失」的十倍二十倍之间吧!但是只「赔款」而不「割地」,已是不幸之大幸了。

总之,八国联军这场纠纷,我们终能逢凶化吉者,盖有二端。其要者为英美合力的「门户开放政策」之适时提出,另一点则是我们李刘张三督在分明的国际战争中为中国化除了交战国的身分。既非交战国,则辛丑之会就没什么「和会」、「和约」一类的名词出现。所以我们的《辛丑条约》既不成为一种「和约」(peace treaty),它就变成成为某种国际事件诸国共同商讨的「议定书」(Protocol)。因此我们《辛丑条约》在国际法上的正式名字应该叫 Austria-Hungary, Belgium,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 of 1900 (中国为一九〇〇年的动乱事件与十一国最后的议定书)原件以法文为准。既然是「议定书」,中国就不是战败国。割地一条也就可名正言顺的省去了。

当奕、李二人把洋人这些要求,于辛丑电奏西安时,慈禧得报实在是凤颜大悦。第一是洋人竟然没有要求她所最怕的「归政」。真是大「清」有「水德」,与「洋」人并不相「冲」。第二、她老人家闯下了如此大祸,竟然寸土未失。实在是李鸿章搞「洋务」本事通天。这个「肃毅伯」不待翘辫子,也是功应封侯的。——老太后对儿子也就不再忌妒而决定胜利「回銮」了。

### 李鸿章之死

西太后老人家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李鸿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俄国现在决定要并吞中国东北；并且要在李鸿章名下并吞之。

前章已言之，拳乱骤起时，俄国要趁浑水摸鱼，乃于庚子春夏之交急调大兵二十余万人，北自海兰泡南自旅大，分进夹击，侵入满洲（今东三省）。

庚子八月在七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俄军故作姿态自北京撤兵（八月二十八日）；而东北两路入侵的俄军却正在加紧进攻。自北南下攻占了黑龙江省城（八月三十日），再陷吉林省城（九月二十一日）；自南北上则攻占了营口（八月五日）、沈阳（十月二日）；南北两路会师（十月六日），就把中国东北全部占领了。俄皇得报乃向俄皇太后上寿，说是「托天之佑」（见上引《年（日）谱》转引苏俄「红档」）。

此时中国疆臣黑龙江将军兵败自杀（寿山自己躺入棺材，命儿子开枪把他打死）。盛京将军增祺则被俄军所迫与占领军司令阿莱克息夫（Vice Admiral Evgeni I. Alekseev）于十一月九日签订了一项所谓《奉天交地暂且约章》（增阿暂章）九条，允许俄人驻军、筑路（哈尔滨至旅顺）、助理军政要公、占领营口，而中方则解散军队，交出军火炮台等等，其内容与后来日本人所要求的二十一条，极为相似。其后俄人即据此要求李鸿章于「辛丑议定书」之外，单独再签此项中俄密约，以为撤兵条件。中方如依议签约，则白山黑水就要全部沦为俄国的「保护地」（Protectorate）。如此则所谓「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便全属空话。中国如拒不签约，则俄人便拒不撤兵，把满洲永远占领，中国连宗主权也不能保存。何择何从，遂在奉旨「便宜

行事」的李「全权」的一念之间。

这时李鸿章已七十九高龄，尽瘁国事，内外交煎。辛丑年冬季，鸿章生命已至末日，累月发烧吐血，卧床不起。正在此油尽灯枯之际，而俄人连番催逼，从不稍懈，直至鸿章死而后已。

李鸿章死于一九〇一年辛丑，十一月七日。死前数小时，俄使仍伫立床前，迫其画押，为鸿章所拒。俄使去后，鸿章遂命儿子经述草遗折劝自强；并命于式枚草遗折荐袁世凯代己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临终切齿痛恨毓贤误国而卒。（见《庚子国变记》）

八国联军和义和团之乱确实是始于「毓贤误国」。迨李鸿章痛恨「毓贤误国」而死，拳乱痛史也就正式结束了。遭殃的是四亿五千万人民，而身为祸首的叶赫那拉老太婆，却因祸得福。——江山无恙，归政免谈。当她乘着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专列火车，自保定直驶京郊马家堡时，袁宰相率文武百官和中国第一支军乐队，排班恭迎。太后下车，乐声大作。可惜当时武卫军的乐队，还不会吹奏后来的《风流寡妇》和《美丽的亚美利加》等名曲，他们乃大吹其法国国歌的《马赛曲》，恭迎大清太后回銮，乐声亦确实雄壮无比。

两宫所乘的这辆豪华专列，原是新任的北洋大臣，为太后乘火车的处女航而特制的。但有谁知道十年之后，它却变成叛逆乱党孙文的专车？更有谁知道，再过十六年，它驶过皇姑屯时，竟被日本军阀炸得稀烂！

车犹如此，人何以堪？读史者能不慨然？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四期及第五期